
古代社会历史

(远古 ~ 1840 年)

一、先秦时期

(一)四川文明的起源

四川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远古到公元前 316 年秦灭巴蜀为止,为四川历史上的先秦时期。

四川在遥远的远古时代,就已经有原始人类在这里居息和繁衍。四川境内现已发现三处原始人类的化石,它们是分布于长江三峡地区的巫山人化石;沱江中游的资阳人化石;以及川南的筠连人化石。这些化石人类,处于距今百万年以上的更新世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在原始群里,人们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过着采集狩猎生活,婚姻关系上处于群婚状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四川境内旧石器遗址遗物很多,最主要的遗址有三处:铜梁文化遗址、资阳鲤鱼桥文化遗址、汉源富林文化遗址。从这些遗址遗物看,在距今两万年左右,四川当地居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已较前进步;经济生活仍以狩猎采集为主;社会组织已形成氏族,其规模大约在 50 人左右。

在公元六千年代前,四川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

步,引起了经济活动方式的巨大变革,以致在四川境内形成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如在四川西部高原,是原始的狩猎采集经济;盆地平原是原始的农业经济;其间还有更古老的渔猎经济。早期的农耕聚落开始建立,陶轮和纺轮的普遍使用,适应河岸和低湿地区的干栏式建筑及一般地面木材建筑的出现,使人们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这个时代已开始产生私有经济,出现贫富不均,但没有形成凌驾社会之上的国家。在由旧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四川境内存在着多种类型的文化遗址,目前已知的大概要以成都平原广汉中兴场的月亮湾—三星堆遗址为代表。这一类型的新石器文化的时代较晚,延续时间较长,其下限可延至铜石并用时期,约相当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

当四川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跨入青铜时代,迈进人类文明的时候,整个社会还处于部落林立、多国并存的分散状态之中。这个状态持续的时期相当长,只是到距今 3000 年前,四川才开始进入阶级社会。

(二)灿烂的巴蜀文明

传为西汉末年蜀人扬雄所著《蜀

王本纪》是流传至今系统记载这一时代四川古史传说的作品。《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但由于时间久远，许多史事渺茫，以致引起唐代诗人李白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叹。不过，今天我们仍可借助大量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资料，还能大致恢复这一时代的历史概貌。

蜀之第一代先王名蚕丛。蚕丛活动的区域，主要是成都平原西北的山区，即岷江上游一带。据目前学术界的意见，蚕丛是氏族的一支。从岷江上游出土的古代民族墓葬—石棺葬文物考察，反映出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半农半牧，居民过着定居生活，手工业已达到相当水平，其社会发展阶段可能正处于铜器时代的初期。

柏灌是继蚕丛而起的一代先王名，存在了“数百岁”，其居地可能在灌县境内。

代柏灌而起的是鱼凫，鱼凫也存在了“数百岁”。从《华阳国志》称鱼凫王“田于湔山”记载看，它可能兴起于此，即当于灌县和彭县的茶坪山。另从温江县北保存的鱼凫城遗址推断，当时鱼凫王的主要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成都平原。当蜀族由岷江上游进入成都平原以后，生产方式由渔猎经济转向农耕，生活方式也由经常迁移转向定居，这标志着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近年来在成都平原的大量考古发现，为我们认识三代蜀王，特别是鱼凫王时期所创造的早蜀文明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见证。在三星堆文化遗址第2至4期出土了大量鸟头勺柄，长喙带钩，极似鱼鹰，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与鱼凫氏有关。在三星堆1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像中，有一跪坐人像，据认为这当是蚕丛氏后裔形象的塑造。它反映蚕丛氏遗民已成为鱼凫王的治民。鱼凫王作为早蜀王国的创建者，作为国家政权的一代君主，由此得到了证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初步预测总重量近1吨，这反映当时蜀国的冶金技术已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至于大型青铜立人、各种青铜人头、面具、神树等器物的造型，其工艺之复杂，技术难度之大，远远超出其他任何质料器物的铸造。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还出土了数十件黄金制作的器物，如金杖、金面罩、金璋等，堪称珍贵。其中的金杖，具有王权和神权的最高象征意义，其性质和作用与中原夏商周三代的九鼎相同。三星堆遗址还发现了三段大型城墙建筑，从而被确认为是蜀国早期都城的废墟。三星堆作为鱼凫王朝的都城，大约在商末周初废弃。此外，还有成都十二桥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成都方池街、青羊宫等遗址，它们与三星堆遗址属于同一类型的古代文化遗址，是古蜀文化的继续。

和发展。

取代鱼鳧王蜀的是杜宇。杜宇出自朱提(今云南昭通),为濮人,《华阳国志》记载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称治郫邑,或治瞿上”。表明杜宇到达成都平原后,与江源(今崇庆县一带)的部落完成政治联姻,共同建立一个国家,并进而夺取蜀国政权。他最初建都于郫(今郫县)、别治瞿上(今双流牧马山一带)。杜宇(即望帝)善于农业生产;“教民务农”,使成都平原的农业得到大力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杜宇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疆域也随之不断扩大。

取代杜宇王蜀的是开明王朝。第一代开明为鳖灵,原本荆人,溯江至郫,被杜宇委以相位。他因成功治服洪水,获得蜀民拥戴,取而代之,鳖灵建立开明王朝约在公元前7世纪初,即春秋早期。相传开明王朝共传十二世,历350年,最后于公元前316年为秦所并。史称开明一世为丛帝、二世为苻帝,三世为保子帝。开明王蜀后,定都广都樊乡(今双流境),至春秋战国之际,开明五世迁都成都。从此,成都作为全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格局确立。

开明王朝的350年,是四川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政治上,开明王

朝承袭杜宇王朝的君主政体,实行王位世袭制度,分封王室亲族镇守边防重地。建立完备的礼乐祭祀制度,在新迁的都城—成都城内重新设立先王宗庙。继续推行奴隶制度,把负担劳役的劳动人民按“五丁”的劳役组织编制固定,称之为“五丁力士”。在经济上,鳖灵针对成都平原洪灾,充分利用自己从江汉平原长江沿岸地区积累的防洪排涝的经验,开展了一系列以宣泄洪水为目的的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华阳国志》也称“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据学者研究,此玉山,或玉垒山,即鳖灵治水之处,在历史上泛洪集中的岷江上游,今都江堰宝瓶口。鳖灵决玉山,其目的正在于分引岷江之洪水入沱江。相传沱江的金堂峡也为鳖灵开凿。近年来成都市发现了一些属于东周时期的水利设施和治水工具,这可能也与迁都成都后,开明氏对岷江进行整治的水利工程有关。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进一步推动了蜀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秦灭巴蜀后8年,司马错率师“浮江伐楚”,迅速征集到“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由此证明开明王朝晚期蜀国经济之富饶。在军事上,开明

此从扬雄《蜀王本纪》之说。
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

王朝显示了比杜宇王朝更为强大的实力。史称开明二世时，“卢帝攻秦，至雍”，即兵锋已跨过秦岭，直达处于强盛时期的秦国首都雍（今陕西凤翔）。史又载：“卢帝生保子帝。帝攻青衣。”其兵力已攻取在今雅安地区中部的青衣，这对防御川西高原的山地民族进犯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嗣后，蜀王又南攻在今宜宾地区的夔道、故焚侯国，并曾在此驻扎过军队，故“夔道有故蜀王兵兰”的遗迹存在。《史记·六国年表》又有“蜀取我（秦）南郑”的记载。此后，南郑一直为蜀所据，直至蜀亡。所以《华阳国志》也说：“周显王之世（公元前386～前321年），蜀王有褒、汉之地。”同时，蜀王还挥师东向，越过涪水，进至阆中及其附近地区，并一度顺江东下，与楚国争雄。所以《史记·楚世家》载：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此时正值楚国强盛之际，蜀国能进取在今湖北松滋、长阳的兹方、捍关，构成对楚国的西部威胁，证明蜀国势力强大到了不可等闲视之的程度。

开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实力的增强，改变了它与近邻世仇巴国的势均力敌的关系。关于巴国的起

源，古文献歧说纷纭，学术界的见解莫衷一是。就古代传说而言，有主巴源于黄帝、太皞者，还有认为巴源于丹山、廩君，以及源于周之宗姬者。关于巴国的疆域，《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夔道（今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今川、鄂、湘、黔边）。”在如此广阔的地域里，各个不同时期留下巴国迁徙的记载。其大体情形是：商周时代，据有汉中东部。西周初年，巴为周之南土，立国于汉水、大巴山之间。春秋初叶，巴国在楚、邓之西。春秋末叶，巴国南下，辗转入川，国都不断迁移，先后在枳（今涪陵）、平都（今丰都）、江州（今重庆）、垫江（今合川）等地建过都，最后迁治于阆中。由于巴国入川，与蜀国邻敌，互争雄长，经常发生争城夺野的战事，所以史载：“巴与蜀仇”；“巴、蜀世战争”。到了开明王朝时期，蜀国势力强大，而巴国势力日蹙。巴蜀地区的众多小国逐步沦为蜀国的附庸，巴国无力与之抗衡。所以《蜀王本纪》说：这一时期，“蜀王据有巴蜀之地。”开明王朝事实上已成为控制巴蜀的霸主。

先秦时期四川的民族，除巴、蜀两族外，还有众多的族类。其中，在川东

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

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

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

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

常璩《华阳国志》卷3《巴志》。

的巴地,主要有“濮、賨、苴、共、奴、獯、夷、蛮之蛮”。在川西及川南,则是汉代所谓的“西南夷”。大体说来,各系的分布范围是:百濮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川西南和川东;氐羌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部分进入成都平原;百越仅见于川东一部;华夏则多不成系统,混融于四川盆地各处。上述民族支系复杂,发展也不平衡。除开明王朝和廩君巴国已有奴隶制度外,其他各部则比较落后,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原始的氏族制度。

先秦时期巴蜀境内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从考古学意义上来划分,战国时期的四川文化一般统称为巴蜀文化。而其中,尤以巴蜀青铜器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开明王朝时期的青铜器文化可以新都马家乡木椁大墓和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为代表。学术界根据新都墓葬的地望及葬制规模推论其可能是开明王九至十一世的墓葬。百花潭十号墓除出土大量青铜器外,还出土了一件错银铜壶,上中下三层嵌有采桑、习射、宴乐武舞、狩猎、水陆攻战等精美图画,十分罕见。在涪陵小田溪清理发掘的三座统治者墓葬,可作为战国巴蜀青铜器文化在川东地区的代表。在这些青铜器中,又以巴蜀青铜兵器最富特色。如蜀国青铜兵器以戈、矛、

剑、钺最富特色,有别于商周同类兵器,自成体系。巴国青铜兵器则以巴式剑、钺、矛、戈最富特色,巴蜀青铜器上多有巴蜀符号。此外,青铜礼器、乐器也在巴蜀青铜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从出土的巴蜀青铜文物反映出,这一时期巴蜀青铜器的铸造水平十分高超,其所掌握的青铜合金技术和工艺,与同期中原地区相比,不仅毫不逊色,有的甚至是中原诸夏所不能及的。从某些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看,巴蜀青铜文化中明显地融入有中原和楚文化的成分,这也反映出随着战国时期巴蜀与列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日益扩大,尤其是全中国逐渐走向统一的步伐的加快,因此在文化中必然出现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格局。

巴蜀各族人民在文化方面的创造,还表现在语言文字、音乐舞蹈、雕塑艺术和大石文化遗迹上。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以及其他诸因素所决定,巴蜀文化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色。早期的蜀族在语言上与中原很不相同,被称为“蜀左言”。古蜀的文字,从出土的巴蜀铜器上发现,可分为表意文字和象形文字两大类。表意文字的特点,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象形文字,即学术界通称的“巴蜀图语”符号,往往铭刻在巴

蜀青铜器、漆器和其他器物上。目前,这类“巴蜀图语”符号的单符已发现一百余种,成组的复合符号现已发现二百余种。巴国由于其王族出自姬姓,其语言与中原诸夏相同,文字也使用中原诸夏文字,即汉语古文字。但在巴国的青铜器和印章上,往往有许多源于川西蜀国的“巴蜀图语”符号,表明巴人也借用蜀的古文字。古代巴蜀人民能歌善舞,其中尤以巴人彪悍劲勇的巴渝舞最出色。据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巴渝舞属于古代武舞,即战舞类型,其舞风勇武刚烈,音乐铿锵有力,前歌后舞,气势浩大,威武雄壮,能产生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入汉以后,这种乐舞被移入宫廷内,成为宫廷乐舞的一种。蜀人对音乐也十分爱好,出土文物中常见各种古代乐器的图像。文献还提到开明王亲自作歌,曲名有《舆邪曲》、《陇归之曲》、《幽魂之曲》等,但这些词曲均已亡佚。巴、蜀的雕塑艺术富于特色,水平颇高,主要体现在铜器的纹饰和造型上。巴、蜀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以虎纹和螭纹居多,纹式精美多变。纹饰手法,有立雕、浮雕、平雕、浅刻、镶嵌等,集多种手法于一器,丰富多彩,形象逼真,具

有很强的立体感。最富特色的是嵌错金、银丝等精美工艺的运用,更使巴蜀的雕塑艺术达到新的高度和水平。在蜀地流行大石崇拜的文化传统,这是蜀人宗教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崇拜形式。由此所存留下来的大石文化遗迹遍布蜀地,可分为墓石、独石、列石三类。其中,墓石集中分布在川西南安宁河流域,墓上的大石通常重达数千斤,甚至逾万斤。独石集中分布在成都市,主要有西城的石笋、支机石,东城的天涯石,北城的石镜、五丁担、南城的五块石等。列石,或称石行,亦称石阵,如新都的旱八阵,双流的八阵图,新繁的飞来石等,皆属此类。这些大石遗迹决非天然生成,尽管学术界对其形成的原因和时间有各种不同解释,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但它们作为古代人力开采、运输的对象所反映出来的巨大创造力、表现力,不能不令人惊叹。

在开明王朝统治的晚期,史载至开明十二世“蜀有桀、纣之乱”,指的是蜀王封弟于汉中,号苴侯,苴侯却私下与蜀的世仇巴国交好,惹怒蜀王。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巴、苴和蜀同时向秦求救,这就为早有灭蜀准备的秦国提供了出兵伐蜀的机

常璩《华阳国志》卷1《巴志》。

《战国策》卷3《蜀志》。

常璩《华阳国志》卷1《巴志》。

会。

战国时期,巴蜀北方的秦国,国富兵强,四面扩张,早有灭巴蜀统一天下的野心。相传秦惠王用计欺骗蜀人,使之修建由汉中入蜀的石牛道(或称金牛道),铺平了秦军伐蜀,蜀国自取灭亡的通道。在秦国大臣们就兴师伐蜀而展开的争论中,与大夫张仪主张东伐韩,逐鹿中原,以成王业的意见相反,大夫司马错则主张南伐蜀。他认为:“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船舶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惠文王采纳

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建议,于当年(公元前316年)秋,遣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大军从石牛道入蜀,南伐蜀国。蜀王在秦国大兵压境面前,仓卒应战,亲自率军在葭萌(今广元昭化)迎击,为秦军所败。蜀王败逃至武阳(今彭山县东北),为秦军追杀。蜀太子及丞相、太傅率残部再逃至逢乡,败死于白鹿山(今彭县北)。冬十月,蜀平。“贬蜀王更号为侯”。至此,立国川西的蜀国宣告灭亡。接着,秦移师东进,取巴之江州、阆中,俘虏巴王,川东的巴国由是灭亡。

二、秦汉时期

(一)秦在巴蜀的统治

秦统治巴蜀的时间长达110年。对于巴蜀地区说来,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秦并巴蜀后,首先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逐渐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巴蜀王国的分裂状态。在推行郡县制的过程中,秦国最初曾在蜀地试行分封制,即分封蜀王的后裔为侯,通过他们来进行统治。结果,效

果不理想,分封的三任蜀侯均发生反叛。在经过30余年的过渡后,秦终于取消蜀侯分封制,改而推行郡县制,这样便将巴蜀地区直接置于秦国中央的统治之下。秦初立巴、蜀二郡,后又从巴蜀分置汉中郡,据《华阳国志》载,秦时巴蜀三郡共置31县。

与此同时,秦还把商鞅“坏井田,开阡陌”的社会经济制度推广于巴蜀地区,颁布了《为田律》。在青川县郝

《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

《史记》卷70《张仪列传》。

家坪的秦墓中,发现了一块秦木牍,上面便记录了巴蜀地区推行田律的政令。如规定田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每步六尺)为一亩,百亩为顷。一亩地的两端要修畛(田埂),一顷田边要修一条宽三步的道路;还规定了芟除杂草、修整道路、水沟,兴修水利的时间等等。封建私有土地制的确立,以及先进耕作制度的推广,对促进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

秦在巴蜀的统治,早期主要是围绕军事征服行动而展开的。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秦并巴蜀后,首先将中原筑城的传统照搬到四川。首批修建的城邑有:成都(今成都市南)、郫(今郫县郫筒镇)和临邛(今邛崃临邛镇)三座城池。其中,成都城颇具规模,“与咸阳同制”。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分为“大城”和“少城”,两城东西并列,内部街道、闾里等等一切规制,与秦国首都咸阳相同。郫县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围六里,高五丈。各城墙上设有供瞭望的“观楼”和储放弓箭的“射兰”,城下有储藏粮食的粮仓。三城互为犄角,军事上的防御功能是十分明确的。此外,在川东的江州(今重庆市),以及阆中、武阳(今彭山县东),也有秦时筑城的记载和遗址。

在秦灭巴蜀不久,为了加强和巩固在当地的统治,秦惠文王鉴于“戎伯

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从此首开了向巴蜀移民的先河。秦向巴蜀地区移民、徙徒与迁虏的时间很长,最初被强迫移来巴蜀的上万家的“秦民”,成为秦统治巴蜀的基本依靠力量,用以对付当地实力尚强的地方势力——“戎伯”。其后,秦国还把流放的罪人迁入巴蜀,以适应开发边地的需要。为了削弱六国的统治基础,秦在翦灭六国后,又不断将俘虏的六国的统治者、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及手工业者迁离故土,大部强徙于巴蜀。随着这次大移民运动的开展,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冶铁技术开始传入巴蜀。如赵人卓氏、山东程氏,以冶铁为业,徙居临邛,招民开矿,冶炼铁器,在滇蜀两地贩卖,因此成了巨富,而巴蜀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秦统治巴蜀的后期,巴蜀地方长官以李冰政绩最为突出。李冰是继司马错、张若之后,担任蜀郡第三任太守的。关于守蜀的时间,古籍记载多有出入,据学者考证,认为《风俗通》和《水经·江水注》所载秦昭王时以李冰为蜀守的说法,较为可靠。如此,则李冰治蜀的时间,从公元前277年起,至公元前238年“金”任蜀郡守之前,时间较长,这就为他在蜀中大干一番事

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李冰治蜀,政绩卓著,主要表现在创建都江堰,疏通成都“二江”,完善成都城,创凿广都盐井,兴修农田等方面。其中,尤以治水业绩最为突出。李冰在古蜀国长期治水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原有的水利设施,领导蜀郡人民在川西平原上修筑了后来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这一无坝取水自流工程的创建,在世界水利史上也是罕见的。它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构造了符合科学原理的渠首枢纽工程。这一工程以都江堰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部分为主干。鱼嘴的作用是分流引水;飞沙堰的作用是泄洪排沙;宝瓶口的作用是控制内江的流量。李冰还“作三石人、立三水中。与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作为观察水量的标尺。长期被奉为都江堰维修原则的六字要诀:“深淘滩,低作堰”,据传也是李冰所总结概括出来的。与都江堰渠首枢纽工程相配套,李冰还领导蜀郡人民完成了疏淘开凿成都“二江”的工程。二江即郫江和检江(流江),原有部分自然河床段,李冰对其进行改道、疏淘、加宽,使之与都江堰分流出来的“内江”相连通,由此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水利系统,共同发挥着防洪、水运、灌溉以及生活用水的综合功能作用。这就奠定了今天都江

堰灌区与成都府南河的水利建设的基本格局。直至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它仍对四川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此外,经李冰治理疏导开凿的水利工程,还有石犀溪、羊摩江、文井江、洛水、绵水等处。这些江河的治理,对进一步开发成都平原及其附近的山区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统治巴蜀 95 年,即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翦灭六国,天下统一。过了 15 年,即公元前 206 年,以项羽、刘邦为代表的反秦武装推翻了秦朝。至此,秦对巴蜀的统治也宣告结束。

(二) 西汉王朝对巴蜀的统治

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统治全国,史称西汉。

1 早期 西汉早期的巴蜀历史,主要围绕建立和巩固刘邦政权而展开。各路反秦武装联合推翻秦王朝后,项羽因兵众势大,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于是刘邦尽得巴蜀三十一县,定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偏安一隅。后来,刘邦巩固了后方,以巴蜀为基地,兴兵反对项羽,自故道(沿嘉陵江河谷越大散关之路)入关中,平定三秦(指项羽为防范刘邦,分封秦故将吏三人于关中,籍地在咸阳东、西及上郡一带)。接着,又挥军东进,逐鹿中原,

见罗开玉《四川通史》第 5 册,第 21 页考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华阳国志》卷 3《蜀志》。

逐渐转为优势。公元前 202 年,刘邦进攻项羽,项羽兵败垓下(今安徽灵璧)退至乌江(今安徽和县)自刎。在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期间,巴蜀地区一直是供应汉军粮食、兵源的后方基地。史载刘邦还定三秦时,留萧何镇守汉中,“收巴蜀租,给军粮食”,保证汉王东伐,“足食足兵”。在刘邦的汉军中,一支由賚民组成的“前锋”,“陷阵,锐气喜舞”故刘邦称赞说:“此武王伐纣之歌也。”因此,后来刘邦下令:“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这表明,在刘邦建立汉朝,统一国家的斗争中,巴蜀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汉朝建立后,刘邦两次大封诸侯王。由于巴蜀地区是“王业所兴”之地,因此由皇帝直接统治,不再封藩王。西汉早期在巴蜀的统治区域,大体限于盆地之内,盆地四周多为土著民族所控制。由于汉朝初兴,中央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矛盾重重,无暇西南顾,所以放弃了在滇、黔之地的统治,下令关闭蜀地故徼,限制土著民族与内地的交往。汉朝廷还承秦制,继续向巴蜀边地大规模移民。徙徙,并在民族聚居地区兴建城市,如高后六年

(公元前 182 年)修建了焚道县城等。

西汉早期,巴蜀地区又是汉王朝经常用以赈济饥民的大粮仓,在刘邦出击三秦时,关中大饥,人相食。刘邦下令关中百姓“就食蜀、汉”。在战败项羽后,关中、关东饥馑,刘邦再次下令,允许百姓到巴、蜀、汉中逃荒。这表明西汉早期的巴蜀,仍不失为巩固汉朝统治的后方基地。

西汉早期,巴蜀地方长官中以景帝末年(公元前 141 年)的蜀郡守文翁最为杰出。文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自幼好学,精通《春秋》。为蜀郡守,带领蜀地人民穿湔江口,引湔江水灌溉郫县、繁等地农田千七百顷。好教化,他见郡号偏僻,犹存“蛮夷风”,决定兴教育以改革民风。于是,从郡县小吏中选取聪明有能力的张宽等十余人,送至长安,就学于博士。又在成都兴办石室讲堂,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免除徭役,成绩优良者为郡县吏。从此,蜀地风气大为转变,很快达到学比齐鲁的水平。到汉武帝时,嘉奖文翁之政,并令各郡国皆仿蜀郡办学。一时间,全国各地皆立学官。文翁后来终于蜀。蜀人为之立祠,他因此成为巴蜀人民世代纪念

《汉书》卷 1《高帝纪》。

《华阳国志》卷 4《汉中志》。

《华阳国志》卷 1《巴志》。

《汉书》卷 1《高帝纪》。

《汉中》卷 1《高帝纪》。

《汉书》卷 24《食货志》。

的杰出的地方长吏和教育家。

2 中期 西汉中期的巴蜀历史,主要是围绕武帝以巴蜀为基地,开发西南夷的历史展开的。汉武帝时曾两次进兵西南夷地区:第一次进兵是因攻打南粤引起的。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派大将唐蒙出使南粤(都城在今广州)。唐蒙了解到从巴蜀南,通过牂牁江,从水道可至南粤的路线,便建议武帝借蜀南夜郎兵力,从牂牁江出奇兵攻打南粤:“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为置吏,易甚。”汉武帝遂拜唐蒙为郎中将军,率兵士千人,从巴郡县(今合江)笮关出兵,进入夜郎,说服夜郎及其旁小邑臣服于汉。于是,汉武帝以今川南部分地区并新辟夜郎国之地,设立了犍为郡。汉武帝还派司马相如持节回蜀,招谕蜀郡西边、西南的邛人、笮人、冉駹、斯榆等少数民族部落,使得许多部落首领皆愿内附,以至一时间“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汉王朝由此又在这些地方新置了几个都尉和一些县。

武帝第二次进兵西南夷,是由寻找通身毒、大夏的道路引起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对武帝说,他在出使大夏(今阿富汗)时,见到的蜀布和邛竹杖,是从身毒(今印度)得来的。由此他推想自西南夷通往身毒一定不远,便建议武帝出兵打

通从四川经云南西部到身毒的道路。于是,汉武帝又命使者十余批前往蜀地,分若干路入云南,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正当武帝积极部署准备之际,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粤反,汉兵五道讨伐。其中,一路是由巴蜀下牂牁江,并征调西南夷士兵参战。且兰部不愿出兵,首先造反,由此波及南夷和西夷部落参加反抗。武帝调兵平叛,为巩固其在边地的统治,又在西南夷之地设置了牂牁郡(在今贵州、云南境内),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白马氏之地(今甘肃南部)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在滇地置益州郡。至此,西南夷的大部分地区归入汉朝版图。汉武帝继秦始皇之后,再次掀起开发边疆的高潮,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郡县。这对于加强这些地区同内地的联系,促进各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共同进步,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3 后期 西汉后期的巴蜀历史,主要是围绕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展开的。武帝开发西南夷,广设郡县,多驻军队,加重了各族人民的负担。武帝以后,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加上官吏的贪污,官府实力日见衰弱,致使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自武帝之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汉书》卷57《司马相如传》。

后,历昭帝、成帝之世,西南地区即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起义。与此同时,封建王朝的压迫剥削,也激发了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成帝时,全国各地农民起义不断。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刑徒郑躬发动起义,率众攻取官府,夺取兵器,攻打官府富豪,声势日振。郑躬自称“山君”,起义波及附近四县,兵众万人,给了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起义持续了一年才被镇压下去。

当农民战争迫在眉睫,西汉王朝摇摇欲坠之时,公元8年,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王莽篡汉,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的重大事件。王莽建立新朝后,倒行逆施,实行所谓的“改革”,按照《周官》、《王制》更改职官名和郡县地名。据《汉书·地理志》,益州地区至少有39个郡、县名称被改动。如改益州为庸部,汉中为新城、广汉为就都等等。此外,王莽还四处挑动民族矛盾,激起西南少数民族的反抗。王莽又征发巴、蜀、犍为的士卒前往镇压。结果,士卒饥疫,三年间死了数万人。这就为巴蜀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准备了条件。

(三) 公孙述割据益州

公孙述割据益州,是发生在西汉末年四川地区历史的重大事件。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王莽时为导江卒正(蜀郡太守),治邛崃。王莽末年,爆发了以绿

林、赤眉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政权瓦解,汉朝宗室刘玄在南阳称帝,建元更始,益州境内,有农民刘辟起兵于广汉郡内,商人王岑起兵于雒(今广汉县境),南阳人宗成占领汉中,入蜀。一时间,王莽政权在蜀中的统治土崩瓦解。公孙述遣使迎宗成入成都,后又乘时将其消灭,为其割据四川奠定了基础。公元24年,公孙述又在绵竹打败刘玄派来的军队,从此声势更盛。次年,自称“成家皇帝”,国号曰“成”,或自称“大成”。

成家政权在益州的统治共存在了12年。其建树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承袭汉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在朝廷置三公九卿,不设丞相,文武百官各有职守。实行分封制,除分封其子为王外,还对前来归顺的外地首领加封为王。在行政区划上,推行朝廷直辖各郡的制度,广刻“天下牧守印章”,委以虚职。在经济上,置钱线官,废除行用已久的五铢钱,另铸铁钱,强制使用,结果使得“百姓货卖不行。”在军事上,大作营垒,屯聚粮草,扩充军队达数十万人之多。不断派兵外拓,北守南郑,东至荆门,公孙述甚至还准备自率兵马,北取三辅。在思想上,公孙述制造《图》、《讖》,以此作为立国称帝的理论基础,对敢于反抗的儒士,大加诛杀。公孙述据蜀,“淫恣过度”,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引起官

吏百姓的不满。益州地主官僚中很多人对公孙述采取抵制态度,甚至以死相拒,不为所用。加之公孙述任人唯亲,排挤人才;“唯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最终导致众叛亲离,归于失败。公元36年,当刘秀的东汉王朝得到巩固后,迅即派大将岑彭等大举伐蜀。汉军溯长江、岷江而上,节节胜利,在武阳大败公孙述军,进逼成都,公孙述败死,成家政权灭亡,西南地区重归于汉。

成家政权是自秦入巴蜀后的第一个割据政权。当这个政权结束其在益州的12年(公元25~36年)的割据统治后,开始了东汉王朝在巴蜀的统治时期。

(四)东汉王朝对巴蜀的统治

1 早期 东汉早期,刘秀鉴于益州统一之初,亟需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故在蜀地采取了一些安抚民心,恢复生产的措施。其中,曾两次下诏释放奴婢,宣布凡在公孙述时被掠为奴婢者,皆免为庶民,从而使一部分穷苦人民的社会地位多少得到一些改善。针对大批失去土地的中原、关中流民大量涌入巴蜀,东汉政权还曾经采取吸引流民定居的措施,允许贫穷无田者流动,并提供粮种农具,免租五年,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东汉早期,巴蜀豪族大姓势力已相当发展,益州地区的各级统治者基本上都是以各层豪族地主及其子弟为骨干。官吏富商互相勾结,获取资货。史载永平年间,蜀地“人吏富实,椽史家货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但由于当时地方政治还比较清明,所以巴蜀地区也出现了一批敢于抑制权贵豪强的能臣。如广汉太守蔡茂,以儒学闻名,王莽篡政,避而不仕。东汉平蜀后,任广汉太守。有前朝贵戚阴氏宾客,多次犯法,无人敢制。蔡茂派人收捕,从重处罚,境内遂靖。后又上书武帝,劝谏他限制贵戚,官至大司徒。蜀郡太守第五伦,针对蜀中行贿受贿之风泛滥,上任后将行贿受贿之辈,及家产殷实的官吏,一律罢免,另选孤贫志行之人接替。同时,第五伦带头节俭,常穿普通布衣上街巡视,并亲自饲养牛马,其妻则自己煮饭等,领俸禄时带头领取红米,由此蜀中吏风迅速好转。第五伦还以知人善荐闻名于朝,后官至大司空。这些能臣循吏政绩显著,受到当时百姓的称颂。

2 中期 但到东汉中期以后,巴蜀豪族势力空前发展,以至成为一股控制地方政治、经济的重要力量。这些豪族势力,一般占有土地千亩以上,拥有家产100万钱~1000万钱之间,在

《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后汉书》卷71《第五伦传》。

《太平御览》卷431引《东观汉纪》。

一县之中属大族之一。更有甚者,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上万亩,家产在一千万以上,为几个邻县或一郡中的大族望门。他们掌握大量钱财,兼并大量田地山林湖泽;结成一个个自给自足的豪族庄园或几个庄园的共同体;以宗族关系为纽带,掌握大量依附农民,拥有数量众多的奴婢;参与、控制各级政权统治;甚至垄断文化教育;掌握武装,拥兵自重;彼此联姻,形成宗亲、姻亲纵横交错的政治、经济关系网。他们凭借世袭的政治特权和经济上的垄断特权,在吮吸农民、奴婢血汗的基础上,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

3 晚期 东汉晚期,巴蜀地区的政治日趋腐败,地方官吏贪赃枉法,恣意横行,加深了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安帝时(107~125年),先后几任巴郡太守腐败无能,邑人以诗讽之曰:“明明上天,下土是观。帝选远后,求定民安。孰可不念,祸福由人。顾君奉诏,惟德日亲。”安帝时蜀郡太守李根,年老昏庸,乱发号令,法纪废弛,吏治不修,上下一片怨声。至桓帝时,巴郡太守李盛贪财重赋,当地人民以歌谣讽刺说:“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

东汉、中、晚期,巴蜀地区多次爆发

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差不多都与宗教,尤其是早期的道教有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黄巾起义。中平元年(184年),震撼全国的黄巾大起义爆发,迅速波及益州。益州的黄巾起义,由早期道教即五斗米教组织,首先由巴郡教区的张修领导发动。义军一度攻占江州(今重庆)及一些县城,大杀贪官污吏。与此相呼应,在成都平原,有马相、赵祗在绵竹(今德阳黄许镇)自称“黄巾”的起义。黄巾军在短期内发展到十余万人,马相自称天子,建立政权。又派兵进攻巴郡,杀太守赵部,锋芒遍及嘉陵江、渠江诸城。义军所到之处,杀官吏,铲豪霸,分钱帛,深得人心。马相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和东汉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后被益州从事、犍为豪强地主贾龙的武装所镇压。

东汉末年,巴蜀政治上的重大事件,一是刘焉父子据蜀,二是张鲁据汉中。

刘焉,字君郎,出生于江夏竟陵大族之家,属西汉景帝之子鲁恭王的后裔。刘焉年青时,先后任州郡之吏,后升中郎。灵帝时,朝廷采纳刘焉建议,用州牧之制代替刺史之制,使地方州牧权重一时。中平五年(188年)夏,朝廷派刘焉出为益州牧,以镇压巴蜀

《华阳国志》卷1《巴志》。

《华阳国志》卷1《巴志》。

的黄巾起义。刘焉为了达到割据巴蜀自立为王的目的,重用和发展外来势力,大肆招纳各地叛离者,抑制土著豪族势力,借口诛杀巴郡太守王威、李权等蜀中豪族,接着又依靠外来的“东州士”集团,镇压了以犍为太守任岐和贾龙为代表的蜀中豪族大姓的反抗,巩固了在益州的统治。此后,刘焉踌躇满志,大量建造皇帝用的车舆器服,模仿京城之制,明目张胆地准备登基称帝。初平四年(193年),刘焉逆谋暴露,留在长安作内应的长子刘范、次子刘诞被诛。194年,刘焉因发背疽,死在成都。他的第三子刘璋继任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至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刘璋出降,由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益州26年的统治始告结束。

张鲁,字公旗,沛国丰(今江苏徐州)人。祖张道陵,父张衡,世为天师道教主,鲁自号“师君”。刘焉为益州牧时,为了抑制土著豪族,对付忠于朝廷的汉中太守苏固,拉拢五斗米道势力,封张鲁为督义司马,命其与张修袭取汉中。在诛杀苏固后,张鲁又杀张修,并其众。刘璋为益州牧,张鲁“不复承顺”,璋杀其母及弟。于是,张鲁遂袭取巴郡,雄据汉、巴,建立起又一个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此政权存在了近30年,汉朝无力征讨,遂拜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中太守,直至建安

十七年(212年)始降曹操。

(五)秦汉时期巴蜀经济的全面发展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置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迅速赶上并达到全国先进水平,由此形成了四川历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

在秦王朝的治理下,巴蜀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都较以前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更大的发展。成都平原被开发成为全国知名的经济区,史载溉灌三郡(蜀、广汉、犍为三郡)溉田万顷,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古人称赞说:“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巴蜀的经济资源得到不断开发,巴蜀的物质财富源源不断地送到关中,巴蜀的商品不仅运到全国各地,其中的蚕丝、蜀布、蜀锦、邛竹杖等,还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销至东南亚、南亚诸国。巴蜀的交通得到发展。秦置蜀郡后,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展,在统一六国前后,先从关中筑“栈道千里”,通于巴蜀;接着又遣常頔“略通五尺道”,修筑了从成都至夔道(今宜宾地区)进而南通云、贵的五尺道。巴蜀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以至在秦及汉初时期,六国人士普遍把巴蜀与秦看成是同一地域,即视为秦统治下的“关

中之地”。正因为如此,巴蜀才能以其雄厚的“殷富”,在秦灭六国前,为秦统一天下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兵力;在楚汉战争期间,又为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充当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两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经济,在秦统治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水平逐渐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内地。《汉书》和《后汉书》描写当时巴蜀的富饶程度是:“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可见,两汉时期的四川地区,已跃居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战国至西汉前期,一般以关中为最富饶的地区,故称之为“天府之国”。但到东汉,关中已称为“近蜀”,表明“天府之国”的美称已逐渐从关中移到了蜀中。所以,当东汉末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便正式称“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从此,“天府之国”的美称,当之无愧地落在四川地区。

两汉时期四川地区的这一跃居全国上乘的经济地位,是由农业、手工

业、商业、交通等各业和人口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其表现在农业方面,基本变化是:铁农具与牛耕的出现与普及,耕地面积迅速扩大,随着农田水利的普遍推广,过去长期停留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阶段的地区转入精耕细作,农作物品种不断扩大,在平原浅丘地区由粗放型农业向精耕型农业发展。与此相适应,小农经济逐渐取代了家族经济,从而使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除粮食外,四川还普遍利用稻田养鱼,这是古代巴蜀人民的一大创造,也是对我国渔业的一大贡献。从四川东汉墓出土的陶田模型中,便置有鱼的模型,可见蜀地的稻田养鱼,在汉时已相当普及,并培养了专门的鱼种,在外地具有一定的影响,曹操在《四时食制》就说:“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此外,作为重要经济项目的牧业、饲养业、园植业,也由于人口的剧增,需求的增加和交通条件的便利,而在两汉四川地区得到较大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四川地区户数为765048,口数为3514217,到了东汉,四川人口有很大增长。永和五年(140年)四川地区户数为1175457,口

《汉书》卷28《地理志》。

《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太平御览》卷936引。

《汉书·地理志》。

数为 4699226 。表明这 138 年间四川人口增加了将近 120 万人 ,即增长了三分之一。四川人口在全国的比重大为增加 ,元始二年四川户数仅占全国的 6.2% ,永和五年则增加至 12% 。

在手工业方面 ,两汉较之于秦 ,在四川地区的新变化是 :许多新的手工业部门 ,如冶铁、井盐 ,以马车为代表的交通工具系统 ,迅速兴起和发展 ;另一方面 ,一些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又有了空前的发展 ,如冶铜、陶瓷、木工、造船、竹工、漆器、纺织等。巴蜀铁器初兴于秦 ,铜铁并用。到了西汉初期 ,铁器进一步普及 ,兵器领域出现剑、戟、矛等纯铁器 ,铜器大幅度减少 ;而在手工业领域和生活用品方面 ,则基本为铁器取代 ,西汉中期以后 ,在兵器、工具、农具、日常生活用具诸领域 ,铁器得到全面普及。四川的冶铁业在西南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巴蜀地区以先进的制钢技术所生产的百炼钢 ,闻名全国。盐井业较秦有较大的发展 ,盐井大幅度增加 ,至西汉晚期 ,巴蜀已有十余个县产盐。仅宣帝时期便在临邛、蒲江新开盐井 20 所。在西汉成、哀间 ,成都人罗裒往来成都、京师 ,以经营盐业致富。盐井开凿技术不断进步 ,由李冰时“穿广都盐井诸陂池”到东汉时期 ,据画像砖资料 ,井口能容 1 ~ 2 个直径约 40 公分的汲卤桶出入 ,

井口直径约在 60 ~ 130 公分之间 ,这在全国井盐史上具有开启先河的意义。巴蜀地区以蜀布、蜀锦为代表的纺织业 ,在全国仍占有重要地位。其中 ,以西蜀的织布业水平最高 ,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盐铁论·本议篇》拿“蜀郡之布”与“齐阿之缣”相对举 ,表明它们均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精品。扬雄《蜀都赋》更赞其为“其布细都弱折 ,絺茧成衽 ,阿丽纤靡 ,避晏与阴。蜘蛛作丝 ,不可见风。”成都一直是秦以及两汉时期蜀锦的管理中心、生产中心和集散中心。流经成都的“二江”两岸 ,分布着众多官营、私营、大小不等的纺织作坊 ,即所谓“伎巧之家 ,百室离房 ,机杼相和 ,贝锦斐成” 。成都因此称为“锦城”、“锦官城” ,流经成都的“二江”之一的南河又名锦江。由成都生产的蜀锦 ,称为贡品 ,进贡朝廷 ,行销全国各地。近年来在长沙马王堆、湖北云梦等地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古锦实物 ,考古界普遍认为产于西蜀。在成都发现的东汉石刻上 ,发现的织布机和织锦机的图像 ,皆为足踏织机 ,系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 ,也是蜀锦闻名天下 ,革新织机技术的见证。当铜容器开始衰落 ,瓷器还处在早期模索阶段时 ,漆容器因其美观、轻便、耐用、不易破碎 ,而成为日常生活中的

《续汉书·郡国志》

左思《蜀都赋》。

时髦产品。巴蜀漆器久负盛名,早在秦统治时期,西蜀漆工已首创在木胎刷灰后再涂漆的工艺,约从东汉开始,又开始流行陶胎漆器。由西蜀漆工首创的扣器,堪称巴蜀漆器的代表作。这些由工官生产的漆扣器,由朝廷拨款,产品以质量、工艺为先,其中还有用金、银镶按而成的,称为金银器。《盐铁论·散不足》称:“今富者银口黄耳,金错蜀杯。”这类漆器,价值昂贵,主要供朝廷调用,故漆铭中多见“乘舆”、“大官”、“尚方”等文字。此外,两汉时期巴蜀的陶瓷、玻璃、玉器,在生产制作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铁器的普及和砖瓦术的应用,两汉时期巴蜀的城邑、道路桥梁和房屋的建筑,有了飞跃的发展。近年来发现的东汉严道城,为我们了解汉代巴蜀地区县级城邑的布局 and 建筑方法提了重要资料。从大量画像石、画像砖、出土的陶房等资料看,汉代蜀地城邑中的房屋建筑,是以平面铺开、彼此衔接、相互配合的群体为主要特征的。房屋建筑的高度,过去巴蜀盆地主要流行一楼一底的“干栏”式建筑,到两汉时期,民间已推广3~5层的楼房建筑,公孙述称帝后,在成都曾建造了一幢十层楼房,楼边配置射兰。在建筑物外修建阙门,是汉代四川建筑常见的作法。四川境内迄今仍保存着20余处汉阙实物。四川的汉阙,大体分为城阙、里阙、庙阙和墓阙。

在商业方面,与同期关中、中原等地相比较,巴蜀商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系统性,与周围民族联系紧密,以及长距离跨国贸易发达等特点。从西汉初期开始,巴蜀地区从“亭”中分化出专门的“市”。随着经济的繁荣,在蜀地形成了一些中心城市。成都工商业的迅速繁荣,它不但是西南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西南的商业贸易中心。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末成都有76000多户。按人口计算,仅次于长安,为西汉第二大城市。王莽时在全国六大都市分别设市,成都为西市,在经济地位上也居于全国的前列。临邛是仅次于成都的又一个经济中心城市,西汉时这里的盐、铁矿藏首先得到大规模开发,卓氏和程郑修居临邛冶铁,使临邛成为全国闻名的冶铁中心。王莽篡政时,临邛成为蜀郡太守(卒正)的治地,公孙述割据称王前,一度把郡治移往临邛,表明其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了。此外,成都东北方的广汉也是在经济上繁荣、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中心城市。

在交通方面,两汉是古代巴蜀地区水、陆交通大发展,并形成基本格局的重要时期。在秦时巴蜀水陆交通网罗初步形成基础上,两汉进一步拓宽道路,使过去只能供人、畜行走的窄道,变为可通马车的大道,为保证道路畅通,进一步完善管理,使官营为主的干道四通八达。到两汉时期,沟通巴

蜀与国内各地的道路共有以下几条：

嘉陵道，又名周道、故道、陈仓道，为联系关中、汉中的道路；褒斜道，又名斜谷道、石门道，为沟通关中与巴蜀的主要交通路线之一；子午道，为沟通汉中与关中的山道之一；褒骆道，为沟通关中、汉，进而入蜀的大道之一；剑阁道，又名金牛道、石牛道，为由汉中入蜀的主干道；阴平道，又名左担道，为沟通古代陇、蜀的要道；

米仓道，为沟通汉中与川东北的山道；旄牛道，又名青衣道、南路、会同路，为成都南出的要道之一，其中成都至越嶲段，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段；越嶲道，又名中路，为联系四川盆地与川南、与滇的要道之一；僰道，又名五尺道、北路、牂柯道，为联系巴蜀与滇、黔的要道之一。除以上十条国内通道外，巴蜀还有通过云南，连接缅甸、印度等国的国际交通路线。这条被称为川滇缅印古道，与汉代北方经西域的丝绸之路相对应，因此又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除陆路交通外，巴蜀地区还有通过长江上游水系联系，沟通巴蜀与楚吴的水上干道。

(六)秦汉时期巴蜀的民族

秦汉时期是中央王朝大力开拓西南边疆，使西南少数民族同内地联系进一步加强的重要发展阶段。秦国通过扫荡蜀王开明残余势力，不断向巴蜀周边民族地区发展，通过修筑五尺道，在今云、贵、川接壤地带开设郡县；

这些举措，使得巴蜀境内少数民族置于中央王朝之下。汉武帝以巴蜀为基地，两次进军西南夷地区，再次掀起开发边疆的高潮。秦汉时期四川境内少数民族的分布概况是：在今川东北地区主要活动着板楯部族；川东地区主要活动着巴人廩君部族和五溪部族，以上三部族是巴人的主要构成部分。今川南偏东，主要活动着僰人；今川南偏西，主要活动着邛人。以上主要属百濮系统。在今川北偏西一带，主要活动着氐人；在今阿坝州则主要活动着氐、羌、夷人；在今甘孜州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主要活动着僰人和羌人，他们同属西戎系统。上述两大系统中，百濮系统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西戎系民族略为先进。在百濮系中，以上三支巴人的经济生活当时皆是农牧渔猎并重，农业以旱地作业、广种薄收为主；牧业系小规模的小定居放牧，以羊马为多；渔业、狩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大于蜀人。僰人经济以农为主，兼行渔、猎、牧等。僰人以荔枝为代表园植业相当发达。僰地还酿制一种枸酱，并远销至越南。僰人还是巴蜀商人贩运奴僮的原产地，因此有“僰僮”被转运关中的记录。僰中是僰人政治、经济较发达的中心区域，在今宜宾、珙县一带。邛人是川西南地区的主体民族，故《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邛人主要是坝居、濒河居、低

谷浅山居住的民族,以稻作农业为主,长期定居,部落制度一直居统治地位,当时尚未产生明显的私有观念和等级制。在西戎系中,西部高原的夷人各部(冉駹、笮人、青衣、嘉良、徙、旄牛等),一般为定居,其经济为半农半牧。部落成员中已出现了私有观念,但贫富分化不大,等级差别不大。氐人的特征是居住地较低,以农业为主。秦汉时期,外来移民渐多,氐人逐渐从川西平原西迁至川西北地区。氐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在长期实践中,氐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水利建设体系。李冰修都江堰时,氐人巫师杨磨等曾率部协助。氐人的阴阳五行学说、天文学、针灸及草药等较发达。羌人是汉代四川西部地区的重要民族之一。与其他民族相比,羌人占据草原,以牧为主,流动性较大,在其活动区域,盛行家族奴隶制。

(七)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巨变

秦汉时期是巴蜀文化经历转折,发生巨变的时代。传统的巴蜀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在宗教、伦理、建筑、衣食住行、姓氏、文学艺术、神话传说、教育、史学等领域都较以前有了质的变化和划时代的飞跃。结果,使得巴蜀这块过去被中原视为蛮夷之地的地区,到秦汉时期则被视为先进的文化之邦。

1 习俗 这一时期在文化上的划时代转变,在考古学资料上,表现最显

著的变化是:先秦时代以容器和兵器为主的“巴蜀式”铜器上的那一整套富有地方特征的形制和符号基本消失了。如富有特征的“烟荷包式”铜钺,至秦末便基本消失;“弓形耳”长铍、短铍式铜矛、带虎纹的铜戈,至秦末大部分消失,至汉初便绝迹。战国早中期具有浓厚巴蜀地方特征的柳叶形青铜剑,自秦入主巴蜀后,形制渐变,至秦汉之际完全被中原式剑取代。在200多个巴蜀图语符号中,自战国晚期秦入巴蜀至秦亡的符号占62%,西汉初期仅存6%。这生动地反映了巴蜀土著文化逐渐被中原汉文化所取代的过程。与此同时,在墓葬形制上,秦入巴蜀后,土坑墓演变的总趋势是:长度缩短,宽度加大,长宽比例逐步缩小。独具特色的巴蜀船棺葬,在秦入巴蜀后,船棺也逐渐由独木舟形状,演变为与木槽相似。这一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原船型在巴蜀地区的推广。反映出中原文化对巴蜀丧葬习俗的演化过程。

表现在建筑、祀祭、交通、服饰上,巴蜀文化中传统的城市特征是一般设有土墙,至秦汉时期,大部分大、中城市已转为土墙。“干栏”是巴蜀文化的主要传统建筑,秦汉时期在许多地区已转变为砖瓦建筑。巴蜀传统的祭祀是野祭,至秦汉时期庙祭已占有相当地位。巴蜀传统的运载工具,陆路是马驮,水路是独木舟、竹筏,秦汉时期

马车、牛车、大木船、舫船开始普及。巴蜀土著民族的服饰,大部分地区已由原来的“左衽”、“推髻”系统转变为华夏系统。

2 道教 在这一时期文化巨变的影响下,在四川地区诞生了中国最重要的一种宗教—道教。道教是在道家思想、原始巫术和“巴蜀文化”的长期孕育下的产物。道教创始人张陵(又名张道陵),沛国丰(江苏丰县)人。汉顺帝时来到蜀中,修道于鹤鸣山(今大邑县西北),造作道书,创立宗教组织,自称“正一道”,又称“无上三天无极大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为经典,有正式的道书、教义、教仪和教规,通过教授教义、施法、教武等途径,在川西地区发展骨干。因为张陵自称“天师”,所以世人称为“天师道”;因入道的人需交米五斗,故俗称“五斗米道”。为了管理教民,张陵把弟子们按地区划分为“二十四治”,相当于24个教区。每个“治”都以一座山名为称。二十四治中,在当时蜀郡、广汉郡和犍为郡中的共有十八治,反映他传教的范围主要在川西。正一天师、祭酒实行世袭制。光和元年(178年)前后,张陵死,其子衡承其业,称“嗣师”。次年衡死,其子鲁承其业,称“系师”。张鲁后被刘焉封为督义司马,占有汉中。张鲁统治汉中的30年,后投降曹操。曹操于是封张鲁为侯,将他和大量教民一道北迁。从此,正一道北传

中原,遍及全国,影响深入后代。

3 教育与文学 两汉时期是四川地区的文化迅速发展到一个高峰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四川各族人民在文化领域上的创造和成就,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在教育方面,自文翁倡学以后,四川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官学和私学极为发达。官办的州学、郡学规模相当大,私人授徒和游学之风盛行,有的动辄授门徒上千人。到东汉时期,西蜀地区成为全国私学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教育家。如资中人杜抚,新都人杨厚、段翳,绵竹人董扶、任安,广汉人折象等,教授一方,他们的门生不少是“大儒”、名士。擅长今文经学教育是巴蜀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汉晚期以后今文经学与讖纬(宗教预言)结合起来,形成一段学术潮流,深深地影响着四川地区的政治、文化乃至民俗、传说。公孙述更是以此作为割据统治的思想武器。

在文学方面,巴蜀过去主要是土著民族的口头文学,至两汉发展为汉文化系统的文学,并主要依靠文字记录来传播。汉代的辞赋,实际上是承楚辞、先秦诗歌及巴蜀文化发展而成的。巴蜀集众家之长,在汉代产生出汉赋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代表。在西汉四个最著名的辞赋家中,有三个出于蜀中,即司马相如、王褒和扬雄。司马

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景帝时入京为郎,任武骑常侍。后弃官回成都,客游临邛,与卓王孙之女卓文君成婚。再次返京,官拜中郎将,奉命出使巴蜀。其辞赋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等,大都描写帝王苑囿之盛,宫室之美,田猎之乐,并虚构人物,相互辩论,以阐明观点,奠定了汉赋的规模,以后发展为汉赋的特征之一,即所谓“设辞托讽,恢廓声势,则赋也”。王褒,字子渊,蜀郡资中(今资阳县)人。宣帝时征入都,为谏大夫。代表作为《高簫赋》。王褒著重修辞造句。描写细微扣理,精巧如画,多骈偶语言,对魏晋文风影响极大。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成都人。成帝时自蜀游京师,以文名被召见,后任待诏、黄门侍郎。代表作为《甘泉》、《河东》、《羽猎》、《长杨》、《蜀都》等赋。形式上多模拟屈原、司马相如,对后世影响较大,他与相如被并称为“扬马”。东汉时,知名的辞赋家还有广汉的李尤,平生所著诗、赋等凡28篇,人称其有相如、扬雄之才。在散文方面,两汉四川地区也产生了许多名篇,如司马相如的《报卓文君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扬雄的《酒箴》、《州箴》、《官箴》等,皆系不朽之作。王褒的《僮约》,是我国第一篇白话文散文,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巴蜀民间流行的歌、诗、刺、谚、谥,颇具特色,适应了当时地方察举和

朝廷征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百姓的心声。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四川地区的“小学”很有成就,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汉初犍为名叫舍人的学者最先为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作注,其著作三卷,被称为《尔雅·犍为舍人注》。扬雄对小学极有造诣,经过27年的收集整理,写成《方言》一书。此书是我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一部名著,为研究古代文字、音韵、词义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4 哲学 在哲学思想方面,四川地区也产生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哲学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一是扬雄。其代表作主要有仿《易》而作的《太玄》,和仿《论语》而作的《法言》。《太玄》的主题是讲经世致用,是以积极进取的态度观察世相、分析社会;书中大量涉及自然科学知识,这种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探索,开创一代学风,后世的《论衡》、《新论》正是在此学风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法言》一书就社会政治、国家管理、道德伦理,提出自己的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是庄遵。庄遵,字君平,班固作《汉书》,避明帝刘庄讳,更庄为严,称严君平。西汉晚期隐士,以卜筮为业,常设摊于成都街市,每日看数人,得钱够自养,即闭肆下帘讲授《老子》。根据《老子》、《庄子》之旨,著《老子指归》流传于后世。读书阐发《老子》清静无为思想,提出了一整套经世

治国之道、君人南面之术，对后世道家和道教很有影响，被《华阳国志》称为“道书之宗”。

5 史学 在史学方面，巴蜀僻在西南，虽无史官，而地方史学反较其他地区发达。蜀人好治史，地方史学著述瞻富，是两汉四川文化的一大特征。举其著名者，西汉中期，有成都人张宽的《春秋章句》、司马相如的《蜀本纪》；西汉晚期，有严君平的《蜀本纪》、临邛人林闾、成都人扬雄、蜀人阳城子张皆著《蜀王本纪》，阳成子的《蜀本纪》、李尤的《蜀记》；东汉早期，有成都人的《太史公书》等，邠人何英的《汉德春秋》、蜀人郑伯邑的《蜀王本纪》，以及雒人李尤和南阳人刘珍的《东观汉记》等。上述诸书虽多不存，但可通过少数集佚本、或它书引述窥其大概。

6 艺术 在艺术方面，两汉时期巴蜀地区的艺术作品极为丰富，仅保存至今的就有数以十万件计，其艺术表现形式，主要有铜、铁、陶、漆、玉、木、石等质料的器物造型与纹饰、漆画、瓦当、画像石、画像砖、花边砖、陶俑、石俑、铜俑、木俑及模型，各种雕刻等。在各类艺术作品中，四川以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最多而著名。从思想内容看，这些画像石、画像砖的主题，不外是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忠孝；表现灵魂不死，成仙升天的境遇；以及表现祥瑞与避邪。画像石、画像砖的场面和形象，多为宣扬官吏出、前呼后

拥；反映官府的森严气派；以及反映伦理观念中的养老、义士、孝子、贞妇、烈女等说教性题材。其中还有集中表现东汉豪族大姓纵情享乐、声色犬马、穷奢极侈生活的内容，以及宗教中的西王母、凤凰、孔雀、玄武、青龙、麒麟、伏羲女娲、仙鹿、玉兔、导引升天等图案。在艺术手法上，较注重人体的完整性，各部位的比例恰当，注重人物面部表情和人物性格、精神风貌的刻画；开始应用色彩，线条普遍粗放、流畅。四川出土的汉代陶俑，有不少塑造精美，形象生动。如成都天回山出土的说唱俑，手舞足蹈，表情夸张，滑稽可笑，十分生动，堪称雕塑艺术的杰作。蜀中官吏士大夫多习绘画，在两汉时期已成一种时尚。晋人张华《博物志》卷10说：桓帝时蜀郡太守刘褒，画鸟鹊酷似；其所绘《云汉图》，人见之觉热；所绘《北风图》，人见之觉凉。由此可见其绘画水平达到了传情入神的境界。

7 科技 在科学技术方面，巴蜀的天文学和医学极为发达，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成就最大的是天文历算学家落下闳。落下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人。武帝时同县谯隆荐为待诏太史，与司马迁等人改《颛顼历》为《太初历》，具体负责“运算转历”工作，又曾参与制造浑天仪。首次采用连分数推算法，推出一年时

间为 $365 \frac{385}{1539}$ 天的近似值,较西欧早出 1600 余年,对我国天文历法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东汉著名医家涪翁,长于用针石治病,应时而效,著《针经》、《诊脉法》传于后世。广汉雒人

郭玉,诊术高明,和帝时任朝廷太医丞。和帝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命郭玉为其切脉。郭玉凭诊脉,竟能区辨出帷幕后的男女之异。见著《经方颂说》一书。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一)蜀汉的统治

刘备取代刘璋统治益州,建立蜀汉政权。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军破雒城(今广汉),合围成都,刘璋出降。刘备自领益州牧,以军师将军诸葛亮为股肱,蜀郡太守法正为谋士,录用包括刘璋部下在内的各方人才,终于在益州站住脚。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魏王曹操死,子曹丕继位。冬,曹丕篡汉称帝,国号魏,是为三国之始。次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黄武元年(222年),孙权在建业称王,改元黄武。国号吴。

蜀汉政权承袭汉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央和地方的官制。在中央置丞相,由诸葛亮担任,另设“三公”,大将军等职。在地方仍按州、郡、县三级设官置守。蜀汉的版图不大,较之鼎立的魏、吴两国,所辖面积均小。其辖境大体限于广义的“蜀”(即西蜀和汉中)或汉代的益州地区。蜀汉统有的

郡,至少有 27 个,县有 170 个。蜀汉建政之初,仅有民户 20 万,人口 90 万。

蜀汉的历史,大体可分为四段:

从刘备称帝至他死于永安宫,为创业期,时间两年。其间的大事有二:一是刘备率军东进,与孙吴大都督陆逊军相持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孙吴军在猇亭火烧蜀军连营七百里,刘备败回鱼复(今奉节)。二是刘备托孤。刘备在鱼复(改名永安)病危,召诸葛亮至。章武三年(223年),临终前把蜀国军政大权委托给诸葛亮。

诸葛亮执政的 11 年(223~234年)为早期。其间大事有三:一是东和孙吴。为了与东吴重修友好关系,诸葛亮与东吴互派使臣往来,使两国外交关系逐步正常化。建兴七年(229年)孙权步魏、蜀后尘,自称皇帝。诸葛亮又遣使前往祝贺。蜀、吴互盟誓约,互相承认,并交分天下,把曹魏辖

地分而割之,又任命一些刺史来“遥领”这些辖州。二是南抚诸夷,平定南中。刘备取蜀初期,曾向南中地区拓展,并控制了今云、贵的许多地区。刘备死后,南中诸郡大部分叛乱。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南伐,分兵三路,渡过泸水(今金沙江)进入叛乱的中心地区益州郡地,在弄栋(今云南姚安)大败叛军,生擒首领孟获,并将其释放。孟获向诸葛亮表示“南人不复反矣”。平定南中之役,巩固了蜀汉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也促进了西南民族地区的开发与交流。三是北伐中原,227年(建兴五年),诸葛亮上《出师表》于后主刘禅,从成都出发,率军到了汉中,先后五次北伐,主动进攻魏军,两次从祁山出兵,故被后世称为“六出祁山”。五次北伐,从结果看,差不多仅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但对全局关系不大。以匡复汉室为己任的诸葛亮,在蜀汉國小势弱的情況下,只有通过不断发动进攻,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并确保自己不被曹魏所侵吞,因此这一结果仍可视为战略上的持平之举。

蒋琬、费祎执政的19年(235~252年)为中期。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在第六次北伐的前线,突然病死于五丈原。诸葛亮临死前,推荐蒋琬主持蜀汉军国大事。次年(235年)春,蒋琬以大将军兼领益州刺史,使内政外交迅速稳定。蒋琬执政时,蜀国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延熙

九年(246年)冬,蒋琬去世,费祎以大将军秉政。执政时除派姜维经常以小股兵力西征西羌外,基本上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的北伐。

中期以后至蜀汉灭亡为晚期(253~263年)。费祎死后,姜维执政。在这期间,姜维曾五次西出凉州,兴兵西征,前后攻魏不下20次,均以失败而归。在蜀汉灭亡前五年,朝政被宦官黄皓把持。炎兴元年(263年),魏军五路伐蜀。姜维上表后主请求遣将防守,黄皓信巫鬼,要后主不予理会。待到魏将邓艾从阴平出奇兵,直趋江油时,后主才仓皇命诸葛瞻率军抵御。但为时已晚,蜀军从绵竹大败而归。十一月,后主刘禅接受谯周建议,遣使向邓艾投降。蜀汉至此灭亡。刘禅投降时,献户28万,男女口94万,带甲将士102000人,吏4万人,米40余万斛。

刘氏得蜀共50年(214~263年),正式称帝43年。

蜀汉政权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维持着四川地区的相对的统一和安定,因而其经济文化仍有一定的发展。当然,已远远赶不上汉朝的发展规模和水平。

诸葛亮治理益州期间,重视内部的经济建设。注意“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他充分利用都江堰水利设施,灌溉川西平原。为此,专门设置堰官,精心管理,并调发1200人驻在堰区,负

责保护、维修工程,使成都平原的农村“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在北伐过程中,他又开发汉中,作为前哨的粮食基地。故晋人袁准评价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廩实,器械利,蓄积饶。”

蜀汉时期四川盐、铁、锦等手工业生产也有相当发展,其中尤以蜀锦更为发达。诸葛亮在颁布的款令中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汉赏赐将军多用锦,动辄千匹,调拨军资也多用锦,动辄数十万匹。左思《蜀都赋》说,成都“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织房之多,产量之富,质量之美,可以想见。蜀汉灭亡时,府库中仍有“锦、绮、綵绢各二十万匹”,足见其蜀锦之盛。随着对南中的开发,蜀汉政府还把织锦技术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相传诸葛亮曾派人教贵州苗民、侗族织锦,故后世苗民称自己的织锦为“武侯锦”,而侗族则称之为“诸葛锦。”

蜀汉时期的商业购销,自成体系。故庞统认为当时巴蜀“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左思《蜀都赋》描写当时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当时成都商业的繁盛,已超过魏都、吴

都。蜀汉时期的外贸交易较为发达。供向外交换的,主要是官府组织作坊大量生产的漆器、蜀锦等商品,以及从民间大量收购的一些奢侈品。蜀汉与周边民族地区的贸易中,曾大量从南中输入耕牛、战马、金银、犀革等产品。蜀商还通过永昌等地与东南亚、南亚诸国进行贸易,其中,蜀丝、锦等产品大量流入大秦,大秦的琥珀、珊瑚等又大量流入西蜀。

(二)西晋的统治

魏灭蜀的第三年(265年),魏相国、晋王司马炎篡魏自立,建立晋朝,仍建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存在的时间不长,至316年为在北方建立的“十六国”之一的汉所灭。

西晋时期,发生在四川地区的大事有:

1 安抚益州 西晋在四川的统治,从郡县设置上,基本沿袭蜀汉,变动不大。为了稳定四川局势,西晋将蜀汉的官僚、豪族等,主要是随刘备入蜀的荆州地主集团,共3万家,内迁至河东(今山西境内),以便控制。同时,还在政治上、经济上优待蜀中豪族大姓,引拔部分代表入朝作官。

2 灭亡东吴 西晋建立十多年,南方的吴国仍然存在。而要灭亡东吴,必须突破长江防线,必须建立一支强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太平御览》引《诸葛亮集》

《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

大的水军。这一任务落在益州刺史王潜身上。公元277年,王潜奉诏在益州造船,准备伐吴。279年,王潜从成都出发,帅水陆大军七万人为主力,顺江东下。其余各路伐吴大军也乘势并进。280年,王潜率水军戎卒八万,方舟百里,进入吴都建业,吴主孙皓投降。至此,从东汉董卓之乱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延续了90年之久,又重归统一。在西晋王朝完成全国统一的事业中,四川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基地作用。

3 成汉政权的兴亡 西晋统一全国不久,朝廷与藩王之间矛盾尖锐,爆发“八王之乱”,致使广大人民流离失所。296年,秦、雍二州的氐羌起兵反晋。在略阳、天水等六郡人民数万家入蜀就食,分散在广汉、蜀、犍为三郡。来自略阳郡的李特一家,原系四川宕渠(今达县地区)的賸人,成为首领,掌握流民武装。益州刺史赵廞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流民的反抗。301年,李特集合流民起义,进攻成都。新任益州刺史罗尚领兵万人至成都,开始遣返入蜀流民,准备以武力解决。李特自称镇北大将军,在人民支持下,打败晋朝军队,占领川西、川东、川北很多地方。303年,李特自称益州牧,建元建初。不久,李特战死,李特子李雄继领

兵攻下成都。次年,称成都王,改元建兴。306年,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杂采汉、晋职官,立为百官制度。

大成政权初期,只能控制三蜀、梓潼、巴西数郡。随后,李雄不断对周围用兵,使成汉疆域日益扩大。李雄在位31年(304~334年),为政宽和,注意休养生息,社会较为安定,“年谷丰登”,经济有所发展,百姓富实,“间门不闭,路不拾遗”,西蜀地区出现当时北方和南方所没有过的太平局面。

李雄死后,子、侄争夺帝位,不惜兵戎相见。338年,其从弟李寿夺取政权,改国号为汉。李寿“广修宫室”,“务于奢侈”,弄得百姓怨声载道。李寿死,李势继位,成汉围势更加微弱。347年,为东晋所灭。成汉政权自李特301年起兵反晋,至347年,前后共存在了47年。

4 僚人入蜀 僚人原居住在牂牁地区,即今贵州东部。西晋末年,南中大姓、晋王朝、大成政权,为了争夺包括牂牁在内的南中地区,相互混战。338年,李寿继位,改大成为汉。在李寿的招引下,居住在牂牁的僚人大规模向北迁徙,进入四川盆地。“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李寿引僚入蜀,目的是充实户

《华阳国志》卷9《李特雄期寿势志》。

《晋书》卷121《载记第21、李雄、李班、李期、李寿、李势》。

《蜀鉴》卷4引李膺《益州记》。

口。李寿死后,李势即位,中外离心,因而失去对僚人的控制。“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国,为益州大患。”成汉灭国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僚人大举迁蜀,是这一时期西南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是在战乱争夺和充实蜀地户口的特定条件下发生的,使当时巴蜀经济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而其结果则是僚人与汉族关系日益密切,导致最终与汉族相融合。

(三)东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的变乱

公元316年西晋为汉灭亡后,318年晋宗室司马睿在江南称帝,建都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347年,东晋灭亡成汉,四川地区重新归入东晋版图。自347年至581年隋朝建立,这230多年间,四川地区先后为东晋、前秦、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西魏、北周等政权所统治。在这期间,政权频繁更替,各政权统治四川的时间长短不一,其中:

东晋从收复四川至东晋灭亡共74年(347~420年),实际统治四川53年。苻坚的前秦政权占有四川地区13年(373~385年)。四川在南北朝时期,归于刘裕的南宋统治59年(420~479年),萧道成的南齐统治24年(479~502年),萧衍的梁朝统治52年

(502~553年)。至553年,四川地区转入北朝西魏的版图。至557年,西魏为北周所代替。此后24年,四川地区属于北周疆土,至581年始为隋朝所统一。

在这政权更替频繁的230多年间,四川地区曾多次发生大规模的变乱,重大事件有:

1 东晋谯纵之乱 谯纵,东晋巴西南充(今南部县)人,任安西将军府参军。405年,益州刺史毛璩听说叛党桓振攻占江陵,即命其弟毛谨及谯纵率军东下,准备讨伐桓振。蜀人不愿远征,共逼谯纵为主。谯纵遂从五城水口(今三台)回军,攻杀毛谨于涪(今绵阳市),自立为梁、秦二州刺史。随即引兵入成都,杀毛璩,自称成都王,向后秦称臣,被封为蜀王。413年,东晋派朱石龄为元帅统军灭之,谯纵败死。谯纵据蜀8年,事迹不详。

2 刘宋赵广之乱 赵广,五城(今中江)人。432年,与帛氏奴以司马飞龙名义,号召蜀人反抗益州刺史刘道济。拥众至十万,攻围成都不下。由于不见司马飞龙,蜀人颇有散去之意。赵广遂推阳泉山(今绵竹、德阳县境)道人程道养为蜀王,继续进逼成都。刘道济病死后,宋将裴方明乘机出城偷袭,赵广军大败,退保广汉。不久,刘宋陆续派兵前来镇压。437年,程道

养被官军杀害,赵广亦被押送建康处死。

3 南齐刘季连之乱 刘季连,公元497年被南齐明帝任命为益州刺史。次年,齐明帝死,朝廷发生反乱,中外戒严,刘季连以右将军发兵征讨,其间发生蜀人多起反叛事件。502年,萧衍篡齐,改国号为梁,遣使入蜀。取代刘季连的新任益州刺史邓元起,与刘季连有隙,刘季连遂聚兵反叛。邓元起在蜀人的支持下,攻围成都。503年梁武帝遣赵景悦入蜀,宣诏许刘季连投降。刘季连被押送至建康,废为庶人,505年被蜀人蔺道恭杀于建阳门。

4 北周王谦之乱 公元557年,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为天王,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580年,外戚杨坚入主朝政,为控制地方军政大权,以梁睿为益州总管,前往成都,取代王谦。由此导致部分地方军政长官反叛。益州总管王谦也以匡复为辞,起兵巴蜀,拒不受代。于是,关东、巴蜀、淮南三个地区,相继反叛。杨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在集中力量对付关东时,派梁睿据守汉中,挫败王谦北进的企图。接着,由梁睿率主力出击,大败王谦军,直逼成都。守将见大势已去,举城投降,王谦落荒而逃,行至新都,被擒,斩之,其乱告平。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的文化

这一时期,伴随着政权的更替,战争和动乱的破坏,人口的锐减,经济的衰落,四川地区文化的发展状况,总的说来不及两汉时期的水平。值得称述的是史学、宗教及宗教艺术:

1 史学 四川地区的史学,在汉晋间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在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在这些历史学家中,成就较大的是谯周、陈寿、常璩。

谯周(201~270年),字允南,巴西郡西充国县(今阆中西)人,蜀汉时曾任益州典学从事、太子家令、中散大夫、光禄大夫等职。入晋,官至散骑常侍。娴习典礼,谙熟经史,博闻多见,在经学、史学、天文学方面均有贡献。先后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著作,其中《后汉书》是较全面记述东汉历史、典章的一部大型史书,为晋人司马彪撰《续汉书》提供了借鉴。《古史考》系我国第一部考据性史学著作,对后世影响较大,唐宋时期与《史记》并行,在宋元之际散失。在地方史方面,谯周有《蜀本纪》、《巴蜀异物志》、《益州志》、《三巴记》,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西南地区的历史传说、风土人情、区划物产等,是研究西南地方史的重要著作。

陈寿(233~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南充)人。少时受学于同郡谯周,治《尚书》及《春秋》三传,钻研《史记》、《汉书》。蜀汉时累官至黄门侍郎,入晋后除佐著作郎,后授治书侍

御史。陈寿在蜀汉灭亡时即注意蜀事，西晋灭吴后，开始整理三国史事，撰成魏、吴、蜀三书，共65篇，合称《三国志》。本书取裁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朴。又以曹魏为正统，把三国史实“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在纪传体断代史中创一格，对后世修史体例颇有影响。除《三国志》外，陈寿还撰有《古国志》50篇，《益部耆旧传》10篇，二书皆已亡佚。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县（今崇庆）人，生卒年代不详。成汉李势时，任散骑常侍，掌著作，撰有《汉之书》10卷，记叙成汉历史，其书入晋秘阁后改称《蜀李书》。东晋灭成汉后，常璩又写成《华阳国志》这部名著。全书共12卷，记述从先秦至晋永和三年上千年间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开创了一种编纂地方史的新体例，成为宋代以后方志的先河。其中第5至9卷，分别记载了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在四川割据的政权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书中关于古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地理、民族、人物方面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在晋代，除陈寿和常璩外，还有广汉郫人王崇，著《蜀书》以叙蜀汉之事；蜀郡江原人常宽，著《蜀后志》及

《后贤志》，又续陈寿《益部耆旧传》作《梁益篇》；巴西人黄容著《梁州巴纪》；蜀郡杜龚著《蜀后志》叙及赵廞、李特之乱。

在南北朝时期，梁朝李膺字公胤，梓潼郡涪县（今绵阳）人，著《益州记》3卷，主要记叙益州地区的地理、掌故，资料丰富，是四川古代一部重要的地方志。隋唐时期，其书犹存，乐史《太平寰宇记》多引其内容，宋以后亡佚。

2 宗教 发祥于东汉的四川早期道教，在这一时期的蜀中仍有广泛的影响。值得提及的是，两晋之际，涪陵人范长生在蜀中传播道教。

范长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字元，涪陵丹兴人。蜀汉时迁蜀郡，入青城山，岩居穴处，求道养志，为道教领袖，“民奉之如神”。公元304年，李雄自称成都王，迎范长生至成都，拜为丞相，尊为国师。著有《周易注》10卷、《老子注》2卷，均已失传。由于李氏家族的尊崇，成汉时期，道教在四川地区有很大的发展。

佛教自汉代传入四川后影响甚微，自晋以后，由于一些高僧相继入蜀弘扬佛法，使得佛教在四川地区日渐兴盛。在东晋时，高僧道安曾分遣弟子多批，溯江而上，入蜀弘扬佛法。梁武帝时，建康僧人慧昭入蜀，止于成都龙渊寺，讲论开导如川流。西魏平蜀

《隋书》卷33《经籍志》。

《太平御览》卷123引《十六国春秋·蜀录》。

后,由北方入蜀的僧人逐渐增多。两晋南北朝时期,从天竺求法归来的智猛,由凉州入蜀。其后,又有敦煌僧人道法至成都。在外来僧人的传布下,佛教在四川影响日渐扩大。自晋以来,已有四川人出家为僧,其中还出了一些高僧。著名的如梓潼涪人释植相、宝汉人释宝象等。释宝象24岁出家为僧,善讲经,为《大集经》、《涅槃经》、《法华经》作疏,省繁易简,学者便之。

3 宗教艺术 随着佛教的传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的佛教造像逐渐兴盛起来。在各地的佛教造像中,以成都万佛寺出土的石像最为典型。万佛寺位于今成都市西门外万佛桥附近,是萧梁时著名的寺院,名为安蒲

寺。寺院造像,大多为单个圆雕。该寺从清光绪出土了一批南朝佛像石刻,以刘宋文帝元嘉二年(425年)的《西方净土变》为最早。其造像的组合内容、装饰技术和艺术风格略与长江下游的南京栖霞寺造像相同。另外,在广元千佛岩发现的北魏“释迦文佛”,为圆雕,高1.5米,砂岩石质,头饰馒头肉髻,内穿交领襦,外套对襟袈裟,手呈说法式。这尊造像,与云岗、龙门和敦煌莫高窟等地同期造像基本相同。

除了佛教造像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道教造像。其中,以成都龙泉驿区山泉乡大佛岩的《北周文王造像碑》最为重要。此碑的一个特点是佛道二教所尊神像并列一起。

四、隋唐时期

(一)隋王朝在四川的统治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益州又归入隋朝的版图。隋朝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确立起以州统县地方行政体制,改变了东晋以来四川地区滥设州一级行政建置的局面。

隋朝统治中国时间短促,发生在四川地区的大事有二:

一是杨素自永安攻陈。公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后,积极准备对南方

的陈朝发动进攻。杨坚特派亲信大臣杨素为信州总管,驻节永安(今四川奉节),监造各型战船。588年,晋王杨广统率50万隋军,分五路临江向陈朝发起总攻。隋朝利用益州的人力物力,建立起强大的水师。杨素以行军元帅率舟师出三峡,击败陈军在江峡一带的阻拦,使长江中游的陈军闻风请降。杨素乘势顺流而下,进至汉口,与自襄阳出兵的隋军会师,两湖遂平。

589年,隋军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南朝最后一个政权—陈朝。至此,历时20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全国又归统一。

二是杨秀镇蜀。王谦之乱平定后,梁睿继任益州总管。梁睿原本北周重臣,并非杨坚心腹。在平定王谦之乱的过程中,杨坚以“巴蜀阻险,从好为乱”为理由,下令毁剑阁道,另开平路,以便控制巴蜀而去其险。王谦之乱平定之后,杨坚担心梁睿在四川声望日增,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先在利州、潼州、汶州、信州等地设置总管府,以掣其肘。继于581年将其调离益州,征还京师,另派亲信取代。杨坚采纳曾经来巴蜀了解情况的重臣于宣敏的建议,认为要防止四川地区发生变乱,应当树建藩屏,封植子孙。于是杨坚便封第四子杨秀为益州刺史、总管,后又改封蜀王,掌管西南二十四州诸军事。

蜀王杨秀前后镇蜀20余年,在其前期,在杨坚派遣的长史元岩的辅佐约束下,行事谨慎,不负朝廷重托。593年,元岩死后,继任僚佐皆不称职,致使杨秀胡作非为,肆无忌惮。他“竟行其志,渐至非法”,甚至“凡所被服,拟于天子”。为了防止他谋反,杨坚逐渐削弱其兵权,使之仅成为名

义上的总管,而实权则由朝廷控制,不让其染指。公元600年,太子杨勇被废,晋王杨广被立为太子。杨秀颇表不平。杨广于是“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杨秀因此获罪。602年,杨坚征杨秀还京师,朝廷恐其生变,以独孤楷为益州刺史,赶赴成都,勒兵为备。杨秀行至离益州40余里的兴乐,将反袭独孤楷,发现楷“不可犯”,遂中止谋反。这样,四川地区的一场动乱,无形中消失。杨秀返回京师后,被废为庶人。因清查杨秀的同党,四川多数州县的长官均遭清洗。杨广继位后,废诸州总管,地方军权统归中央。因此,在杨广统治时期,四川各地的郡县长官,位卑权小,不掌兵权,难以有所作为。以至在隋末的大变乱中,四川地区是全国最安定的地方。

(二)唐王朝在四川的统治

1 巴蜀归唐 公元604年,隋文帝杨坚,为太子广所害。杨广继位,史称炀帝。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和荒淫生活,很快激起全国性农民起义的爆发,地主武装也乘势起而割据。

在隋末的战乱中,四川地区的郡县长官保境自守,坐观政局的变化。617年,自太原起兵的李渊,攻占长安,随即派詹俊、李仲衰前往四川进行招抚,同时又任命李孝恭为山南招慰大使,进兵巴蜀。四川各地的郡县长

《隋书》卷1《高祖纪》。

《隋书》卷62《王韶等传》。

官和豪族、酋帅,纷纷遣子弟前往长安,表示归顺。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巴蜀地区就此纳入唐王朝的版图。

唐朝在加强对巴蜀控制的同时,利用巴蜀地区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支持其统一全国的斗争。具体表现在:

一是接济粮食。由于李渊立足的关中地区在隋末战乱中遭到极大的破坏,所以李渊即位后,随即遣送关中饥民前往蜀汉就食,以便度过饥荒。619年,太府少卿李袭誉又奉命从四川运米到长安,以充实京师。

二是助灭后梁。在隋末地主武装割据时,有萧梁子孙萧铣在巴陵校尉董景珍等的拥立下,据巴陵称帝(后都江陵)。史称后梁。后梁据有两湖、岭南,西至三峡,南迄交趾,北距汉水,割据荆湖之地,实为唐朝的心腹大患。621年,李渊以李孝恭为荆湖行军总管,李靖为行军长史,统十二总管,率巴蜀士兵,自夔州顺流东下,连克荆门、宜都二镇,直捣江陵,萧铣投降。荆湘、岭南相继平定。

2 前期政治 从唐朝建立(公元618年)至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5年)为唐代前期。唐代前期四川政治经历了由武将专制到官僚政治的转变。唐朝建立之初,由于国内战争尚在进行,高祖李渊为控制巴蜀,借助巴蜀人力、

物力征服对手,故重用武将,置益州总管府,对四川实行军事管制。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继立为唐太宗。由于此时国内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对四川已无继续实行军事管制的必要。唐太宗相继撤销了设在嘉陵江以东的都督府,仅保留嘉陵江以西的剑南道。剑南道虽然仍置大都督府,但都督一直由亲王遥领,改将军政大权归由都督府长史执掌。从首任长史高士廉(吏部尚书)开始,其后的继任者均由文官担任,不再起用武将。担任剑南道都督府长史的文官,或为六部尚书,或为宗室贵戚,或由州刺史中遴选。

唐代文官政治是建立在高度集权的基础之上的官僚统治。在太宗时期朝政尚属清明阶段,中央朝廷还能对地方州县官员进行管理约束,但自高宗、武周时期开始,随着朝廷的滥用权力,政权机构的逐渐衰变,地方州县官员变得愈来愈贪残妄为,于是,腐败便成为四川地区的一种普遍现象。如姚璩任长史时(697年)“蜀中官吏多贪暴”。姚璩虽严加惩罚,然而受到惩罚的,多半是低级官吏,惩罚手段则是滥施暴力,受害者多为无辜之人,对于真正残害百姓的官吏,姚璩束手无策。所以,陈子昂在698年的《上蜀川安危事》中说:“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

亡者,实缘官吏贪暴”。官僚政治严重败坏的结果,致使武周时期四川成为全国人口脱籍逃亡最严重的地方,社会动荡,各种矛盾十分尖锐。712年,睿宗李旦传位于太子李隆基,这就是著名的唐玄宗。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对于前代弊政大加厘革。针对四川吏治败坏的实际情况,玄宗多以重臣入蜀主事。继任长史如陆象先、苏頲,为政清廉,以身作则,非常注意减轻人民负担。玄宗还采取措施,严惩酷吏,同时选拔政绩突出的都督、刺史担任京官。由于国家政权加强了总体上的控制,苛扰之风渐革,四川吏治又一度变得清明起来。

3 中期政治 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至874年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为唐代中期。唐代中期四川地区的重大政治事件有:

(1)“玄宗幸蜀”。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756年),安禄山的军队直逼长安。宰相杨国忠兼领剑南节度使,首倡幸蜀之策,为玄宗接受,于六月十二日凌晨,仓惶出逃。十三日,从驾军士在马嵬驿发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杨贵妃自缢身亡。太子李亨乘乱逃到灵武,自立为帝,是为肃宗。玄宗被奉为太上皇,几经周折,于七月抵达成都,史称“玄宗幸蜀”。随同玄宗到达成都的扈从官

吏军士,共计1300人,另有宫女24人。玄宗入蜀避难,直至757年冬才返回长安。

(2)蜀军兵变。在玄宗入蜀避难期间,当时驻扎在成都的四川军人,由于深受玄宗天宝年间对南诏作战之害,时又目睹中央政权的动摇,于是发动兵变,试图夺取政权。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初,剑南兵贾秀率五千士兵发动兵变,很快被镇压下去。同年夏,蜀兵在郭千仞等人的率领下,再次发动兵变,玄宗登玄英楼招谕,不从,后即被讨平之。

(3)四川地方官的不断叛乱。由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控制地方权力大为削弱,一些在四川掌管兵马大权的地方官,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断利用这一形势兴兵作乱,甚至相互攻杀,使四川地区从此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段子璋叛乱。上元二年(761年),东川节度副使兼梓州刺史段子璋,乘安史之乱尚未平息之机,进行叛乱,攻陷遂州,占领绵州,东川节度使李奂出奔成都。段子璋自称梁王。剑南节度使崔光远率四川牙将花惊平定了这次叛乱。但在平叛中,西川军队大肆剽劫,乱杀数千人。

徐知道叛乱。唐宝元年(762年),剑南西川兵马使综知道,在剑南

西川节度使严武调离成都后,不奉朝命,发动叛乱,自称成都尹、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严武旋复任剑南节度使,试图入蜀。徐知道派兵扼守剑阁,阻止严武入蜀,造成蜀中数月,道路不通。后被新任剑南节度使高适所击溃。

崔旰袭杀郭英乂。765年,剑南节度使严武卒,郭英乂在其弟都知兵马使郭英乂等人的支持下,代为节度使。严武心腹西山部知兵马使崔旰不服,率兵偷袭成都,攻杀郭英乂。郭英乂死后,四川诸将起兵讨伐崔旰,互相攻杀,战乱不断扩大。

杨子琳奔袭成都。公元766年,崔旰大败东川节度使张献诚及诸将,迎宰相、西川节度使杜鸿渐至成都。代宗不仅不追究崔旰之罪,反而任其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赐名崔宁。767年,以崔宁为西川节度使。泸州刺史杨子琳利用崔宁入朝的机会,率精骑数千,袭取成都。崔宁弟崔宽节度留后屡战不胜。崔宁之妾任氏,出家财十万,招募勇士攻城,杨子琳弃城而逃。指挥收复成都的任氏,就是著名的浣花夫人。杨子琳顺江东下,后又被任命为峡州刺史。

张朮袭取成都。783年,北方藩镇相继叛乱,朱泚谮称秦帝。蜀中诸将利用这一形势,又发动了驱逐西川

节度使张延赏的叛乱。同年十一月,剑南西山兵马使张朮率部袭取成都,张延赏逃至汉州,遣鹿头关戍将,乘张朮置酒酣歌,无所防备之机,奔袭成都,斩杀张朮及其同党,才使叛乱未能进一步扩大。

刘辟之乱。刘辟,字太初。德宗贞元年间进士,西川节度使韦皋辟为从事,累迁至御史中丞、度支副使。805年,韦皋在成都暴卒,刘辟自立为西川节度留后,并要求朝廷任命他为节度使。806年,宪宗刚刚即位,只好答应他的要求。但刘辟并不以此为满足,进而要求兼顾剑南三川,并派兵攻占梓州,活捉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是,宪宗决定以武力解决,派高崇文率兵进讨,连占告捷,直下成都。刘辟兵败,西走吐蕃,被擒于羊灌田,槛送京师伏法。西川告平。

(4)任用文臣节度三川。自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仅剑南西川处于军人控制之下,山南西道和剑南东川,基本上也是由将帅出任节度使。刘辟之乱平定后,宪宗注重以文臣治理三川,改由宰相武元衡出任西川节度使,自武元衡之后,直至僖宗即位,西川节度使基本上由重臣、亲贵担任;“非上将贤相、殊勋重德”不有担任三川节度使。而当时的宰相也主要从三川节度使和淮南节度使中遴选,所以时人称

西川是“宰相回翔之地”。从而扭转了军人专权的局面。所以自宪宗以后,四川政局又恢复了相对的稳定。

(5)德宗再度幸蜀。公元784年。德宗为了躲避北方藩镇朱泚和李怀安的叛乱,从奉天(今陕西乾县)逃至山西道首府梁州(今陕西汉中),史称“德宗幸蜀汉”。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财富,支持李晟收复长安,返回京师。

4 后期政治 从公元874年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至907年唐灭亡,为唐代后期。唐代后期在四川地区的重大政治事件有:

(1)“僖宗幸蜀”。874年,山东爆发王仙芝、黄巢起义。880年,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潼关,兵锋直指长安,宦官田令孜阴为幸蜀之计。僖宗通过击毬赌三川,从四个大臣中遴选三川节度使,并于该年冬仓惶出逃,第二年(881年)初抵达成都,史称“僖宗幸蜀”。至885年初,僖宗始从成都返回长安。

(2)阡能起义。阡能是邛州安仁县(今大邑县安仁镇)的土豪,担任邛州乐官。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因公事违期,“亡命为盗”,横行于邛、雅三州之间。在阡能起义的影响下,四川各地土豪纷纷拥兵自保,一时间“巴蜀多故,土豪崛起”。罗浑擎、罗夫

子、句胡僧、韩求等人,先后率部投附阡能。同年夏,阡能在乾溪大败唐军,进入蜀州境内。同年冬,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改派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率兵攻打阡能。高仁厚采取诱降的办法,仅用六天就完全瓦解了阡能的部队。韩求、罗夫子自杀,阡能、罗浑擎、句胡僧被俘,押至成都被处死。至此,历时9个月的阡能起义最后失败了。

(3)韩秀升之乱。在阡能起义迅速发展的时候,涪州刺史韩秀升乘机反叛,截断长江航线,南攻黔州(今彭水县)。883年,溯长江而上,进攻渝州,被土豪韦君靖击退。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改派高仁厚领兵讨伐。高仁厚大败韩秀升,兼以招降。其部下执韩秀升降,韩秀升被押至成都处死。

(4)王建据蜀。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少无赖,横行乡里,人称“贼王八”。后弃“贼”从军,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累获迁升。884年,王建率部投奔流亡成都的僖宗,被田令孜收为义子,擢为卫将军,属随驾五部之一。次年,随僖宗返至长安,未几,田令孜失势,王建出为利州刺史。当时,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盘据巴蜀多年,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正企图阻止入川赴任的东川节度使顾彦

《资治通鉴》卷237。

通过击毬的方式,决定三川节度使的人选。

《北梦琐言》卷4。

朗,王建利用这一形势,于887年乘兵出师攻占阆州,“以观天下之变”。888年,僖宗死,昭宗即位。王建利用朝廷与藩镇的矛盾,上表朝廷,请讨陈敬瑄。昭宗以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以兵守成都,拒不受代。韦昭度奉命统兵10万讨伐陈敬瑄,王建充行营诸军都指挥使,屡战屡胜,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陈敬瑄死守成都,三年不克。891年,朝廷以“馈运不继”,决定罢兵。王建上表朝廷,以软硬兼施手段,逼走讨伐西川的韦昭度,取而代之。接着,他亲率大军,昼夜围攻成都,陈敬瑄不能支持,终于在当年8月开城投降。王建入据成都,自称西川留后,继续扩展势力。10月,朝廷正式任命王建为西川节度使,先后吞并东川和山南地盘。901年,唐朝封王建为西平王,903年改封为蜀王。907年,“朱全忠篡唐”,在中原建立梁朝,史称后梁。9月,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

(三)隋唐时期四川经济的繁荣

隋唐时期,四川地区在较长时期处于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下,没有遭受大规模的战争的破坏,使魏晋南北朝以来一度衰落的四川经济又迅速地走上了繁荣的趋势。这集中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和人口增长的

各个方面。

1 农业 隋唐时期四川农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水利灌溉事业上,入唐以后,成都平原及其毗邻的岷江、涪江冲积平原,先后兴建了多项水利工程,形成了自秦汉之后又一个大规模发展水利事业的高潮。自唐太宗至僖宗,历任地方官注重水利建设,在扩建都江堰传统水利工程的同时,努力在成都平原周围地区兴建水利工程,从而扩大了灌溉面积。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水稻育秧移栽法和水旱轮作制在唐代逐渐得到普及。随着复种面积的扩大和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成都平原的粮食产量迅速增加,从而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粮食产区。陈子昂说这里“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故每当关中发生饥馑时,不仅要从成都平原调运大批粮食进行接济,而且外地的“衣冠士庶”;“皆求于蜀人”。此外,剑南、陇右驻军的粮饷,也主要依靠成都平原供给。与成都平原相毗邻的丘陵、山区,则在多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上显示了优势。早在隋代以前四川就有人工种植的茶树,中唐以后,茶叶生产更加发达。据陆羽《茶经》记载,在全国31个产茶区中,四川有彭、绵、眉、邛、雅、泸、蜀、汉八州,约占全国产区的四分之一。蜀茶不仅产量多,而且质量非常好,其中

《陈子昂集》卷9《谏讨雅州生羌书》。

杜甫《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全唐文》卷359。

尤以雅州的蒙山茶 品第为全国第一，是有名的贡茶。药材生产在唐代已成为山区和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四川成为全国药材的盛产之地，许多重要的药材作为上缴中央朝廷的贡品。桑、麻种植最为广泛，几乎遍及各个州县，蜀麻的质量冠于全国。柑桔、甘蔗等经济作物遍及低山和丘陵地区，前代著名的巴蜀荔枝，入唐以后，沿长江河谷地带发展，扩大到了戎、泸、渝、涪、万、忠等州。

2 人口 隋唐时期，四川农业的发展，还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较之于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四川人口开始呈增长的趋势。隋代四川人口开始增长，据炀帝大业五年（609年）的统计，四川地区23郡，共有492781户，比蜀汉灭亡时的28万户净增76%。岷蜀诸郡有260184户，比较《宋书·州郡志》所载益州53141户已超出3.8倍。至唐代四川户口继续增长，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四川有69.4万户，至盛唐时的天宝年间，已增至117万户。其中剑南道已有851707户，比隋代又增长了2.37倍以上。从太宗至玄宗的103年（639~742年）间，四川净增47.6万户，增长69%。表明这一时期四川人口的继续增长，总户数已经接近东汉四川历史上的最高水平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1175457户。

3 手工业 四川的手工业生产，在这一时期也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其中某些行业还达到了新的水平。在纺织业方面，成都平原的纺织业生产在隋代已经恢复，并能与北方媲美。到了唐代继续发展，素称发达的西蜀丝织业，以成都为中心，蜀州、绵州等州为主要产地。中唐以前，西蜀官营机织业十分兴盛，仅益州每年贡纳的春綵即多达十余万匹，织造的式样，以“陵阳公样”（即陵阳公奚师纶在成都创制的花样）为主。安史之乱后四川纺织业全面发展，各种高级丝织品的需求量急剧增加，除官府管辖的“织锦户”外，出现了大批以织作为生的独立手工业者，机织技术不断改进，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生产效率高的花楼机逐步取代多踪多蹊机，织物的组织结构日趋复杂，花样翻新，在玄宗以后，又出现了各种“新样锦”。当时西川所创造的各种“异色绫锦”，不仅在四川地区逐渐普及，同时还传到了江淮一带。成都作为西蜀丝织业中心，“凤杼成功”，普遍受到赞誉。卢求在《成都记序》中盛赞益州的“罗锦之丽”和“伎巧百工之富”。此外，四川的布匹生产和麻织业也同样有较大发展。制盐业的发展远远超过汉代，盐井分布的地区比较广泛，数目和产量都不断增加。据《新唐书》卷54《食货志》记载，唐后

期四川共有盐井 639 口。在这些盐井中,以陵井和富义井的产量最多。如武周时期,陵井日产盐 1820 斤,富义井月产 3660 石,由此可见当时盐业繁荣的情况。四川的造纸业在隋唐时期非常兴盛。用楮皮制成的广都纸,亦名小灰纸,在隋开始生产,用途广而价格低。唐代益州生产的黄、白麻纸,光滑细密,经久耐用,被朝廷定为官方用纸。宫廷太府每月需用蜀郡麻纸 5000 番,供所属集贤院抄写御本。在四川加工的各种纸中,以成都的笺纸最为著名。其中,以唐宪宗时寓居成都的女诗人薛涛创制的新样小笺,十分雅致,深受文人喜爱。唐代四川雕版印刷业相当繁荣。中唐以后,由于北方战乱迭起,四川相对安定,于是大批文人相继入蜀避乱,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四川文化的发展,书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多种雕版印刷的书籍大量出现。到唐末,成都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印刷中心,书铺刻印的书籍较多,有名的如西川过家、樊家、龙池卞家,其中卞家印的《增胜佛母陀罗尼经咒》,篇幅较大,是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西川雕印的书籍,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还流传到了日本,影响甚大。制糖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唐代,成都、梓州和遂州已经

掌握了甘蔗熬糖的技术。代宗大历年间,制造糖霜的技术传入遂州,促进了遂州制糖业的发展。随着这一技术的推广,使四川成为中国最早制造蔗糖的产地之一。此外,这一时期四川的酿酒、制茶、制瓷、造船、冶铁等手工业行业部门上,也有较大的发展。

4 商贸 隋唐的统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使得四川的商业再度繁荣起来。入唐以后,全国各地的商人,远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北、西南等地来到四川经商,时称之为“估客”。蜀商则入于长安;“行及太原,北上五台”,东至江陵,达于扬州,南下云南,西入吐蕃,活跃于全国各地。这些往来于四川的行商,经营范围相当广泛。从四川输出的大宗商品,主要有麻、茶、布、锦、药材,输入的物资则以食盐、香、药、珍玩为主。蜀锦是四川著名的外销产品,不仅行销国内,还流传到国外,日本至今还收藏有唐代蜀锦的实物。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四川各地市场的兴旺。成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都会,在隋代,成都已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入唐后,成都商业的繁荣超过前代,一直是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中唐以后,成都又与扬州并列为全国最繁华的两大商业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所谓“扬州

李蒲《通泉县灵鹫佛寺记》,《全唐文》卷 818。
《隋书》卷 29《地理志》。

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卢求《成都记序》更称:“以扬为首,益声势也”;“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之多,伎巧百工之富,扬不足以侔其半”。据《新唐书卷42·地理志》载,天宝年间成都府有160950户,928199口,估计市区约有10万户。为适应城市人口的增长和防御南诏的需要,僖宗时西川节度使高骈,在隋代展筑成都城垣的基础上,扩筑罗城。使城垣周长扩至25里,从工程规模形制、完备程度均超过前代,从而奠定了唐以后历代成都城墙建设的基础。成都市场繁荣,城内除有东、南、西、北四处经常性市场外,还有各种定期举行的集市,其中以蚕市、药市、七宝市最为著名,后来还出现夜市。梓州是这一时期发展最为迅速的商业城市。自唐肃宗以后,梓州(今三台)成为剑南东川的政治中心和最大的消费城市,是井盐和铜的集散中心,后期又形成全国性的药材交易市场。夔州自晋以来一直是川东地区的军事重镇,在唐代城市商业发展,盛产井盐,造船业发达,是四川与荆吴地区的物资集散地。位居川中盆地交通枢纽的阆州,有“牛马桑蚕”之饶,在中晚唐,盐业和纺织业发展很快,城市商业更加繁荣。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唐

以后农村中大量出现一类商业城镇,称之为“草市”。如蜀州青城山草市、彭州唐昌县建德草市、雅州严道县遂斯安草市、阆州茂贤草市。这些位于州城、县城以外的草市,设有固定店铺的商业点,是适应农村集市贸易而兴起的新型集镇和农村商业中心。它们的形成标志着这一时期四川农村的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5 交通 隋唐时期,四川的水陆交通事业,在秦汉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水上交通,岷江—长江航线在南北朝时期并不畅通,直到唐代才重新开通,并使之成为水上交通的干线。由于长江航线所连接的江淮和剑南西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商业贸易十分兴盛,所以这条航线是最繁忙的运输线。它既是繁荣的商道,公私旅行也多取此线进出四川。诗人杜甫的“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牧的“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沈惟”等名句,便描写的这条运输线上的繁盛景况。由于岷江—长江航线的重新开通,使得涪江航线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而在唐代,嘉陵江中下游水道则成为了剑南东川和巴南诸州的重要交通线。中唐以后,剑南东川和巴、阆二州的盐业和纺织业都有较大发展,大批商贸土特产品都是通过

《元和郡县志》卷2。

《杜诗详注》卷13《绝句四首》(之三)。

《全唐诗》卷522 杜牧《扬州三首》(之二)。

嘉陵江来进行运输的。沿嘉陵江下,可以“商通荆门路”溯江而上,又可前往关中,因此这条航线成为这一时期仅次于岷江—长江的重要水上干线。陆上交通,四川与关中的交通路线,大致可分为南、北两段。南段从四川盆地北上,翻越米仓山、大巴山,有四条重要路线:金牛路,从成都经剑阁入汉中的大路;东川路,从梓州到利州的大路;巴岭路,从今巴中北越巴岭至汉中的通道;馱路,从达州北越大巴山至汉中的通道。北段主要是从关中平原南面翻越秦岭,也有四条重要路线:褒斜道;陈仓路;傥骆道;

子午路。四川西部的交通路线,主要是从四川盆地至西部高原,这一时期形成了三条重要的路线:阴平道,山广元昭化至文县的道路;西山路,循岷江上游而行的道路;灵关路和和川路,从雅安西行,越夹金山进入大渡河流域的道路。四川西南地区的交通路线,即滇蜀通道,大致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由成都经今雅安、西昌南下;北路由今宜宾,经高县、筠连入云南。由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南路通道时开时闭,并不畅通,所以当时多走北路。入唐以后,南路才成为四川到云南的交通干线,并多次进行修筑。当时剑南西川与南诏、吐蕃的往来,多是经由南路展开的。

(四)隋唐时期四川的民族关系

隋唐时期是四川境内民族关系发

展的重要时期。这时不仅居住在四川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与历史上比较,发生了许多变化;而且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吐蕃、南诏,相继控制了四川的西部和西南部,与四川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对这一时期四川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隋唐时期四川的少数民族,种类甚多,分布较广,其中最主要的是僚、羌、蛮三个民族。

僚人是东晋时才自牂牁进入四川,而遍于蜀中各地的。至隋唐时,僚人分布于四川盆地周围山区及岷、沱二江中下游和渠江上游地区的33州,约占蜀境诸州的60%。这些僚族散居山谷,悉住丛箐,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基本上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阶段。手工业以僚布较为著名。社会组织尚处于初期奴隶制阶段。僚人入蜀,散居各地,逐渐发展至僚人与汉人的融合。僚人与汉人融合的过程进展不平衡,最早在川东地区,到晚唐已基本见不到有关僚人的活动记载。岷、沱二江中下游地区稍晚一些,直到南宋,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见不到僚人的踪迹。川南的僚人,从唐代开始直到明中叶才完成融合过程。

氏羌民族部落自古以来就活动于广袤的川西高原。至隋唐时期,它们频繁在这一地区活动,最著名的有弥药羌、白兰羌、那鄂羌,以及居住于今大、小金川一带的“西山八国”羌人部

落。党项羌和白兰羌完全是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西山八国”基本上属于农业部落,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占有一定地位。唐代四川的羌人部落,基本上还处于原始社会以及刚刚进入阶级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

诸蛮部落分布在川西南的高山大谷之间。其中雅州境内就有大小部落46个。在雅州和黎州之间,还有“三王蛮”。“三王蛮”以南是东蛮,东蛮以西是西蛮,东蛮以东有董蛮,因地处马湖江,又称为“马湖蛮”。东蛮、西蛮是从地理概念来区别的,而从族属来分辨,则又有乌蛮、白蛮之别,情况较为复杂。诸蛮部落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发展阶段,生产力低下,畜牧业还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种植业在当时该地区还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

这一时期四川民族关系上的重大事件有二:

吐蕃兴起与攻蜀 隋唐之际,雅鲁藏布江一带的吐蕃部落,完成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并形成奴隶制政权。赞普松赞干布兼并诸部,统一高原,迁都逻些(今拉萨),创文字,定法律,与唐朝、尼伯尔联姻,大量吸收汉、梵文化。至8世纪逐渐强大,向东发展。757年,吐蕃乘唐朝忙于应付安史之乱,进取崑州。762年,又尽据剑南西山之地,779年,吐蕃与南诏合兵,拥众20万,分三路进攻西川。

唐朝遣名将李晟统禁军救蜀,在大渡河大败吐蕃军。789年,西川节度使韦皋遣精兵5000人与“东蛮”共击吐蕃于台登(今冕宁县南泸沽),收复崑州。793年,韦皋又遣将分道出西山,打败吐蕃援军,继又分道进攻松、维等州。此后,吐蕃发生内乱,势力衰微,再也无力进攻四川了。

南诏兴起与攻蜀 唐初分布在川滇边境的一部分乌蛮进入洱海地区,与当地的白蛮组成六个部落,时称六诏。唐高宗时,为抵制吐蕃对洱海的扩展,竭力扶持六诏中的南诏,南诏首领遂依靠唐朝的力量,统一六诏,建立奴隶制政权。安史之乱后,南诏乘机与吐蕃联兵,向四川方向进行扩张。779年,南诏与吐蕃合兵20万,大举攻蜀,企图攻占成都,结果被唐军打败,南诏伤亡惨重。南诏从此与吐蕃关系恶化,转而归顺唐朝。820年,南诏首领乘蜀中边备废弛,再次兴兵攻蜀,一直打到成都城下。撤退时,又大肆虏掠,以至从成都以南直至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间,人畜为之一空。这是自隋代以来,四川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大破坏。869年,南诏王利用西川将领对朝廷的不满情绪,在其诱使下,再次举兵攻蜀,长驱直入,进围成都。在东、西两川的合力守御下,南诏无法得逞,只得撤兵退去。874年,南诏再次入攻西川,唐朝派高骈率军驰援,南诏闻讯后,立即撤兵请和。高骈被委任

为西川节度使,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南诏的防御。使南诏再也不敢轻易对西川用兵了。

(五)隋唐时期四川的文化

隋唐时期,四川地区经济繁荣,政治较为安定,加以邻近关中,不少的文人学士到此仕宦或寓居,以及民族交往频繁,都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得这一时期四川文化呈现出夺目的异彩。这表现在:

1 文学 四川的文学家在唐诗的兴起、发展和繁荣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陈子昂的诗歌主张,对唐诗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陈子昂(661~702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射洪县)人。出身于豪强,21岁出川,游学京师。684年,进士及第。以上书论政,为武则天所赏识,释麟台正字,转右拾遗。698年辞官回乡,后为县令段简所诬,入狱,忧愤而亡,年仅42岁。有《陈伯玉集》传世。陈子昂是继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一位诗歌革新骁将。唐初诗歌的主要创作倾向,仍然是沿袭六朝的华艳风气。陈子昂则打着复古的旗帜,批判六朝绮靡的唯美文风,主张恢复汉魏雄健沉郁的风骨,从而成为初唐诗坛的古雅派。他的这一主张,被《唐诗品汇》称赞为:“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陈子昂在自己的诗歌中,努力实践恢复汉魏

风骨的主张,其代表作为《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7首和《登幽州台歌》。其诗作几乎全是五言诗,其中绝大部分又是五言古诗。

除陈子昂外,间丘均、范崇凯、范文凯、雍陶、唐求等,也都是唐代著名的四川籍诗人。而在客居四川的众多文人中,以李白、杜甫和薛涛最为著名。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五岁时随父入蜀,居于绵州昌隆县(今江油县)。20岁以后,漫游四川,饱览四川锦绣山河,开阔了胸襟,形成自然豪放的诗歌风格。25岁“辞亲远游”,顺江而下,离开四川。他对四川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如《蜀道难》、《峨眉山月歌》、《朝发白帝城》等,都是以四川为题材的名篇佳作。李白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方法反映现实生活,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风格,扩大了诗歌的境界,把唐诗推向新的高峰。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安史之乱后,转徙流离到达成都,筑草堂于院花溪边。此后又在四川各地流寓,769年离开四川。杜甫客居四川十年,正值外患内忧严重的时期,杜甫由此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诗文,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疾苦,记录了当时政治、军事活动及社会经济状况,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极为珍贵的

史料。杜甫在蜀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成熟时期,也是创作大丰收的时期。其中,在成都浣花草堂就写诗 271 首,占他一生诗作的 20%,在夔州写诗 430 多首,占他诗作的 30%。因此,杜甫在四川的十年生活与创作,一直为后人所怀念。

薛涛(770~832年)字洪度,长安人,幼时随父入蜀,韦皋镇蜀时入乐籍,后脱籍隐居浣花溪,晚年迁至碧鸡坊,终老成都。薛涛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当时的著名文人,如王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都和她有诗文往来。其诗作声韵优美,格律谨严,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因而名重当时,广为流传。

此外,唐代著名诗人王勃、卢照邻、岑参、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也先后来过四川,他们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为推动四川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 艺术 隋唐时期四川的民间歌舞相当盛行。在民歌中,以三巴地区流行的《竹枝》歌最著名。歌词有七言、二句和七言、四句两种,均有和声。演唱分野唱和精唱两种形式,野唱盛行于民间,巴童女巫,手持竹枝或花枝,踏歌起舞;精唱流行于城市,由专门的女伎演唱,有的士大夫也精于此歌。《竹枝》声调,初唐时歌调凄凉幽

怨,中唐时歌声始则舒缓,继而高昂,尾声激讦,晚唐以后,逐渐趋于柔靡谐婉。

隋唐时期四川音乐舞蹈之风,极为兴盛。隋文帝时,蜀王杨秀曾经“造千面琴,散在人间”。唐代后期,京师长安动乱,大批乐工及音声人相继入蜀避乱,对蜀中音乐的繁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唐德宗时,西川节度使韦皋还把南诏和骠国的音乐、舞蹈和乐器引进四川,更丰富了蜀中原有的音乐舞蹈内容和形式。以至到唐末,成都的“管弦歌舞之多”,实在扬州之上。而蜀中的“村落间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简直成为名副其实的歌舞之乡。

此外,唐代四川百戏盛行,“每遇府中饷军宴客,先呈百戏”。乾符中,绵竹的百戏演员王俳优善演《河传》,能够“腰背一船”起舞,表明这是一种将歌、舞与杂技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在此基础上,唐代四川首次出现“杂剧”,这也是在整个中国戏曲史上目前所发现的文献中的最早记载。唐末南诏寇成都,在劫掠的九千人中,有来自成都、华阳的杂剧女演员锦锦,以及被称之为“杂剧丈夫”的两位男演员。当时四川不仅有众多的戏剧演员,还有“五人为火”的戏班,更产生了讽刺剧《刘辟责买》和《弄假妇人》等剧

目,因此时有“蜀戏冠天下”的称誉。

在绘画艺术方面,自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唐朝皇帝的多次入蜀避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京师和东南的著名画家,相继流寓四川。他们代表了当时各种绘画流派的最高水平。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四川的绘画艺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大批蜀籍画家相继出现。据统计,唐末著名画家27人,其中蜀籍画家7人,流寓四川的画家12人,总计19人,超过总数的70%,因此,可以说唐末全国绘画最兴盛的地区是四川,而中心则在成都。在蜀籍画家中,以中唐以后的王宰、李洪度、左全、张素卿等人最为著名。众多画家的作画题材,大致可分为山水画、人物画和花鸟画。总之,无论在内容、形式和技巧上,这一时期的四川绘画都在向新的境界发展。

随着佛教的传播和绘画艺术的提高,中国式佛画这一时期在四川地区逐渐兴起。在其影响下,佛教石刻造像不再有统一的规范性,定型化的模式逐渐为多样式所取代,从此开始突破佛教仪轨的制约,逐渐趋于写实。这些变化,最终导致四川佛教石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四川兴建的石刻大佛和石窟造像中,以乐山大佛和广元千佛崖最为著名。乐山大佛,又称凌云大佛、嘉州大佛,开凿在乐山

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的栖霞峰山崖之间,背岩临江,巍然端坐,高达71米,结构匀称,比例适当。开凿于先天二年(713年),完工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历经90年建成。堪称我国最大的佛像,也是世界最大的佛像之一。广元千佛岩自南北朝起,历经隋、唐、宋、明、清,陆续营造摩崖造像1700有奇,现存造像7000余尊,其中以唐代最多。大云洞、牟尼洞、睡佛洞,镂凿雕刻,独树一帜,不但佛教造像优美,而且还有穿唐服长衫的妇女形象,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

3 科学技术 隋唐时期四川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科技人才不乏其人。其中著名的有隋代四川大制造家何稠,祖籍西域,祖父入蜀经商,定居郫县。何稠精心研究已在中国失传的玻璃制造技术,大胆改革,“以绿瓷为之”。后又为隋炀帝设计制作“舆服羽仪”和百官仪服,参与营建东都洛阳;主持修造行殿和六合板城,智思绝巧,用意精微,为我国建筑制造业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唐代四川杰出的制造家梁令瓚所创制的黄道游仪,能正确地推算出日月的运动;他还与僧一行合作,研制出“水运浑天仪”。这台仪器能准确地测定朔望,报告时辰,是一台独具中国特色的天文钟。西蜀雷氏是唐代有名的乐器制造家。雷氏

以制琴为业,工艺超群,其所制之雷公琴,音色柔美,音质优雅,音量浑厚,被誉为神品,享誉中外。唐代段成式,字柯古,侍父入蜀,著《酉阳杂俎》20卷、《续集》20卷,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天文、物理、机械、工程、建筑、矿物学、医学、动植物学、农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内容远远超过了以前同类专著,是一部初具规模的百科全书性质的科技著作。直到今天,仍被中外学者视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常备资料。在医学方面,由于四川是我国的药材重要产地,《唐·新修本草》中所载的全国的药材至少有六分之一产于四川,加之云南、西藏及波斯、缅甸的药材也通过南诏、吐蕃运入四川,所有这些都为这一时期四川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昝殷是唐代后期的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他所写的《产宝》一书,详细分析了妊娠、临产、产后的各种常见疾病,被认为是“医效神验”,所载处方不少沿用至今,是我国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妇产科专著。此书很快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医药界的重视。

4 宗教 隋唐时期四川的宗教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自汉代张陵在四川创立道教以后,道教一直是四川最有影响的宗教。到了隋代,这里的风气仍然是“崇重道教”。入唐以后,皇室自称为老子的后裔,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又在全国多地造玄

元皇帝庙。在李唐王朝的尊崇下,老子的宗教化达到鼎盛时期,使得四川地区的道教更加兴盛。隋唐时期四川道教仍以符篆派为主,即相信科仪斋醮、符篆禁咒可以禳灾求福,役使鬼神。到唐末以后,经寓居四川的道教大师杜光庭的整理加工,使四川道教的斋仪更加完备。四川地区擅长符篆的道士很多,最著名的有翟法言,夔州云安县人,代宗赐号通虚天师,又加通天大师之号,长于秘篆和醮炼科仪。杜光庭(850~933年),字宾至。僖宗时为内供奉,后随僖宗入蜀,羁留不去。906年,杜光庭请经于平都山,得翟法言所传素灵符,遂编入三洞藏,称为《太上洞元灵空素灵符》。晚年隐居青城山,号东瀛子,著《道门科范大全集》等书,奠定了道教科仪的基础,自此以后,道教各科始有醮仪。

隋唐时期四川佛教更加兴盛,高僧辈出。据载,隋唐时期益州有高僧28人,仅次于长安和洛阳,是全国高僧最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以智炫、道一、宗密、知玄,占有重要地位。智炫,俗姓徐,益州成都人,北周时擅名京洛,入隋后赴西蜀宣扬佛法,后隐居三学山。道一(709~788年),俗姓马,汉州什邡人,后人尊称为马祖。玄宗时到衡山修习,得法于慧能弟子怀让,后到江西开堂说法,得法弟子139人,后人辑有《马祖道一禅师语录》和《马祖道一禅师广录》各一卷。宗密(780~

841年),俗姓何,果州西充人,被后人尊为华严五祖,著述甚多,留传至今有《华严经行愿品的疏抄》、《圆觉经大疏》等18种。知玄(809~881年),俗姓陈,眉州洪雅人。杜元颖为西川节度使时,知玄于成都大圣慈寺讲经知名,蜀人号称陈菩萨。宣宗时召入京师,署为三教首领。僖宗幸蜀,赐号悟达国师。隋唐时期,由于佛教逐渐中国化,相继形成不同的佛教宗派,其中对四川佛教影响较大的宗派有禅宗、

净土宗和密宗。密宗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主要在唐代后期。其中,以柳本尊在蜀中传播密教尤为著名。柳本尊(844~907年)名居直,嘉州人。886年,以嘉州人多疫疾,遂盟于佛,持咒灭灾,由此名声大振。后四处传教。901年至成都,有门徒数十人,在川西、川南建有多处道场。今大足大佛湾和安岳县的毗卢洞仍有石刻柳本尊炼图。

五、五代两宋时期

(一)前蜀的兴亡

唐末藩镇割据,最终导致了我国历史再次进入分裂时期—五代十国。907年,朱全忠篡唐,肇中原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始;王建在成都称帝,成为南方十国之一。

五代十国时期,四川先后建立了两个割据政权—前蜀和后蜀。前蜀统治四川的历史不长,可分为前后两段:

前期为王建图蜀。王建割据蜀中称帝,已经60岁,深知创业艰难。故即位之后,孜孜以求,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在蜀中的统治。其措施主要有:一是注意选用才能,广泛接纳唐末

避难入蜀的士家大族和文学艺术人才,使三教九流人物,皆能用其所长。史称王建治蜀“使修举政事,典故章文物有唐之遗风。”二是整饬吏治,抑制强暴。对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和入蜀功臣武将的不法行为,严加管束和制裁。三是减轻赋税,抬辑流亡,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四是整治甲兵,加强军事,扩充兵力,巩固边防,打败了来自北面、东面和西南面的军事进犯。五是审时度势,注意与割据中原的朱梁政权和割据关陇、荆南的势力,以及西南邻境的地方政权,都能保持友好关系,即使用兵,

也适可而止,不穷兵黩武。这些措施,对于稳定其在四川的统治是有利的。史称王建在位“擢用才智,抚养士兵,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使得前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其政绩“前视刘备,可以无愧”。

王建在位12年(907~918年),在其晚年为防范篡夺帝位,杀害功臣有才之士,陶醉于太平享乐生活,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朽进程。尤其是唯宦官、佞臣是信,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王建晚年得疾,在元膺太子被卫士杀害后,另立王衍为太子。918年,王建发现王衍不能守业,打算另立续嗣,但受命辅政皆奸邪之辈,未能如愿。六月,王建中毒而逝,仍由王衍继位,史称后主。

后期为王衍亡国。王衍是王建11个儿子中的幼子,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君主。王衍继位时,控制前蜀政权的以骄兵悍将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日趋腐朽。王衍不理朝政,把国事交给宦官佞臣办理,致使朝中皆奸邪之人。前蜀政治极度腐败,贿赂公行。太后、太妃各出敕令卖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阙,数人并争,出钱多的人便得到。以致当时的人称王衍当权时,作大官的都是“盗跖之辈”,在郡县当官都是“虎狼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官僚断性命于儿戏之间,戮仇讎于枢

机之下,断国章为戏判,用三军为儿戏。统治集团享乐腐化之风盛行。王衍承继王建积累的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终日寻欢作乐,对人民的疾苦和国家存亡漠不关心。922年夏,蜀地天旱,赤地千里,“所在盗起”。前蜀王朝危机四伏,摇摇欲坠。925年,后唐庄宗派大将郭崇韬领兵伐蜀。前蜀兵败,王衍正准备到秦州掠美女,行至利州,听说后唐军大至,仓惶逃至成都。当年冬,后唐兵入成都,王衍投降,前蜀灭亡。前蜀政权历王建、王衍两代,统治四川共18年。作为一个割据地方的偏安朝廷,前蜀的典章制度多仿效唐代中央王朝,但很不健全。前蜀的疆域,辖有今四川大部,陕西南部、甘肃东部及湖北西部一隅,其界西接吐蕃,南邻南诏,东接荆南,北邻后梁。这一疆域,在前蜀灭亡后,又归于孟和祥的后蜀政权统治。

(二)后蜀的兴亡

925年后唐灭前蜀,任命孟知祥为西川节度副大使,董璋为东川节度副大使,四川归于后唐统治。八年后,即934年,孟知祥据有两川,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

后蜀政权经历了孟知祥建立后蜀和孟昶进行统治两个阶段。

孟知祥建立后蜀。孟知祥(874~

《蜀祷机》上卷。

《蜀祷机》上卷。

934年) ,字保胤 ,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人。先事晋王李克用 ,克用爱其才 ,以弟克让女妻之 ,累迁亲卫军使。923年 ,李存勖灭后梁 ,建立后唐 ,是为庄宗 ,以太原为北京 ,用孟知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后唐灭前蜀 ,以孟知祥为中书门下平章事 ,成都尹 ,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926年 ,后唐皇室易主 ,庄宗为乱兵所杀 ,明宗拥立为帝。孟知祥阴有割据四川之志。他表面上与后唐保持君臣关系 ,暗地里加紧王蜀的准备。他首先扩充军队7万余人 ,分戍成都内外 ;控制财赋 ,拒不发送库金给京师 ;控制西川官吏的任免 ,迳由“本道自署” ;支持东川节度使董璋反唐 ,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932年 ,孟知祥诱使董璋率兵进攻成都 ,至成都被孟知祥打败 ,退回梓州被部将所杀。孟知祥终于后发制人 ,尽有东川之地。933年 ,明宗加封孟知祥为蜀王。934年正月 ,孟知祥在成都称帝 ,是为后蜀高祖。七月病死 ,其子孟昶继位。

孟昶在四川的统治。孟昶(918~965年) ,字保元 ,初名仁赞 ,孟知祥第三子。孟知祥称帝 ,进检校太保 ,东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祥病革 ,立为皇太子 ,权监军国事。知祥死 ,袭位 ,史称后蜀后主。即位时年仅16岁。即位之初 ,孜孜求治 ,以免重蹈前蜀王衍覆辙。他采取措施惩治专横旧臣 ,经过15年的斗争 ;故将大臣

殆尽” ;整饬吏治 ,严惩贪官污吏 ,多有成效 ;劝农恤刑 ,肇兴文教 ,使得蜀中经济文化都得到发展 ,在五代十国中居于领先地位。但后期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 ,特别是孟昶长于深宫之中 ,在奢靡之风的习染下 ,中年以后 ,以侈靡为乐 ,达官贵人 ,竞相效法 ,贪污腐化 ,穷奢极欲 ,致使内政外交失策 ,国势衰微。加之孟昶两次出兵关中 ,大败而归 ,加重了北边人民的负担。951年 ,郭威建立后周。955年 ,后周派兵伐蜀 ,后蜀政权岌岌可危。960年 ,后周禁军最高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 ,夺取政权 ,在开封建立宋朝 ,史称北宋。964年 ,赵匡胤根据“先南后北”、“先易后难”战略 ,遣军分北、东两路伐蜀。次年正月 ,北路军统帅王全斌抵达魏城(今绵阳境) ,孟昶奉表投降 ,至此立国30年的后蜀政权灭亡 ,四川又归于北宋王朝的版图。

(三) 北宋时期四川的政局

1 初期 北宋初期30多年(965~1000年)的四川历史 ,主要是围绕宋王朝对蜀中的掠夺、阶级矛盾急剧发展及其所引起的反宋兵变和人民起义展开的。

北宋王朝在统一南北的军事行动中 ,以“先取西川”为目标 ,把四川作为统一南方的财力、物力补给地 ,因此平蜀后 ,大肆劫掠搜括 ,不惜手段地从蜀中征敛财物。它不仅将孟蜀府库悉数转运出川 ,归于京师 ,而且还对一些重

要商品实行专卖,在蜀中各州置“情买务”、“市买院”、“织造院”等机构,垄断纺织品的产销,并榷盐酤酒,禁民私酿,严重损害了各阶层群众的经济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宋朝将蜀中铜钱、金银发送京师,致使四川铜钱竭乏,物价飞涨。作为亡国臣民的四川官僚地主阶级既失去孟蜀政权的依靠,在新政权下其政治经济利益不仅得不到保护,反而受到打击,因此他们对北宋王朝也大为不满,大多采取离异态度。至于广大的蜀中农民,则更承受沉重的赋租徭役负担。他们在严酷的压迫之下,每遇水旱灾荒,便只得离乡背井,逃荒觅生,以致“饿殍相望”,转死沟壑。

在宋初阶级矛盾急剧发展的背景下,直接导致了反宋兵变和人民起义的爆发。其中最主要的事件有:

全师雄领导的蜀兵起义。全师雄(? ~ 966年),后蜀文州刺史,为蜀将,有威惠。北宋平蜀后,遵命带领家属赴京师拜谒新朝皇上,由文州行至绵州。时值乾德三年(965年)春,宋朝发蜀兵赴京师,途经绵州,因所发路费被宋朝克扣,举行起义。全师雄弃家属匿民舍,被蜀兵搜出,推为统帅,拥众10余万,号“兴国军”。全师雄领导的蜀兵,攻绵州不克,转攻彭州,成都所属十县皆起兵响应。全师雄遂自号“兴蜀大王”,设官职,分兵据灌口、青城、郫县、新繁等地,邛、雅、果、渝、

嘉等17州皆起兵响应,围攻成都不克。不久,宋将败全师雄军于灌口。966年,全师雄兵败,退至金堂病死。余部推谢行本、罗七君为首领,占领铜山,坚持斗争,被宋军擒获。为时一年有余的全师雄领导的这次蜀兵起义终告失败。

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小波(? ~ 994年),宋永康青城县(今灌县东南)人,因“贩茶失职”,淳化四年(993年)聚集这一带农民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受到群众拥护,“贺者多来附”。率领起义军攻打青城、彭山诸县,杀贪官,分金帛,归之者众,其势愈炽。当年冬在江原县(今崇庆县东南)与西川主力宋军作战,不幸捐躯。起义军推其妻弟李顺(? ~ 994年)领导。淳化五年(994年)初,李顺率军攻克川西诸州,接着攻克成都,拥众至数十万。成都知府吴元载,转运使樊知古逃奔梓州。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建立“大蜀政权”,设置机构,任命中书令、枢密使、军帅、知州、刺史等官员。还铸铜钱“应运元宝”和钱“应运通宝”,起义军战士面刺“应运雄军”四个大字。大蜀政权遣义军四出攻打州县,控制了北抵剑门,东至夔峡,南达嘉州的大部分州县,使关右震动,北宋朝廷极为忧惧。宋太宗急令地方官加紧镇压,并派宦官王继恩率禁军由陕西入蜀。6月,官军陷成都,李顺及部率3

万余人被杀,余部在张余领导下继续战斗。至道元年(995年),张余在嘉州被俘就义,整个起义宣告失败。

王均兵变。王均(?~1000年),宋真宗时任神卫都虞侯,戍守益州。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部卒赵延顺不堪铃辖符昭寿的压迫剥削,发动兵变,杀符昭寿,拥王均为帅,占据成都,建“大蜀”政权,年号“化顺”,设官置署,攻占汉州等地。有众数万人,进攻绵州、剑门关不克,复归益州,闭城自固。宋真宗派户部使雷有终率兵镇压,至十月始破成都。王均率众逃至富顺,兵败自缢。余众6000人投降。至此,北宋初期四川人民反宋武装斗争才告结束。

发生在宋初的上述三次起义和兵变,对宋代四川和全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历全师雄起义后,给宋朝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使之在其后讨南汉、平江南、征北汉、灭吴越的过程中,再也不敢象平蜀后那样以征服者自居,而不得不约束军将,严禁杀降掳掠。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把中国农民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北宋统治者还从这些起义和兵变中认识到,要巩固在四川的统治,还得以四川的地方势力为依靠,从而改变了宋初排斥、歧视四川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策,注意启用他们共同对四川进行统治,这就

为北宋中后期四川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2 中后期 北宋中期和后期四川政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整个社会趋向稳定,蜀籍官僚士大夫逐渐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经历宋初30多年的起义和兵变之后,太宗、真宗、仁宗三朝都十分重视对四川的统治,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四川社会的稳定:(1)注意选贤任能,肃清吏治。对不能治蜀的官员坚决调离;而对于治蜀有方的官员加以奖励;对于枉法失职的官员则严加惩处。结果,终使“川峡令录多得良吏”,吏治有所改善,官民矛盾有所缓和。(2)安抚百姓,对参加起义和兵变的军民“许其自新”,除官吏外,皆释不问。多次颁治减免川峡地区受灾害州县的田赋和逋欠,遣官入蜀赈济灾民,尽量缓和阶级矛盾。(3)选用蜀中士大夫出仕为官,改善中央与四川地方势力的关系。从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张泳入蜀主政开始,北宋王朝采纳张泳的举荐,首次录用蜀籍士人张及、李畋、张逵三人登科,此后又采取一些优待政策,鼓励蜀中士大夫出仕为官,以至到仁宗以后,蜀中士大夫入仕者与日俱增,蜀士从此成为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力量。(4)改善并加强对四川的控制,鉴于蜀中地域辽阔,远离朝廷,为便于应援,咸平四年(1001年),宋朝在蜀地设益、梓、利、

夔四路,简称川峡四路,四川从此得名。宋朝同时还加强对戍守四川东兵的控制和管理,防止东兵将校在蜀日久,与地方势力勾结,滋生变故。

上述措施的实行,很快收到效应。1054年,甲午岁,正值王小波、李顺起义一个甲子(60年)的纪念。虽然当时四川民间盛传该年“岁凶”,蜀必再乱。但由于当时四川社会内部基本稳定,正如张俞所分析的:“赋无横敛,刑无滥罚,政无暴,民无党,力于农则丰,工于业则财羨。惟安和是恃,惟嬉游是图。甚者以至无饥寒而竟逸乐……”,从而消除了再次发生60年前起义和兵变的基础,终于使得当年平安无事。

随着仁宗以后蜀中士大夫入仕者的人数不断增多,以及相应政治地位的提高,他们不但参与四川地区的施政意见,而且还在中央朝廷发挥一定影响。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的洛蜀朔党争,便是这一发展趋势的表现和结果。1068年,王安石入京主持变法,以蜀人苏轼、苏辙等为代表的在朝蜀中士大夫,提出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主张。他们对新法持保留和反对态度,主张开源节流,不赞成王安石“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方针,因此多被贬斥出朝,任职地方。以至到元

丰时期,蜀中士大夫几乎无一人任朝廷担任要职。及至哲宗元祐年间司马光废除新法后,原来不赞成新法而被贬作地方的蜀中旧臣又才纷纷召回朝廷,如苏辙、苏轼、范祖禹、范百禄、吕陶等,均被委以要职。司马光死后,元祐诸臣中因人事倾轧和学术政见主张分歧而形成几个小团体的党争,其中,以苏轼、吕陶、苏辙为首的蜀党,与以程颐及其门人为首的洛党和以刘摯、梁寿等为首的朔党,互相攻击,彼此混战。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打击元祐党人,洛党、蜀党、朔党无一得免。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亲政,蔡京、童贯窃国柄,利用惩治党人打击政敌,重定元祐和元符末党人为一籍,共309人,入籍官员均遭贬谪流放,他们的子弟也受到种种限制。从此,蜀洛朔三党,个个俱伤,而蔡京、童贯之流则得以在徽宗统治20多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掌握军政大权,最终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

(四)南宋时期四川的政局

1 前期 公元1115年,我国东北部的女真族建立金王朝(1115~1234年)。1125年,金朝灭辽后,随即向北宋发动大规模进攻,1127年占领宋朝京师汴梁,徽、钦二宗被俘,北宋亡。宋朝迁都临安(今杭州市),史称南宋。南宋历史分为前、后两段,前期以抗金

为主,后期以抗元为主。四川处在抗金、抗元战争的前线,政局便围绕这两大中心任务展开。

在前期,四川地区发生的重要事件有:

张浚与富平之战。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人。政和进士,北宋累官至太常寺主簿。南宋高宗即位,除枢密院编修官,升殿中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年)金军尚未渡江进攻杭州前,张浚因平定苗傅、刘正彦有功,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五月,张浚自请经营川陕,以图中原,被任命为宣抚处置使,委以便宜处置军民财政。次年10月,张浚调集宋军40万人向金发动进攻,在富平县(今陕西富平县)与金军激战,因指挥失当遭到惨败。张浚退奔四川阆中,陕西五路尽失,“巴蜀大震”。从此,陕西形势之地和北宋集中在此的军事实力断送,南宋偏安之局形成,四川被推至抗金前线。绍兴二年(1132年),张浚因富平之败罢职。1141年“宋金和议”,1142年,宋金正式划定,东路以淮水中流为界,西部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宋王朝只能在西起天水,东迄汉中、安康一带布置防线。由此形成以陕西汉中一带为前线,以四川为后方依托的抗金格局。整个南宋前期的抗金战争,便由指挥战争的川陕宣抚司、负责军民之政的四川制置司和筹集经费的四川总领所这三大机

构,组成四川防区的战时领导体系。

吴玠、吴玠抗金保蜀。吴玠(1093~1139年),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未冠,以良家子从军,抗夏御边,屡立战功。1130年富平之败后,宋军一溃千里,逃奔四川。吴玠招集流亡数千人与弟吴玠(1102~1167年)字唐卿,坚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扼据险要,使金军不敢袭后入蜀。在公元1131~1134年间,曾三次重挫自秦陇大规模进攻四川的金军,大败金将兀术,保卫了川蜀安全。吴玠与金对垒10年,官至四川宣抚使。吴玠守蜀时,吴玠任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知秦州(今甘肃天水)。吴玠卒后,吴玠与郭浩、杨政三帅分守陕南。绍兴十年(1140年),节制陕西诸军,败金兵于扶风,使之不敢度陇。绍兴末,历官至四川宣抚使,在川陕前线坚守20余年。吴玠、吴玠兄弟抗金斗争成绩卓著,特别是和尚原、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金军灭辽破宋以来的头两次惨败。他们领导的抗金斗争,粉碎了金转攻蜀灭宋的战略,遏止了金军攻蜀的企图,保卫了四川的安全,为四川地区较长时期的社会定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曦叛宋。吴曦(1162~1207年),顺德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吴玠孙,吴挺子,以祖荫补右承奉郎。1193年,吴挺死,宋廷以吴氏三世袭兵柄,削去兵权。吴曦从川陕调临安

任殿前副都指挥使,乃贿赂权臣韩侂胄,图谋帅蜀。1206年,韩侂胄发动对金北伐战争,委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招抚使,使之成为宋军西线主帅。吴曦早就对宋朝削夺吴氏兵权不满,既掌兵权,阴蓄异志,暗中勾结金人,拟献仙人关外四州之地,以换取金人承认其为“蜀王”称号。1207年,吴曦公开自称“蜀王”,建行宫,置百官,向金朝献出阶、成、和、风四州。同时派军扼守夔门,阻击宋军,声言约结金人攻襄阳。吴曦叛宋,使宋军北伐部署遭到很大破坏,直接导致“开禧北伐”的失败。吴曦倒行逆施,遭到他的部属和蜀人的强烈反对。兴州典仓官杨巨源策划讨伐吴曦,联络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率义士74人,闯入吴曦伪宫,一举将其诛杀。吴曦叛宋称王仅41天便宣告失败。

兵变不断发生。南宋四川军政腐败由来已久,武备松懈,军纪涣散最为突出。由各种军内矛盾所激发的军士兵变(包括叛乱和起义)连绵不断,层出不穷。早在孝宗时期,就先后发生了1180年的“庚子沈黎西兵之变”和1181~1182年的“辛丑沈黎土丁之变”。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泸州骑射卒张信等作乱,杀其帅臣张孝芳。及至宁宗时期,兵变规模和次数都超过以往。吴曦叛宋和“开禧北伐”失败后,兵变层出不穷。1209年,沔州统制张林作乱,事觉贷死。1211年,沔

州守将刘世雄等谋据仙人关作乱,伏诛。嘉定十二年(1219年)春,兴元军士权兴等作乱,犯巴州,守臣弃城逃去。同年5月,兴元军张福、莫简因官吏克扣军饷,领导“红巾队”起义。6月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聂子述遁,杀总领财赋杨九鼎。继掠阆州、果州,攻占遂宁府。7月,张福屯兵普州之茗山,转战川中五个月来,如入无人之境,四川为之大震。宋廷派沔州都统张威入川镇压,经过数月的战斗,张福请降被杀。由他领导的红巾起义至此失败。

2 后期 南宋后期四川地区屡遭蒙古侵犯,1260年忽必烈建元中统,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史称元朝。宋元双方围绕四川地区的争夺,展开了长达50多年的激烈斗争,其时重大事件有:

巴蜀战场的溃败。巴蜀战场是蒙古军在1234年灭金以后,最先开辟的对宋战争的战场,也是宋元战争中,与荆襄、江淮齐名的三大战场之一。早在灭金以前,蒙古军即在1227年灭夏攻金的过程中,进犯过利州西路的部分州县。1234年灭金后,蒙古军在凤翔开垦屯田,并不时越过秦岭,攻拔宋军设在蜀边的据点。1235年秋,宋军设在大散关外的五州、三关均遭破陷,四川荆置使赵彥呐退保剑门。1236年秋,阔端率蒙古军自汉中攻蜀,诸王穆哥取阴平道借袭。11月,各路蒙古军云集于成都附近。四川制置副使、

兼知成都府丁黼率军抵抗,众寡不敌,被蒙古军射杀,成都失陷。蒙古军继又分兵四出,深入各地抄掠,使得整个四川都受到摧残和破坏。据统计,这一年,蒙古军“凡破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八”;全蜀“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这次蒙古军攻入四川内郡,使得四川人口大量死亡和逃散,田畴普遍荒芜,财用空前匮乏。此后一段时间,四川不得不仰仗朝廷拨给荆湖米数十万石饷师,以支撑蜀中政局。阔端退军后,留下都元帅塔海继续在蜀境骚扰,轮番对四川后方进行抄掠和破坏,使宋朝难以在遭受破坏的西川地区重建抵抗据点。1241年,蒙古军听说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在成都、汉州等旧城基础上“复立其城”,立即派兵进攻。由于守将田世显投降,陈隆之被俘,成都城又遭破陷。蒙古军押陈隆之越汉州,命他招谕宋将出降。陈隆之不屈被害,汉州守将突围出逃。这次蒙古军共破成都、汉州、嘉定、泸州、叙州等20城,宋军“阵亡者众”。蒙古军所到之处,“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余玠治蜀与四川山城设防。余玠(? ~ 1253年),字义夫,蕲州(今湖北

蕲春)人。家贫,初投淮东制置使赵葵,抗击蒙古军,屡立战功,官至制置司参议官,进工部郎官。淳祐元年(1241年)率兵援安丰,升淮东制置副使。次年,应诏朝对,见理宗,表示愿以收复全蜀为己任,授工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总领兼夔州路转运使。1243年春,余玠在重庆设立帅府,建馆招贤,遴选守宰,整顿军纪,屯田耕稼,遍令四川诸郡据险建筑山城。在1243~1251年间,修建、扩建各类山城20座,著名的如钓鱼、青居、云顶、大获、凌云、运山、天生、平梁、得汉、神臂、大良等,“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余玠以其所创筑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充分发挥了蜀险优势,找到了以步制骑的防御形式,为卓有成效地开展对蒙古军的攻防战创造了条件。1243年,余玠领导宋军在四川战场上“大小三十六战,多有劳效”。1246年,又取得粉碎“北兵分四道入蜀”的胜利。1251年,余玠率四川宋军,号称10万,分道北伐,攻围汉中,不克而返。1252年秋,又调集全蜀精锐部队在嘉定(今乐山市)开展会战,粉碎了蒙古军的围攻。1253

姚燧《兴元行省夹谷公神道碑》,《元文类》卷62。

《宋季三朝政要》卷1。

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永乐大典》卷10889。

《宋史》卷416《余玠传》。

《宋史》卷43《理宗纪》。

年,余玠在蜀十年,被朝廷猜疑,召赴临安,闻命暴卒。余玠死后,继任制置使和四川宋军仍继续坚持余玠生前所部署的山城防御体系,以抗击不时来犯的蒙古军。

蒙哥征蜀与钓鱼城之战。蒙哥(1209~1259年),即元宪宗。元太祖幼子拖雷长子,自幼由太宗窝阔台抚养。1235年,与拔都、贵由等率师西征。1251年即大汗位,急于建立超过父祖的功业,决心亲自率军,图蜀灭宋。1258年,分兵三路向南宋发起全面进攻。蒙哥自率主力自陕入蜀,取金牛道,攻拔利州、苦竹隘、长宁山城,降大获、运山、青居、大良诸城,直抵合州钓鱼城下。兴元都统兼知合州王坚,展布筹策,简辑兵民,加强防御。在1259年2至4月,蒙哥督军攻打钓鱼城,为王坚守军所挫。5月,蒙古军屡攻不克,士气大为低落。王坚不时派兵乘晚“斫营”,袭扰蒙军。5月下旬,宋理宗以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命他率军入蜀,以解合州之围。吕文德溯江而上,在合州南面的三槽山与蒙古军大战,败归重庆城。至6月,钓鱼城坚守如故,并击毙蒙军前锋将汪德臣。7月,大旱酷暑,蒙古军中大疫,军心涣散。蒙哥汗“不豫”。7月上旬,御营转移,次过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而死。蒙哥死后,跟随他征蜀的蒙古军,除留驻部分守军外,其余多军皆撤至六盘山,至此,钓

鱼城战役宣告结束。钓鱼城战役因直接导致蒙古军主帅的身亡,影响了蒙古顺流东下,乘势以定江南的作战计划,对延长南宋王朝的统治时间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元朝统一四川。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是为元朝。此前,忽必烈已接受南宋四川降将刘整的建议,将主力方向由四川移至长江中游的襄阳、樊城,并已完成对襄、樊的战略包围。1274年,元军攻占襄阳、樊城后,迅即对南宋发动总攻,并令元军攻取东、西两川。1275年相继占领四川嘉定、泸州、叙州等沿江城寨,分五路包围重庆。合州守将张珩拒绝元军招降,继续坚持抵抗。1276年,元军进入临安,南宋灭亡。张珩再次拒绝招降,并遣军收复泸州,解围进入重庆,就任四川制置使。元军更换将帅,增派兵力,于1277年攻陷泸州,1278年再次集结兵力围攻重庆。宋军势穷,部将开门纳降,元军占领重庆。张珩巷战失利,乘船东下,被获后不屈而死。元军相继攻拔川东一带的山城。1279年一月,合州守将王立降元。二月,陆秀夫负幼帝赵昺在崖山投海而死。元朝彻底平定四川诸城,统一了四川。历时45年(1234~1279年)的宋元战争宣告结束,四川从此又纳入元朝的统一疆域。

(五)五代时期四川的经济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不已,北

方经济遭到较大的破坏。四川地区由于外部吐蕃、南诏势力的衰落,无力再度进行侵扰,出现了安宁的周边环境;而内部则由于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使两个割据的封建政权不得不实行守境安民政策。加之中原人民的不断入蜀避难,增加了劳动力;前、后蜀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比较注意发展生产。所有这些,都为这一时期位居十国前列的前、后蜀的地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在五代时期,四川社会经济并不如中原地区破坏衰退严重,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

1 农业 由于前后蜀政权都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农民的辛勤劳动,这一时期,尽管934~941年蜀中天灾不断。但由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有所增强,不仅没有出现唐末战争年代那种“饿殍狼籍,死者相继”的现象;与此相反,在前蜀,出现的是“仓库充溢”、“五谷丰稔”、“民黎乐康,蜀人富而喜邀”的局面。后蜀时,从942~945年连年风调雨顺,农业大丰收,粮食储备更为丰裕。北宋伐蜀时,从兴州、兴元、利州缴获后蜀军粮共150万石,足见蜀中粮食的富裕。四川粮食生产

的发展,为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五代时,四川的桑麻种植十分发达,其中种桑养蚕事业,已突破传统的一家一户自种自养的小规模种养的局限,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商品化的种养活动。故王建说:“条桑甚多,倘税之,必获厚利”。四川茶叶生产的发展超过了唐代。曾任前、后蜀中枢大员的毛文锡所著《茶谱》载,蜀中产茶地区很广。前、后蜀统治者都把垄断茶利作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并将四川茶叶运往陕西,换取四川所需的食盐,可见茶叶对安定当时人民生活、巩固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五代时期四川的花卉种植相当兴盛。前后蜀皇宫广建园苑,遍植各种奇花异木。在君臣们的热心倡导下,当时成都浣花溪旁,种植多种名花异木,馥郁十里,一眼望去,若临神仙之境。适应社会喜爱花卉的需要,买卖花卉已成为每年春节蚕市交易的重要内容。各种花卉中,尤以栀子、牡丹、海棠、芙蓉,最为时人所重。孟昶令成都城上遍种木芙蓉,夏秋间盛开,四十里城垣尽铺锦绣,高下相照,十分漂亮。从此,成都又有芙蓉城之称,亦简称蓉城或蓉。芙蓉花今已成为成都市花。

《五国故事》上。

《十国春秋》卷36。

《十国春秋》卷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后蜀一·本纪》。

《五国故事》上。

2 手工业 五代时期四川丝织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前蜀灭亡时,仅府库库存就有“纹锦、绫、罗五十万匹”。后蜀的丝织业更发达,特别是蜀锦的织工多,技术好,产量大,是全国重要的丝织中心。孟昶曾令一棱织成锦被,名曰鸳鸯,幅宽五尺,中间无缝,比织窄锦的技术难度更大。后蜀灭亡时,府库积存的丝织物比前蜀更多。北宋运送府库积存,发卒担运,每40卒为一纲,经过几年时间,才把孟氏所积存的多种物资运归内府。宋朝还选拔蜀中技术优良的蜀锦织工数百人到开封,充实京师绫锦院。总之,五代时期四川纺织业的发展,为宋代纺织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五代时期四川造纸仍然发达,成都仍然是四川的造纸中心,继续生产唐代在四川生产的多种纸张,而且还新创造出“霞光笺”。当时四川的造纸工艺还传入江南,南唐皇帝喜爱蜀纸,派人“求纸工于蜀”,并在其境内设置“纸务”,专门仿造蜀纸。五代四川的印刷业进入广泛雕印图籍的新阶段,前蜀时开雕印行杜光庭的《道德经广义》30卷,后蜀宰相毋昭裔更是大规模刊印书籍,版印《九经》,这些都为宋代四川印刷业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3 商业 由于对外贸易受到割据地域的限制,稍逊于唐;而对内贸易则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加之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王朝,故内部物资充裕,

仍大体维持着唐代的繁荣局面。城市商业相当繁荣。成都是四川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其他为梓州、阆州、夔州、绵州、遂州、彭州的商业也较为发达。不少王公贵族和官僚参加商业贸易,在通都大邑开设存放货物的邸店,“与民争利”。在农村商品发达的地区,仍主要是通过定期集市进行商品交换。前后蜀时期,四川同中原和周边地区的商业贸易也未间断。当时蜀中有专门出售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的“江货场”。蜀中市场上出售的由海外舶来的香药,十分有名。前蜀王衍的昭仪李舜弦,祖籍波斯,世代经营香药,她的兄弟李四郎便以出售香药为业。四川与周边民族地区的商业贸易亦十分密切。王建曾在汶、黎、雒、茂等州设市,与番马交易,十年之间“得官马八千,私马四千”。此外,前后蜀政权还在邛州生产一种“番饼茶”,长期供西番和党项羌使用。

(六) 宋代四川经济的高度繁荣

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在相对安定的局面下,在唐、五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四川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社会经济又有了全面的长足的发展。宋代是四川历史上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代,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

1 农业 高度繁荣的宋代四川经济,首先表现在农业的大发展上。在

宋代,四川地区的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原有的水利工程得到整修,新建、扩建工程项目不断完成。川西平原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在宋代已形成为有三大流、十四支流和九个堰的灌溉水系,受灌面积及于川西平原的广阔地区。自宋代起,都江堰开始有对渠首工程进行冬季岁修制度的记载,凡渠网各堰高下、阔狭、深浅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由于宋代对岁修工程要求严格,又有州县长官亲自督促领导,所以做到了“置堰灌溉,旱则引灌,涝则疏导,故无水旱”。随着水利工程的不断修建和完善,灌溉面积日益扩大。一些大型的渠、堰、堤、塘工程,动辄灌田数千顷、数万亩。而遍布全川的一些小型水库、水塘,也在数十百顷之间。据资料记载,神宗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年),成都府路有水利田29处,2883顷87亩,梓州路有水利田11处,901顷77亩,利州路1处,31顷30亩,夔州路274处,854顷66亩。由此可见宋代四川水利灌溉事业较前有所发展。在宋代,四川农民非常重视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在宋朝其他农耕地区经常缺牛的情况下,四川地区注意发展耕牛,在公元965~1021年的56年中,全国牛生二犊共116起,而其中四川就有86起,占总数的74%。这反映四川的耕

牛发展和饲养技术在全国居于先进行列。四川农民重视农时和田间管理,川西平原和川中丘陵地区的农作物施肥和精耕细作已达到相当水平,也居于全国先进行列。由于耕作水平的提高,宋代四川农民不但在种植粮食作物上,而且对种植经济作物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如遂宁的甘蔗、彰明的附子种植,都有符合科学的耕作方法,因而知名于全国。在土地开发上,宋代四川地区十分注意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通过增加复种来提高产量。故史载:四川“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在充分利用丘陵地区土地的同时,宋代四川还积极开垦山区和边远地区土地,在南平军(今南川县境)和泸南等少数民族住地,随着大批汉人移入开荒耕种,使这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中国的梯田是从宋代开始普遍发展起来的。四川农民把荒坡地改造成梯田,即使在没有堤堰陂塘之利的“雷鸣田”,也由于有田埂就能蓄水,因而同样能种植水稻,这对于丘陵、山区土地的进一步开发是十分有利的。宋代四川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较高,仅低于农业最发达的两浙地区,是宋代重要的稻米产区。粮食生产自给有余,还外销荆湖等地。南宋时期,四川负

《宋史》卷95《河渠志》。

《宋史》卷89,《地理志》。

担川陕驻军军粮达 150 余万斛,占全国军粮总数的三分之一。经济作物生产也有较大发展,同唐代相比较,宋代四川地区种植茶叶更为普遍,茶叶产量显著增加。公元 1084~1085 年川峡地区茶叶产量约 1500 万公斤,南宋前其成都、利州二路岁户茶 1051 万公斤,均超过此前整个东南地区产量的总和。水果、中药材和花卉的生产也十分发达,并作为商品行销各地,知名全国。四川柑桔除销售外,还作为贡品送至京师供皇室享用。四川以中药材品种多、产量高,也成为全国著名的药材基地。彭明附子年产 16 万斤以上,行销全国,各地商人纷纷入蜀争购。花卉的种植已由供富豪园苑而逐渐向县镇民间普及,花卉作物的商品化,使之成为农业中的一项重要经济作物。北宋崇宁中,彭州的花户从数千里外的洛阳引种牡丹花获得成功,从而使得彭州花户益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

宋代农业的大发展还反映在人口的迅速增长上。965 年北宋灭后蜀时,户 534029,到 1223 年,增加到 2590092 户,200 多年间四川人口增加了近 5 倍,占南宋辖区户数的 20%。如按照官方的户率:“大率户为五口”统计,即以一户五口计算,南宋

嘉定十六年(1223 年)的 259 万户,人口数便超过了 1000 万。这个人口数字,远远超过汉唐四川人口数,是 19 世纪以前四川历史上人口的最高纪录。

2 手工业 高度繁荣的宋代四川经济,更表现在手工业的发展和进步上。在宋代,四川的纺织业,无论布匹、丝绸和蜀锦的生产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纺织中心之一。其中,布匹生产具有产量多、品种多的特点,而且四川的贡布和产布的地区远比唐代为多。纺织生产较之唐和五代,又有大的发展和进步。种桑养蚕,缫丝织缣,遍布全川。除历代四川的丝织中心成都及川西地区外,在宋代又兴起了以梓州、果州、遂州、蓬州、巴州、阆州等州为代表的川中、川北地区的丝织中心。成都蜀锦名扬天下,梓州的熟绫、白花绫,遂州的樗蒲绫,以及蓬州的棕丝绫,达州的兰绸,阆中的莲绫也相当有名。这些丝织物,织造精美,质地优良,价廉物美,备受时人称赞。1083 年(元丰六年)成都府官吕大防,创办官营上供机院—成都府锦院,集中工匠,统一严督管理,虽然以保证朝廷对蜀锦的需求为目的,但却把蜀锦生产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锦院所生产的蜀锦,品种繁多,图案装饰和色彩纹样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

宋代蜀锦提花精确,锦面平整细密,色调淡雅柔和,工艺水平很高,已能把绘画艺术及画中水墨晕色巧妙生动地织出来,形成了独特的蜀锦风格。所以,宋代所织的蜀锦,又称为宋锦,其工艺为后代织锦所继承和发扬。在这些蜀锦样品中,现存的“八笞晕锦”,是纬三重纹织,缎地、纬浮花,地呈红色,纹色由红、绿、兰、浅黄等色组成,以几何形构图为主,锦面由大小两种八瓣形图案和垂直交叉的直线构成。图形花样丰富多彩,美不胜收。创于北宋的“落水流锦”,是成都织锦艺人根据唐、宋诗句加以艺术概括而创造的图案。它在组织、配色、图案上不拘泥一定的形式,但始终保持落花与流水这一主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流派和风格。这一艺术创造,为后代锦缎作坊所因袭,同时为其他工艺美术品种广泛采用。宋代四川的井盐生产比唐代更为发达,不仅产区扩大、产量增多,而且在开采技术上又有一个大的革新。北宋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4年),四川劳动人民在前代凿井工艺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卓筒井工艺。这种先进的凿井工艺,节省人力物力,提高了功效。“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故私家小户均能鸠工开凿,又易于掩藏,逃避课税,它的兴创和推广,对四川井盐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钻井史上也是划时代的贡献。与凿井技术提高的同进,宋代四川还掌握了提高井盐卤水浓度,加快入锅成盐,以提高食盐纯度的技术。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宋代四川井盐产区扩大,产量增多。北宋前期共有600多个盐井,产盐815万公斤。到南宋高宗时期,有4900个盐井,产盐3000余万公斤。由于井盐产量的不断增加,尽管宋代四川人口迅速增长,但仍能做到自给自足,从而改变了唐代四川井盐不能自给的状况。宋代四川的造纸业,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不失为全国的重要造纸基地。其中,成都的百花潭、浣花溪一带从事麻纸生产的人户多达数十百家,所产纸张质地洁白,远近闻名。在纸的加工上,除继续生产唐代名噪一时的“薛涛笺”外,宋代四川还有与之齐名的“谢公笺”。这是由谢景初(1019~1084年)在浣花溪上主持制造的十色书画笺,比薛涛笺色彩更为丰富,为时所重。宋代四川蜀纸体重,坚韧洁白,而又耐折叠,不易磨损,是印制纸币的最佳材料。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北宋四川交子,就是“制楮为券”,用蜀纸印制的。以后全国各地的钱引、会子等纸币,亦是用蜀纸印成的。宋代四川的雕版印刷业十分发达,和浙江、福建同为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宋代四

川雕版印刷业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唐和五代,对当时和后代的科学文化的传播都起了很大作用。雕刻印刷广布全川各地,以成都、眉山最为发达。971年,宋太祖命张从信到成都监刻《大藏经》,刻板13万块,历时13年完成,世称《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或简称《蜀藏》。这是佛教史上第一次开刻《大藏经》,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印行的一部佛经总集。四川官刻的其他图书,至今仍有若干存留国内外,成为珍品。宋代四川私刻图书风气盛行。私刻图书又分书坊、书肆和私家刻书,简称坊刻和私刻。私刻和坊刻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和商业利益,都注重质量,同时为防止侵权行为,他们还在世界上首创了二项保护印刷出版单位权益的规定:一是注明印行图书的单位,防止他人假冒;二是开创了“版权所有,不许翻印”的禁约。四川雕印的书版,称为蜀本、川本。以其字大如钱,比一般字体稍大,故又称为蜀大字本。蜀本还有板好、字好、墨好、纸好的优点,所印书籍,字体朴厚,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工艺精美,为时所重。故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誉。宋代是我国陶瓷业上的繁荣时期。宋代四川瓷业虽不如北方的定、汝、钧、官等窑和南方的龙泉、景德镇等窑的产品著名,但较之唐代四川地

区的制瓷业,则有了长足的进步。考古发现的材料表明,宋代四川窑地星罗棋布,分布于川西、川南、川东的广阔地区和川北部分地区。既有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又有独家经营的个体小窑。瓷器品种门类多式多样,陶瓷色彩可分为黑瓷、青瓷、白瓷三大系。工艺特色既继承了唐代,又有创新发展。宋代四川制糖业相当发达,是全国重要的产糖基地。糖的种类很多,有蜂糖、蔗糖、沙糖、乳糖和冰糖(糖霜),其中以冰糖产量质量居于全国之首。据《糖霜谱》记载,宋代出产冰糖的福州、宁波、广州和四川广汉、遂宁五郡,“独遂宁为冠”。北宋末遂宁除常贡外,岁进糖霜数千斤。至南宋初年,遂宁一带的冰糖作坊近300家,大的作坊雇佣工人一二十人。宋遂宁人王灼在《糖霜谱》中还详载了制糖工具设备和工艺流程及取霜方法,表明当时糖业生产已具有较高水平。宋代四川酿酒业也较为发达,反映在酒课收入上,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四川年收入酒课220万贯,占全国的14%。南宋绍兴末年(1162年),四川酒课岁入410万缗至690万缗,占全国酒课收入的29%~49%,表明四川酿酒业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3 商贸 高度繁荣的宋代四川经济,还表现在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城

市和集市商业的进一步繁荣上。宋代是我国商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商税额的多寡,反映了商业的发达情况。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商税共804万贯,其中川峡四路166万贯,占全国商税的20%。征收商税的商税务,1077年前后,四川共有321处,其中成都府路116处,梓州路80处,利州路67处,夔州路58处,这也从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四川各地经济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情况。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宋代四川地区的城市更加繁荣,农村的集镇也蓬勃兴起。“素号繁丽”的成都,这时已成为“西南大都会”。在这里,万井云错、层楼复阁,高车大马,络绎不绝。奇物异产,百货汇集,珍奇间错,布列街市,弦索夜声,入耳笙歌,是全国最重要的商业都会。至南宋,成都“繁盛与京师(临安)同”;“侈繁钜丽,遂甲于天下”。唐末五代在这里兴起的季节性贸易,至宋代已发展为按月令季节售物的贸易集市,无论在规模、内容、时间上都大大超过了唐代的范围和水平。宋代成都还把唐末五代兴起的游乐之风,发展成为游乐兼商业贸易的定期集会。据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一年之中宴游聚会多达25次以上。除成

都外,梓州已成为四川的大都会,原有的药市时间增长,1077年州城商税为55000贯,在四川州城仅次于成都市。政和元年(1111年)升梓州为潼川府。遂州在两宋为梓州路转运司治地,主办一路财政事宜事。政和五年(1115年)亦由州升为府。果州“繁盛冠东川”;“蜀人唤作小成都”,在宋代已发展为川中北的商业中心。利州仅次于成都、梓州、遂宁、果州,居四川商税收入的第五位,宋人称利州“为小益,对成都为之大益也”。此外,夔州、渝州、合州、泸州、嘉州、戎州、黎州、雅州,这些城市的商业在宋代也都相当发达,不失为新兴的商业性城市。宋代四川地区集市场镇的兴起,使农村商品生产和交易更趋繁荣。据统计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四川增加的79个征收商税的场务,大多设在新兴的市镇上。元丰元年(1078年),川峡四路共有688个镇,其中有43个县(监)拥有6个以上的市镇,约占总县数的25.9%。随着商业的发展,宋代四川境内外的交通运输较前代更为繁荣。在这些众多的连接外部的交通道路中,尤以川陕干道和长江水道交通运输更为发达。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信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日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文天祥《衡州上元记》,《文山全集》卷9。

《舆地纪胜》卷156。

《舆地纪胜》卷184。

渐扩大。四川专用铁钱带来不便,进一步激发了货币流通中的矛盾,促进了金融存款业的发展。加之成都生产质地精良的麻纸和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为用相同纸张印制难以仿造的纸币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所以,在成都印刷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已是水到渠成了。大约在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已出现了经官府允许的,由富民经营的交子铺,开始发行交子。这种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活期存单和现金支票。直到天圣元年、二年(1023、1024年),宋廷决定正式设置益州交子务,发行交子以后,交子才在货币流通过程中逐步完善为真正的纸币。官营交子,自一贯至十贯文,每三年发行一次,谓之一界。仁宗以后,交子的使用也推广到陕西、河东、京西等地区。交子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

(七)五代两宋时期四川的少数民族

五代两宋时期,原住四川的少数民族迁徙变动不大,仍然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沿边地区,绵亘数千里。少数民族部落,殆千万计。其分布情况大致是:

散居内郡各地的僚人,进一步与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到南宋时

期已大致完成融合过程。在宋代僚人集中居住的南平僚区,约当今綦江、南川和贵州桐梓等县,部落杂处,互相争掠。1070年,宋朝派兵征伐,直接管辖。1121年,又以其地属南平军。南平军的建立,结束了各部落首领独霸一方的割据局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以致后来南平军“衣冠宫室,一皆中国。四民迭居,冠婚相袭,耕桑被野,化为中华”,成为宋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

这一时期,居住在黔、涪、夔沿边一带的少数民族统称“西南夷部”。宋初以来,以“西南七蕃”最盛。七部自为其国,国王所居,无壁垒,有城郭、官府,惟短垣。经济较为落后,以农业生产为主,狩猎业占有重要地位。终宋之世,“西南夷部”一直与宋朝保持友好的臣属关系。

居住在泸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宋代称之为“泸夷”、“泸州蛮”。他们除原有的僚人诸部外,还包括势力逐渐增强的“乌蛮”部落。在泸南诸部中,“宴夷”居住在今兴文、长宁、珙县一带,从事农耕,经济较为进步。由于宋代著名的盐井监—涪井监就位于这一带少数民族的腹心地区,因为为了涪井的盐业之利,经常发生汉夷争斗事件。宋朝为了平息“宴夷”的武装攻劫,曾多次出兵讨伐。直至政和五年

(1115年)赵遼讨平宴夷卜漏,拓地千里,连筑五城之后,宋朝与“宴夷”的武装冲突方告平息。泸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相当发达,宋朝的直接统治,使封建制取代了原有的落后制度。手工业也较为发达;“泸茶”是当时四川名茶之一。当地少数民族普遍掌握井盐生产技术,制铜、制铁和武器制造都有较高水平。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唐代以前“未免荒陋”的长宁地区,自宋代始有登科者;“政和以来,儒风渐盛,家诗户书,号为礼义之邦”。

居住在叙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马湖蛮”、“南广蛮”和石门蕃部,合称“叙州三路蛮”。居住在嘉州地区的主要是“虚恨蛮”。“叙州三路蛮”中,马湖蛮的农业发展水平与汉族没有多大区别,南广蛮自宋朝始“纳土归化”,实行兵农合一制度,进步较大,石门蕃部较为落后。宋朝与“叙州三路蛮”有密切的关系。太宗太平兴国(976~984年)间,正式在戎州置市马场,与石门、马湖开展互市,并在叙州设立“抽税场”,任命通晓互晓夷语的郡吏为“蛮判官”,加强了三路蛮与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虚恨蛮”是宋代活动于大渡河南峨边一带的民族部落,经济较为落后,经常与宋朝发生冲突。宋朝边将岁以茶盐犒赠其酋,求得安宁。嘉定六年(1213年),虚恨

蛮攻掠峨眉中镇寨,酿成“癸酉虚恨之变”。宋朝为了自身安全,严禁虚恨蛮通过要道进入嘉州互市,故虚恨蛮只得常附邛部川部到黎州汉地进行贸易活动。

居住在黎州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西山野川路蛮”,黎州西南的少数民族称为“黎州诸蛮”。西山野川路诸部以畜牧业为主,狩猎是重要的副业。毗邻汉区的部族,以定居农业为主。宋朝沿袭唐制,在雅州设置羁縻州44个,仅仅维持羁縻统治。另在雅州和碉门设置市马场,供汉夷互市交易。碉门(今天全县西)是宋代蕃汉贸易的重要集市,以至“蜀之富商之大贾皆辐辏焉”。黎州诸部蛮因毗邻汉区,汉人或被掠或流亡入其境,带去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術,加之传入汉地的租佃制,使农业更为发达。经济作物中以红椒(花椒)最为著名。畜牧业是黎州诸部的主要生产部门,也是宋代四川地区畜牧业的主要产地。宋朝每年买马量占四川境内买马总数的一半以上。宋朝在黎州(今汉源境)设立互市,开展蕃汉贸易。在黎州诸蛮中,以活动于大渡河北,汉源县境的“部落蛮”,又称“三五蛮”反复无常。前蜀永平四年(914年),王建斩“三王蛮”首领,震慑诸部,使之断绝与云南

嘉庆《长宁县志》。

李心传《宋代朝野杂记》乙集卷20。

长和国的关系,终五代迄宋,不敢进犯西川。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三王蛮举兵反宋,逼进黎州,史称“庚子五部落之变”。宋朝调军讨伐,始被迫请降。宋朝许通互市,建立正常贸易关系。

居住在岷江上游威、茂二州的羌人部落,在吐蕃瓦解后,有的纳土内附,也有不少部落仍接受吐蕃统治。前后蜀和两宋时期,岷江上游今阿坝州一带仍由吐蕃统治。宋朝在威、茂一带设羁縻州进行统治。宋时,威、茂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在从茂州至石泉(今北川)一线,羌民以耕稼孳畜为主,五谷六畜禽兽草木村无不备有,与内郡所产无异,农业相当发达。其余地区则以畜牧为主,狩猎、采集占有一定比重。土产中以麝香、当归、羌活最为知名,是传统的贡品。羌族人民长于商业贸易,宋朝去茂州和永康军设置市马场,与羌民进行茶马贸易。羌族人民把他们的牲畜、土特产品运至汉地出售,加强了羌、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八)五代两宋时期四川文化的兴盛

五代两宋时期,随着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四川文化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兴盛的局面。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跻身于全国的先进行列。这表现在:

1 文教事业 自唐末以来,四川所在学校废绝,至后蜀起,文教事业渐次复苏。后蜀孟氏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在成都兴办官学两所,草创制度,沿习唐制,恢复庙学。广政七年(944年)宰相毋昭裔令人勒石书《九经》,贮于成都学宫,便于儒专学习。后蜀广政十六年(953年),他又捐资百万营建学校,使后蜀在五代十国中“以文为事”,名列前茅。

宋朝的文教事业在后蜀基础上又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宋朝教育机构大体分为三类:官学、私学和书院。宋代官学,即庙学,凡修学处皆置孔庙。据统计,宋代四川建立庙学的地方共有95处,在南宋四川244个州县中,42%的州县已设置学校。宋代四川私学十分发达,形式多样,既有乡学、村学,也有私塾学馆。私学是儿童启蒙教育的主要阵地,普及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宋代,文化教育程度颇高的“神童”甚多,妇女知书识理,文化知识较高的人也不少,这都与私学的发达普及分不开的。两宋时期四川书院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南宋,伴随着理学在蜀的广泛传播,书院更是盛极一时。作为私家讲学和教育机构的书院,其主要活动是:传播儒家文化和私家学术观点,祭祀儒家先圣先贤,收藏书籍。在四川教育史上,宋代书院推动了四川教育的发展,传播了儒家文化,开阔了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学术眼界,为四川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南宋四川知名的书院有修文书院(洪雅)、果山书院(蓬州)、柳沟书院(富顺)、少陵书院(夔州)、静晖书院、竹林书院(夔州)、同人书院(夹江)、巽岩书院(丹棱)、金渊书院(黎州)、五峰书院(泸州)、鹤山书院(邛州、蒲江、泸州)、龙门书院(江安)、北岩书院(涪州)、濂溪书院(合州)、沧江书院(成都)、云山书院(三台)、东馆书院(眉州)等等。

科举制的繁荣发展。前蜀除在末年举行制科取士外,科举制度几乎废绝。后蜀广政十二年(949年),置礼部贡举,恢复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唐制,并有所改进。北宋初年,蜀中士大夫读书好学,淡泊名利,不事举业。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以来,四川登士者接踵而至,到了仁宗朝,才出现了四川士大夫热心科举的局面。宋代,科举大体实行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南宋时由于四川处于抗金前线和远离中朝,只实行解试和类省试两级考试。类省试是由四川地区代替中央省试的考试。两宋四川的科举业,在深厚的文化教育基础上,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据嘉庆《四川通志》统计,两宋四川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者,高达3992人。宋代四川及第人数空前绝后,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从地域分布看,其中成都府路及第1771人,占

总数的44.36%;潼川府路及第1916人,占总数的47.9%;利州路录194人,占总数的5.7%;夔州路录120人,占总数的3%。在成都府路中,以成都府和眉州录取比例最高,分别占该路的38.9%和33.8%,足见其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而四川的一些边远州县,到了南宋也有了人才及第。各地科举及第人数和比例的差别,大体反映了各地经济发展和学校发展的不平衡状况。

2 科技 自古以来四川地区的科技事业比较发达,有长期的积累、良好的基础和优秀的传统。五代十国以来,四川地区社会相对安定,不少外地学者流寓四川,对促进全国科技交流与进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以致在科技事业的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天文学方面,前蜀置司天机构,于909年颁布了《永昌历》。《永昌历》由前蜀司天监胡秀林制定。史称胡秀林“妙精历法”,时人称其推步之妙,天下一人。他曾在唐廷任司天监,参与制定《景福崇元历》。入前蜀,又著《正象历经》一卷。后蜀时,胡韞任司天监,史称其“精天官之学”。宋代四川天文学人才辈出,以北宋张思训、南宋黄裳成就最为突出。张思训,巴中人,原为北宋司天监学生,979年设计浑天仪成功,擢为司天监司天浑仪丞。他对天文学的主要贡献是革新了浑天

仪。以水银代替水作动力,保证浑天仪一年四季都能运行,装置擒纵器,对浑天仪的机械计时器作了较大改革。与唐代旧仪比较,张思训仪最为巧挠,尤为精巧。这就为我国古代最先进的浑仪—苏颂浑仪的诞生创造了条件。黄裳(1146~1194年)字文叔,号兼山,隆庆普城(今剑阁)人,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黄裳任嘉王府翊善时,为了帮助嘉王学习,于绍熙元年(1190年)绘制了《天文图》等八幅图,后被摹刻于苏州文庙的石碑上。这便是闻名世界的苏州石刻《天文图》。该图所绘的便是北宋五次大规模观测恒星位置所作的第四次观测结果。这一观测结果,标志了宋代天文学发达的程度,受到当今世界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对黄裳《天文图》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从中世纪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在地理学方面,有宋一代四川研究者众多,著作丰富。最著名的有黄裳的《地理图》,现存苏州市博物馆。图上山脉呈层峦叠嶂之形,具有立体感,地名用阳文加方框,水名用阴文加圆框,各路名用阳文,整个画面具有图画特色。宣和三年(1121年)四川荣县《九域守令图》,绘宋全境疆域及州府。图中山东半岛和海南岛等的形状比南宋上石的图更为准确。宋代四川以修“图经”和“志”书形式编写地理书

非常流行,据不完全统计,总数不下六七十部。这些地理书,有记四川地理及驿站路程的;也有记四川以外乃至全国地理,而为蜀人所撰的,著名的如北宋李攸的《九域志》、苏东坡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华阳范子的《皇州郡县志》等。

在医药学方面,在前后蜀时期,孟知祥镇西川时,以医闻名的虞洮,被蜀人称之为“蜀之上医”,医术十分高明。王建主川时,僧人智广善于治病救人,以至“病者竟来,日有数千百人”,被时人称之为“圣僧”。前蜀李珣,字德润,祖先为波斯人,隋朝时来华定居,入蜀为梓州人。长期经营香药,具有丰富的海药知识,撰有名著《海药本草》(又名《南海药谱》),丰富了我国药物学内容,有利于我国传统药物学的发展。后蜀韩保升,潞州长子人。后蜀广政时,官至翰林学士。长于“名物之学”,后主命其主持编修新的药典,定名为《重广英公本草》,后世称为《蜀本草》。明代李时珍高度评价《蜀本草》,称其“图说药物形状”,颇详于前代著名药物学家陶(陶弘景)、苏(苏敬)。宋代,四川的医药学发达,医林高手众多,医药著述丰富。著名的如唐慎微,字审元,蜀州晋原(今崇庆)人,寄籍成都,世业医,终身不仕,医术高明,治病号称百无一失。医德高尚,不分贵贱,有请必应,不避寒暑雨雪。精通医理,于神宗元丰年间编成药物学巨著《经史

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22卷。火观二年(1108年)经专家修订,定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32卷,由官方刊印颁行全国。《证类本草》载药1558种,新增药628种,是中国第一部完备的药典,对后世影响甚大,明李时珍撰《本草纲目》,就是以《证类本草》为蓝本。《证类本草》并传入日本、朝鲜等国,为世界药学界所称道。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说“十二、三世纪的《大观经史证类本草》的某些版本,要比十五和十六世纪早期欧洲植物学著作高明得多”。史堪,字载之,四川眉州人。北宋时进士,任过官吏。精通医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人治病,审证精切,不过三四剂药便治好病。著《史载之方》上下卷,立方论32门,各门均有医论,共载药方107个。该方临床效果明显,被时人称为医学指南,因此又名《指南方》。清代医学家周海学评论该书说:“独辟新思,启发后学,功在脉经脉诀之上”。苏轼博学多才,对医学也颇有研究,曾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与沈括《存中良方》合并,称之为《苏沈良方》。现存《苏沈良方》八卷。清人评价说:“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

在其他科学技术方面,后蜀彭晓

对古代炼丹术的贡献最为突出。彭晓,字秀川,永康军人,曾任后蜀朝散郎、祠部员外郎等职。撰《周易参同契通真义》3卷,对被古代作为易数阴阳之说的东汉魏伯阳编的《周易考同契》,正式确认其是古代炼丹之“丹经”。在此基础上,他把炼丹过程总结为九个阶段,即“火候九转”,还对一些物质的化学变化及性质做了比较正确的解释。宋代秦九韶对数学的贡献最为杰出。秦九韶(1202~1261年),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安岳)人。随父从宦,历官至司农丞。秦九韶精研律算、天文、营造、音律之学。1247年完成《数学九章》18卷,书中最突出成就是对“大衍求一术”(一次联立同余式解法)和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扬。这两项成果,在西方分别晚至18世纪中期和19世纪初才得到类似的解决,因此他不愧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此外,两宋时期的科技著作较多,重要的还有: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较完整地汇集整理了北宋以前有关笔、墨、纸、砚的生产历史和制作技术。田锡的《曲本草》,是中国现存唯一一部介绍曲酒的专著。杨天惠的《彰明附子记》,专门记载了附子栽种、管理、收集、加工及鉴别的知识。王灼《糖霜谱》介绍了从

《评注史载之方序》。

《四库全书总目》卷103。

甘蔗栽培到制糖取霜的流程,以及冷却结晶原理和工艺。李石的《续博物志》,介绍了从上古到北宋年间的科学技术 430 项,是我国古代一部不可多得综合性科技著作。

3 经学(理学) 宋代四川经学甚为发达和繁荣,以传授和研究经学为主的官学、私学和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涌现了不少著名的经学大师,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撰写了为数众多的经学著作。四川的经学研究门类齐备,在《易学》、《春秋》学的研究上成就斐然,其中尤以前者成就最为突出。据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供录》一书统计,宋代四川经学著作共 280 余部,其中《易》学专著 66 部,约占总数的 23.57%。宋代四川的《易》学研究,数量多,水平高,名列全国前茅,程颐盛赞曰:“《易》学在蜀耳”。在众多的《易》学研究者中,著名的有:陈抟(879~989年),字图南,安岳人。后唐时,举进士不第,隐居武当山,后移居华山。宋太宗时,赐号希夷先生。他善于融合儒、释、道三教,创造新说,著有《太极图》、《先天图》、《易龙图》等流传世间。提出了诸如无极、太极、阴阳、动静、性命、理欲、虚空等一系列哲学范畴,认为万物一体,惟有超绝万有之“一大理法”存在。其说后经周敦颐、邵雍推演,成为理学的基本范畴和组

成部分。龙昌期(971~1060年),字起之,号竹轩,北宋陵州(今仁寿)人。进士及第,充益州讲说,一生都在教读和著述中度过。论著丰富,达 20 余种,百余万言。尤擅《易》学,撰有《周易祥符注》、《周易绝笔书》等著,因大胆排斥先儒,甚至诋毁周公,招致封建统治者的严酷打击,遭到禁锢,学术著作失传。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佛学,后从南平郭曩氏学《易》,再入洛从程颐学《易》,深得精义,造诣愈深。其《易》学成就甚高,深受程颐赞颂,赢得“《易》学在蜀”的美誉。南宋著名学者冯时行、张浚等人都是从谯定学《易》,得其旨意。理学起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到理宗之后,成为官方哲学。北宋时,理学在四川传播,遭到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派的抵制,直至南宋时,四川理学才出现繁盛局面,涌现出在全国知名的理学家。最著名的有: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人(今绵竹)人。张浚子,以荫补官。少从南宋著名理学家、二程再传弟子胡宏,学习孔子仁义之旨和二程的理学思想,成为南宋理学的一代宗师,与朱熹、吕祖谦三人,自成一派,在理学界互相鼎立,时称“东南三贤”。主持岳麓书院,入学者众,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张栻一生著述甚多。有《南轩集》存世。其在理学的建树,主要在

于“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论“持养”重在“力行”；强调学重明义利、去人欲、存天理等等。魏了翁（1178～1237年）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蒲江）人。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历官至金书枢密院事、资政殿大学士。治学严谨，穷经博古，自成一家，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他在南宋理学发展上的贡献是：大力提倡理学，上疏乞为周敦颐及二程定谥，表彰他们的功绩，系统阐述了理学思想及社会作用，为理学争取到官方统治思想的社会地位；创办鹤山书院，所到之地，传播理学思想；“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在理学的学术研究上，兼收并容，集各家之长。魏了翁是南宋后期确立统治地位的重要人物，与同时代的真德秀（号西山）齐名。理学从开创到这时确立其统治地位，历经了约180年，在思想界统治了500年后，遂为清代乾嘉学派所取代。

4 史志学 四川史家承继汉晋以来长于修史编志的优良传统，在五代两宋时期，又在史学和方志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特点是：参预官修《实录》、《国史》等当代史者较多，且在官修史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私家修史成风，所撰史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传诸后世的史学名著较多。

在史学方面，前后蜀和两宋王朝十分重视修史工作。前后蜀均没有史馆，前蜀于912年诏令平章事张格等编修开国以来《实录》；后蜀李昊以宰相监修国史，撰写了《前蜀史》、《后蜀高宗实录》30卷、《后蜀主实录》80卷，但这些史书均失传。宋代官修史书成为朝廷的一大要务。两宋时期，进京为官参预史书修撰的四川学者在朝廷史官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官修史书中，几乎每一朝都有川籍官员主持或参与编纂。其中如：

阆中人陈尧佐，参预修撰《真宗实录》及《真宗国史》；

华阳有范镇，主持编撰《仁宗实录》；

双流人王珪，主持、监修《仁宗实录》、仁、英《两朝国史》、《庆历国朝会要》；

华阳人范祖禹，参与修撰《神宗日历》、《神宗实录墨本》；

双流人邓洵武、新津人张商英，参与编撰《哲宗实录》，邓洵武参与修撰《神宗正史》；

范祖禹子范冲，主持重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

新繁人勾涛，主持修撰《重修哲宗实录》、《徽宗实录》；

眉州丹棱人李焘，主持编修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增修《徽宗实

录》、《四朝会要》和《乾道续四朝会要》；

遂宁人杨济，主持编修《嘉泰考宗会要》；

井研人李心传，主持编修《中兴四朝国史》、《十三朝会要》；

汶川人谢方叔，编纂《七朝武经要略》、《理宗日历会要》、《理宗玉牒》等书。

此外，宋代四川学者还参与了前代史和其他史书的编撰。如范镇参与编撰《新唐书》、范祖禹协助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苏易简主持编撰《续通典》等。

这一时期，四川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尤其是有宋一代四川私修史著繁多，大家辈出。史著风格各异，体裁多样，门类齐备，体现出宋代四川史学的雄厚实力，以及百花盛开的局面。

宋代四川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史学家和著作，他们为巴蜀史苑增辉添彩，在史学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著名的如：

“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均为眉山人。苏洵（1009～1066年）撰写的《史论》，是关于史学评论的重要文章。苏轼撰有《唐书辩疑》和《地理指掌图》等书。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他撰著的《古史》60卷，流传至今，补《史记》之缺，辨《史记》之误，对先秦史

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三范”，即范镇、范祖禹、范冲，均为华阳（今成都市）人。范镇（1008～1089年），字景仁，曾参与官修正史《新唐书》的编撰，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范祖禹（1041～1098年），字淳甫，一字梦得，范镇从孙。协助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负责唐代部分，撰成《唐鉴》12卷，坚持以古鉴今史观，具有一定地位。范冲（1067～1141年），字元长，祖禹长子，主持重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撰成《神宗实录考异》和《哲宗实录辩诬》二书，修史态度慎重。

“二李”，即李焘、李心传。李焘（1115～1184年），字仁甫，一字子贞，号巽岩，眉州丹棱（今丹棱）人。一生著述宏富，除担任国史编修官，主持撰修《四朝国史》、《四朝会要》外，私修史籍20余种，现存《续资治通鉴长编》，共1060卷，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时人称李焘是“蜀中史学之首号，议论有根据，亦清放”。李心传（1166～1243年），字微之，隆州井研（今井研）人。参加过《中兴四朝帝纪》，十三朝《会要》的修撰。一生著述宏富，以两部史学著作最为知名，一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一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二书取材甚丰，互为经纬，是研究南宋历史的重要资料。李焘、李心传是南

宋史学家的杰出代表,故有人评价其地位和影响说:“有宋一代史学之精,自司马光外,无如二李。”

此外,还有王称,南宋眉州人,著《东都事略》130卷,是经传体的北宋史。该书史实详瞻,信而有征,元代官修《宋史》时亦多资用此书。张唐英(1029~1071年),蜀州新津(今新津)人,著《蜀祷机》二卷,以编年叙事,记王建、孟知祥据蜀之事迹颇详细,是研究前后蜀史的重要书籍。郭允蹈,南宋资州(今资中)人,著《蜀鉴》10卷,前八卷记秦取南郑至宋平孟昶1200年间蜀中治乱兴衰之史,附以西南夷始末二卷,可补正史之不足,是研究四川古代史的重要史籍。

在地方志方面,在宋代四川史学繁荣的同时,方志学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都有专门的记载。地方志的各种门类的志书,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出现。据估计,宋代四川方志可考见,近二百种。其中,有最为流行的《图经》。可惜宋代四川各路的图经均已佚亡,从其他文献著录引用的可见,孟蜀孙遇、杨纘在乾德初年为赵匡胤绘制的《蜀中山川形势图》,尽陈蜀中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

里远近,成为北宋指挥灭蜀战争的军事地图。蒙文通先生估计:“总宋蜀中四路图经,无虑千卷”。两宋纂修方志著作也十分盛行。这些方志同样早已佚亡,其中庆元四川制置使袁说文纂修的《成都志》,凡山川地域、生齿贡赋、古今人物,上下千万载间因革兴废,皆汇聚书中。除图经、方志外,宋代四川史家所撰的方志性质的著作还有:勾延庆的《锦里耆旧传》4卷、宋祁的《益部方物略记》1卷等。佚亡的著作则有五代杜光庭的《续成都记》、仁显的《华阳记》,宋代张绪的《锦里耆旧续传》、赵抃的《成都古今集记》、王刚中的《续成都古今集记》、范成大的《成都古今丙记》、胡元质的《成都古今丁记》、孙汝聪的《成都古今前后记》、叔曹远的《江阳谱》等等。宋代四川方志著作的成就,是构成宋代四川史学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两宋之世,蜀中史著之争,方志之富,实在是超越汉唐之上。

5 文学艺术 五代两宋时期是四川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四川文学艺术的多个领域异彩纷呈,是同时代全国文艺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一时期四川文艺名家辈出,他们的艺术成就在全国都占有一定地位。

在文学方面,前后蜀时期,四川文

《四库提要辩证》卷5。

蒙文通《华西大学图书馆四川方志目录序》。

学堪称发达,其代表成就是词。词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文体,唐末呈现出文人填词的发展趋势。到了五代,填词风气更盛,并由中原推广到了四川。前后蜀最高统治者喜好填词,更使四川成为五代词坛的代表区域,人称“蜀为词乡”,并形成了词学发展史上的“花间派”。花间派是由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而得名。其词作大都是用艳丽的词句,去描写男女艳情、女人的生活,具有婉约绮丽的风格。韦庄是前蜀词坛和诗坛最负盛名的作家。韦庄(836~910年),字端己,唐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早年作长诗《秦妇吟》,人称“秦妇吟秀才”。894年,进士及第。901年入蜀为王建掌书记。王建称帝,累官至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同平章政事。著作颇多,今存《浣花集》10卷。韦庄词作风格,善于把文人词带到民间抒情道路上来,又对民间抒情词以艺术的加工提高。是与花间派创始人温庭筠齐名的著名词人。他在诗坛上也颇有名气,《浣花集》中至今流传还有300余首。韦诗中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佳作,在五代诗坛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在前后蜀时期,四川女子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全五代诗》记载,四川留有名姓的女词人便有十来位,她们多是帝王和达官贵人的妻妾。

其中,如王建妻妾二徐,能诗,至今保留有诗十余首。后蜀花蕊夫人徐氏,幼能文,尤长于宫词,著有《宫词百首》,述后蜀宫廷生活,洋洋洒洒凡二千八百言。徐氏《宫词》在后世有一定影响,至北宋中叶“盛行于时”。

两宋四川文学繁荣发达,“文学之士,彬彬辈出”。据《四库全书》统计,所存两宋蜀人文集有30余家。《宋代蜀文辑存》辑录散见于群书之中的452家蜀人遗文达2000余篇,文坛之盛可见一般。宋代四川文学的成就,分别体现在散文、诗、词三个方面。

在散文方面,四川文人积极投身北宋初期反对唐末五代浮靡文化的古文运动,为实现宋代文坛健康文风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其中,涌现出的代表人物有苏舜钦(1008~1049年),字子美,梓州铜山(今中江)人,其祖父苏易简、父亲苏耆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为光禄寺主簿,大理评事。他在政治上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革新运动;在文学上倡导健康文风,好为古文。其为文笔力雄健,感情奔放,说理性强,叙事清晰,具有雄健朴素的风格,在宋代诗文改革中起了承先启后的推动作用。有《苏子美集》问世。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是在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中涌现的

一员干将。他大力提倡古文,猛力抨击当时文坛上出现的以“怪诞诋讪为高”的“太学体”文风,倡导文章要“正言之”,使“人人知之”。更重要的是,他写了大量堪称典范的文章,使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至此确立了坚实的地位。他的杂记、序跋、随笔、小赋等散文,大多夹叙夹议,抒情描写错杂并用,艺术成就远在政治论文之上。苏轼的《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都是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

在诗歌方面,宋代四川诗坛群众基础广泛,据《宋诗纪事》和《宋诗纪事补遗》统计,蜀籍诗人有395人,散见于其他书籍的另有86人。在众多诗人中,产生了一些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作家。如北宋前期的魏野、苏舜钦,中后期的苏轼,南宋时寓居四川的范成大、陆游等,都为四川诗歌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魏野字仲先,号草堂居士,“以诗著当世”,是真宗朝四川的著名诗人。北宋古文运动先驱苏舜钦,在诗坛上也颇有名气,与著名诗人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其为诗“奔放纵横”;“雄豪放肆”,又具有强烈的议论化、散文化趋向,对宋诗特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轼是宋代诗坛的杰出领袖。他继承并发展了唐诗的优良传统,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相结合,具有超迈豪纵,锐意创新的特点。苏诗影响最大的是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

后世评论认为,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的又一家,其诗篇、七言长诗《游金山寺》,波澜壮阔,变化多端,如行云流水,这是在李白之后很少见到的又一佳作。在宋代四川诗坛上活跃着不少流寓或宦游四川的杰出诗人。如南宋“中兴四诗人”的陆游、范成大,均曾入蜀作官游历,他们饱览蜀地风光,巴蜀大地的壮丽山河、名胜古迹、历史文化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由此写下了许多诗篇,陆游还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他们的诗歌创作,为四川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繁荣了四川的诗歌文化。

在词学方面,最负盛名的词人是苏轼。他在词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表现了四川词坛的雄厚实力,而且也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苏轼把古文运动的革新精神带入词的创作中,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词风,创立了豪迈飘逸的风格,成为词家豪放派的开创者,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词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千古绝唱的名篇,最能体现苏词的风格,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6 艺术 在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杂剧,以及石刻等艺术领域的多个方面,五代两宋时期的四川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在绘画上,前后蜀时期四川画坛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据宋人

统计,五代名画家 92 人,其中 30 人在蜀,占了三分之一。四川地区画家云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绘画艺术中心之一。赵德齐是擅长释道人物画的高手,他曾与画家高道兴同画王建生祠和陵庙人物画各百堵。简州道士张素卿,专画道门尊神,绘画技巧熟练,作画敏捷,下笔为神。王建命其在青城山真君殿上作画,其画活灵活现,观者无不惊叹。后蜀成都人张玫,擅长人物肖像画,“尤精于写貌及画妇人”。著有《自汉至唐君臣像》三卷。前后蜀时期四川花鸟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 innovation,涌现出了滕昌祐、刁光胤、黄荃父子、孔嵩等著名花鸟画家。其中,尤以黄荃的成就最大。黄荃,(约 903 ~ 965 年)字要叔,成都人。17 岁时,与其师同事前蜀王衍,后又事孟知祥父子。黄荃画艺全面,选题广泛,善画山水。孟昶时曾奉命与其子会画《青城山图》、《峨眉山图》等作为赠送给南唐的礼物。他尤以画花鸟知名。他首创五代画派中的“钩勒法”,旨趣浓艳。他在孟昶壁上画的六只鹤,神态多异,曲尽其妙,往往引得真鹤站立画旁,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黄荃对中国花鸟画派的形成,以及后代的中国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两宋四川画坛人才济济,有著名画家 70 人,其中北宋 65 人,南宋 5 人。这些画家,大体可分为专业画家和文人画家。从绘画题材看,可大体

分为释道人物画和花鸟山水画两大类。石恪、高文进、孙知微是杰出的释道人物画家。石恪,字子专,五代宋初成都人。他作画的特点是笔墨纵逸,不专规矩,意务新奇。他的画后人评价甚高,说他是“画鬼奇怪,笔画劲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高文进,成都人,工画佛道。后蜀亡后,入开封翰林画院。他先后为京师相国寺、玉清昭应宫作壁画,名噪一进,深受太宗赞赏。他的笔法为当时“翰林画工之宗”。孙知微,字太右,眉州彭山人。善画释道,山水。画法放逸,不蹈前人笔墨畦畛,深得时人称誉。在花鸟画方面,黄荃子居案,字伯鸾,是北宋宫廷画坛的盟主。他在宫中为皇室画了大量珍禽瑞鸟,奇花怪石,深受太祖、太宗赞赏,委之搜访名画,诠定品目。从北宋初年以来,画院以黄氏父子的画法作为准绳,其画艺垄断宫廷画坛几乎达一个世纪之久。剑南人赵昌,师事滕昌祐,以画花鸟名重一时。他的画长于传色,被人誉为“旷代无双”。一生创作丰富,至北宋宣和末,御府尚藏其作品 154 幅。在文人画方面,文同、苏轼既是文人画家,同时又是文人画的倡导者。文同(1018 ~ 1079 年),字与可,梓州永泰(今盐亭)人,进士及第,历任知陵州、知湖州。多才多艺,苏轼称其有诗、辞、书、画四绝。文同以画竹而名天下,其所画墨竹超越前代诸家,并提出“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

中”的见解,对后世影响极大;“胸有成竹”的成语便出自于此。苏轼善画“枯木奇石,时出新意”。他对宋代绘画艺术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文人画的理论。提倡绘画要“神似”,反对片面追求“形似”;提倡“诗画本一律”的见解,要求绘画要画出诗的境界和意境,充满诗情画意。这一理论,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的文人画都有深远的影响。在绘画著作上,江夏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是一部关于四川绘画的专史。它记载了从唐乾元至宋初200年间四川地区著名画家及其作品的情况。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以逸、神、妙、能四格作为对画家进行品评的标准,为研究唐宋绘画艺术的品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书法上,五代时期的书法,承晚唐余风,主要书家都受颜真卿的影响。前后蜀时,四川擅书者不少,但无名家大笔。宋初书坛不振,自四川书法家李建中,才开始有了改观。李建中(945~1013年),字得中,其先京兆人,五代时迁居四川。983年举进士,后官至工部郎中,三掌西京留司,时人称之为李西台。他善书札,行笔尤工,多构新体,对于草、隶、篆、籀、八分等各种书法字体尤精妙。其书法特点是“典重温润,盛德若愚”,他的字帖现仍有多种存世。李建中的书帖,在当时被奉为“楷法”,人多摹习。大书法家苏轼年青时亦曾以李建中为楷模,练

习书法。苏轼是北宋中期四大书法家之首(苏轼、蔡襄、黄庭坚、米芾),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代表了宋代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他能广取博收,集众家之长,自成一派。后人盛赞他的书法“书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藏巧于拙,特为纯古”。他还在书法理论上,主张书法应重视自然情趣,注重创新。

在音乐舞蹈戏剧上,前后蜀编安朝廷,建立了一套雅乐制度,循例制礼作乐,歌功颂德。由于统治者大都喜好声色,讲究享受,朝廷还设置了专管音乐舞蹈的教坊使,蓄养了众多的乐工舞妓,经常在宫中举行宴乐。王建墓中的24幅乐妓图,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宫廷宴乐的情况。从乐器的性质看,这一乐队演奏的是兼有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民间音乐。与雅乐相对的民间音乐—俗乐,前后蜀时广为流行。每年春夏,成都居民多游观花院及锦浦,所到之处,无不歌乐喧天。两宋时期四川官府燕乐和私家妓乐十分兴盛。地方官府每年岁时节令,送往迎来、新官上任、旧官离职,照例要举行宴会。宴会上,都有歌舞音乐表演助兴。蜀中官僚士大夫及商贾富豪,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和爱好,多以蓄养家妓乐工为时尚。而在民间的祭祀活动中,人们多以歌舞相随。四川民间音乐活动,以成都最为繁富。在成都的富春坊、新南市、大西市、金马坊、碧

鸡坊等处,多有秦楼楚馆、茶楼酒肆,每日轻歌曼舞,吹拉弹唱不绝于耳。连佛家圣地大慈寺,也成为市民娱乐的公共场所,足见声乐之盛。五代两宋时期,表演和观看戏剧是人们娱乐活动的内容之一。前后蜀时有专门为帝王宴会或出游演戏的优伶。他们上演各种改编的歌舞“百戏”。宋代四川流行杂戏,有类前代的参军戏,内容以滑稽、讽刺为主。蜀中俳优在杂戏演出中,多能涉猎经史,借古讽今,以资笑谈。南宋时,成都杂戏演员袁三以擅长讥讽而著名。嘉定年间,在一次宴会上,蜀伶教人装扮成孔子及弟子,用《论语》中的言词,对寡廉鲜耻的达官进行了热嘲冷讽,具有很强的斗争性。

在石刻艺术上,前后蜀的石刻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石刻题材以宗教为主,其中又以佛教题材为多数,分布面广,以安岳圆觉洞南面山腰的20余龕和大足北山佛湾的石刻,最具代表性。除宗教内容的石刻外,两蜀时期还有不少反映世俗生活的石刻,其中以王建墓中反映帝王生活的石刻最具代表性。王建墓中石棺床四周24躯乐舞妓浮雕,雕刻精美,在中国古代雕塑中,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宋代四川的雕刻艺术,仍以宗教题材为主,其中又以佛教为盛。据调查,四川共有大小石窟造像约120余处,其中属于宋代制作或间以宋代制作的约半数以

上。宋代四川石窟艺术的杰作,首推大足北山的佛湾、宝顶山的大佛湾。北山佛湾自造像五、六千躯,其中“水月观音像”、“数珠观音像”、“心神东窟”均为宋刻瑰宝。宝顶山石刻以大佛湾的规模最为宏大,全长500米,岩高约15米~30米,造像万余躯,内容衔接,图文并茂。雕刻技法纯熟洗练,艺术风格优美健康,人物形象真实动人,喜怒哀乐情趣万千,造像题材广泛,反映生活内容丰富。大部分石刻造像已经世俗化,突破了宗教教义的刻板规范,具有儒释道合流的社会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很切合人们的观赏习惯和审美要求。这种真实记载当时人们生活面貌的思想感情的雕像,在以前各代石刻造像群中是很少见到的。大足石刻是在我国北方石窟艺术衰落之后,在我国南方兴起的石窟艺术明珠,堪称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7 宗教 五代两宋时期四川的道教和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宗教学说更加充实,宗教内容更加完备而丰富。前后蜀皇帝笃信道教,对道教采取扶持态度,因此这一时期道教在四川又有了是一步的发展。宋朝是继唐朝之后,我国道教又一个大发展时期。真宗和徽宗是宋朝历史上两个最崇信道教的皇帝。由于宋朝皇帝的笃信,这一时期四川许多著名的道士都受到官府的重器。一些道教神仙和宫观亦被

朝廷赐封和赐名。随崇奉道教的士大夫的增加,使道教神仙的思想从出世向入世逐渐转化,于是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新变化。许多出家的著名道士一般都不追求修炼成仙,而是研究道家治国安民之术;而以苏轼为代表的儒家人物,则更是公开主张融合佛道,鼓吹三教合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四川各地出现了道、佛相助的局面,以致在大足石刻造像中产生了三教合龕,合释迦、老君、孔子于一龕,三教平等,同受时人敬奉的现象。这一时期四川道派中,以炼养派和道法派最为盛行。四川炼养派比较活跃,出现了一些全国知名的内丹大师,其中以陈抟最为著名。陈抟淹通三教,多所师法。史称吕洞宾与陈抟同隐华山,传授《无极图》给陈抟。陈抟著有《无极图》等书,系统阐发了内丹理论,

对后来的全真派产生过影响。宋朝建立后,一反前代后周排佛的政策,对佛教实行适当的保护,四川佛教也同样受到礼遇和扶持。五代两宋时期四川佛教寺院遍布各地,宋真宗时全国共有僧尼397万人,四川有56万人,占全国僧尼总数的12.5%,僧尼人数之众可见一般。在佛教各派中,四川主要流行禅宗,禅宗五宗七家多派均有弟子在蜀传法。五代两宋时期,僧侣们四处游学成为一代风尚,许多外籍僧人入蜀讲学或留学,川籍僧人也大量外出求学和讲学。僧侣间游学交流,有利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五代两宋时期四川许多寺院,不仅是传播宗教的地方,而且往往与世俗文化互相渗透影响,成为当时民间文化娱乐和市井商业贸易的场所。

六、元明清时期

(一)元代四川的政局

1 初期 忽必烈于1260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建号立朝后,将秦蜀并于一道,行使对四川地区的管理权。当时四川除成都由密里火者、青居(今南充市南)由乞台不花率兵驻守外,其余地区仍为南宋四川的辖境。元代初期四川的政局,主要是围绕蒙

古军以陕西为基地,不断与南宋争夺对四川的控制展开的。其间有关元初四川政局的重大事件有:

廉希宪、商挺镇秦蜀。廉希宪(1231~1280年),字善甫,畏吾儿人。商挺(1209~1289年),字孟卿,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人。二人曾事潜邸中的忽必烈。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

成立十路宣抚司,派遣宣抚使到中原各地接管权力,廉希宪、商挺被派往京兆,担任秦蜀正、副宣抚使。同年5月,廉希宪矫诏掩捕企图在京兆谋变的刘太平、霍鲁怀及其同党,同时遣将诛密里火者于成都,诛乞台不花于青居。其后,四川泸州发生了震惊蒙、宋朝廷的宋守将刘整举城投降事件,秦蜀行省也能妥善处置,在夺取泸州后,仍以“戢兵为念”,不愿因泸州的事变引起大规模的边衅,造成蒙、宋的新冲突,以免影响蒙朝廷集中力量对付漠北阿里不哥的争位。

赛典赤抚川陕。赛典赤(1211~1279年),回人。成吉思汗西征时,率众迎降,充任宿卫。忽必烈即位后,释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元年(1264年)置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省,出为平章政事。1273年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镇秦蜀行省长达10年,在经略四川地区上多有建树,主要业绩有:1.大力发展屯田;2.安辑新附之民;3.整治道路,设置驿站;4.招谕尚未归附的宋人。1271年,忽必烈派大军攻围襄阳,“撤其捍蔽”。赛典赤奉命水陆进攻嘉定(今乐山市),以牵制四川兵力不得增援襄阳。不久,行省事于兴元,专供粮饷。1273年,赛典赤离蜀赴云南。1275年,元军大举进攻嘉定,南宋守将咎万寿以城降元。嘉定之下,与赛典赤的招降政策的成功分不开。

安西王节制四川。安西王忙哥剌(?~1278年),忽必烈的第三子。至元九年(1272年)封安西王,出镇京兆,分兵驻六盘山,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军民之政。次年,晋封秦王,设立相府,东、西两川行枢密院事由节制。安西王相府在平定四川的过程中,直接供给四川元军军需,帮助协调东西两川行枢密院关系,调遣本部兵出征四川。1279年初,安西王相李德辉在得知合州守将王立请降之约后,单舸至钓鱼城下,呼唤王立出降。王立攀城投降,四川全境归元朝领有。安西王相府在平定巴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中期 元朝代宋后,首先从政治上中断了汉人官僚地主对四川的统治,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效忠朝廷征蜀有功的蒙古、色目军事贵族。中期四川政局基本上围绕着蒙古、色目贵族的专制及其引起的变乱展开的。

在元朝平蜀的过程中,一批效忠轻廷的蒙古、色目军事将领,因为立了战功,故在元朝确立起对四川的统治后,首先便被起用担任各级军政要职。作为四川行省一级的军政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几个与元朝统治者有深厚关系并有显赫战功的蒙古、色目军事贵族世家手中。其中,直至元代中期仍保持着这种特殊权力的世家有:巩昌汪氏(汪古部人,元朝列其为色目人)、纽磷家族(珊竹带人,蒙古的一支)、按

竺迓家族(汪古部人)等等。

掌握四川军政大权的蒙古,色目军事将领,由于长期镇蜀,居功自恃,部曲众多,盘根错节,容易形成自己的势力。加之四川远离朝廷,鞭长莫及,一遇风吹草动,这些世代拥兵的将领之后,便有可能乘机而起,由此造成拥兵自雄的局面。囊加台据蜀称王的事件,便是这一后果的必然表现。

囊加台(又作南加台、囊加歹)(?~1329年),坐镇成都的蒙古都元帅纽璘之孙。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祖孙四代历镇四川”。泰定元年(1324年)以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宣政院使,奉命统兵从四川征参卜郎(今四川理塘北),由是集军、政、教权于一身。1328年,泰定帝出巡上都病死,爆发争夺帝位的“天历之战”。当年十一月,囊加台正式表态不接受大都的朝命,自称镇西王,将持有异议的行省平章宽彻等官员杀害。为了表示与大都朝廷决裂之意,囊加台还“烧毁栈道”,分兵进攻播州(今贵州遵义)和兴元(今陕西汉中)。他见其进攻无路,又遂向东,企图沿汉水东下,直逼襄阳。朝廷调集数省兵力征之,并派员宣谕,曲赦囊加台等罪。1329年,囊加台入京,以“指斥乘舆,坐大不道”的罪名被处死。

3 晚期 明玉珍入蜀,推翻元朝在四川的统治,并建立大夏政权,是元代晚期四川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明玉

珍(1331~1366年),原姓旻,湖北随县人。家世务农,性情刚直,至正十一年(1351年),集乡兵千人屯青山,结栅自固。后参加红巾军,任徐寿辉部下元帅。至正十五年(1355年)统兵万余,溯江而上,到巫峡一带筹粮,满载而归,以战功升奉国上将军统兵都元帅。1357年春,再次率斗船50艘掠粮于川、峡间。时值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右丞哈林秃募兵重庆,与义兵(地主武装)元帅杨汉发生矛盾,欲杀杨汉。杨汉放船下峡,投奔明玉珍,并导引明玉珍举兵进攻重庆。当时,四川已出现“群盗蜂起”的形势,为明玉珍进兵四川奠定了社会基础。故当明玉珍兵船逼进四川时,远近骚动响应。哈林秃出战被擒。完者都率部连夜逃往果州(今南充市)。重庆人民迎接明玉珍义军入城,胜利攻占重庆,给元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接着,明玉珍以重庆为据点,同元朝在四川的残余势力和地主武装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斗争。1361年,明玉珍在嘉定取得决定性胜利,生擒元四川行省官员完者都、郎革歹、赵资等人,由是蜀中郡县相继下,明玉珍尽有川蜀之地。明玉珍入蜀后,于1360年自称陇蜀王,1363年初称帝,定都重庆,建国号大夏,改元天统。

大夏政权存在时间不长,天统四年(1366年)明玉珍病死,子明升即位,改元开熙。明洪武四年(1371年)

明升降明,夏亡,前后共存在了9年。大夏政权和其他红巾军系统一样,建立有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和管军机构。大夏政权分界地为八道,疆域四至,最盛时东至彝陵(今湖北宜昌),西至云南中庆(今昆明),南至播州(今贵州遵义),北至举元(今陕西汉中)。大夏政权在短暂的统治时间里,推行了定赋税“十取其一”的经济政策,铸造“天统通宝”和“天统元宝”两种法定的铜钱;同时实行去释、老教,专奉弥勒法,以及兴办学校,科举取士等政策,使得“蜀人悉便安之”;“一方咸赖山康焉”。明玉珍死后,葬于江水之北。1982年3月,已在重庆江北区上横街工地发掘清理出这一湮没达600多年的睿陵,出土了包括《玄宫之碑》在内一批珍贵文物。明升继位后,大夏政权内部矛盾尖锐,部将互相厮杀。1368年,崛起于东南的朱元璋一统半壁河山,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建元洪武。1371年,朱元璋命大将汤和、傅友德分水陆两路进兵四川。汤和率兵攻克夔州,进逼重庆。明升见大势已去,于六月赍表乞降。接着明军又招降成都,分兵定平川蜀之未附者。十月,“悉定川蜀诸郡县”,四川从此又归于明朝统治。

(二)明代四川的政局

1 初期 明王朝建立后,各地区暂时保留元代行省制度的格局,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大幅度调整辖区,四川辖

区北至广元,与陕西为界;东至巫山,与湖广为界;南至乌撒、东川,与贵州、云南为界;西至威、茂与西番为界。这一辖境对后来四川疆界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朱元璋在明初推行“各安其生”的政策,严惩贪污,澄清吏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所以,洪武、永乐、宣德之际,是明代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四川也不例外。如洪武时,定远(今武胜)知县高斗南与岳池知县王佐因故被逮,由于其下耆民奔走阙下,具列善政以闻。朱元璋还赏赐宝钞遣还,并赐耆民道路费。胡寿安知新繁,经常自种蔬菜一圃,以供日用,人呼为“菜知县”。及满秩去,囊筐罄然,只有书籍布衣而已,他们是当时四川地方官吏清廉的典型。

为了加强和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先后将其子分封到各地为王。1378年,朱元璋第11子朱椿被封为蜀王,建王府于成都。朱椿在成都,为一国之君。王府置相傅官属。亲王岁禄万石,护卫甲士少时3000人,多至19000人。朱椿能以礼教治蜀,被朱元璋誉为“蜀秀才”。据《明史》记载,在蜀献王朱椿的统治下,四川较为安定;“蜀人由此安业,日益殷富”。明初四川政治的清明局面,大约维持了六七十年。随着明中期统治开始走向衰败的道路,蜀王宗室为害一方的后果便日益显现出来。

2 中期 从明英宗到武宗时期,明朝的统治已开始走向衰败的道路。统治上层、宦官擅权,党争纷扰,地方吏治每况愈下。四川不少州县官员大讲排场,奢侈供张,无偿取于民间。土地兼并日益剧烈,成都附近州县“为王府者十七,军屯十二,民田仅十一而已。”沉重的剥削和经常性的水旱天灾,驱使农民流亡道路。发生在四川地区的三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是这一阶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赵铎起义。赵铎,德阳人,其父为县阴阳训术。天顺八年(1464年),因被人诬告通盗,受官府追捕,遂号召起义。自称赵王,以安浩为将军,席评事为谋主,拥众数千人,焚官廨,烧府库,放狱囚,一时声威大振。赵铎实行流动作战,活动于川中各地。明王朝派都督何洪率兵镇压。1465年两军在梓潼朱家河激战,何洪被义军杀死,明军损失严重。但在罗江附近,农民军却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在返回梓潼途中,被明军伏兵所围,赵铎在战斗中遇难,起义失败。赵铎死后,农民军余部继续在川西、川东各地坚持战斗,历时将近一年。

正德川中农民大起义。1488~1521年是明弘治、正德时期,当时朝政混乱,天灾频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与刘六、刘七领导的北方军民大

起义相呼应,在四川地区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正德川中农民大起义,由三支队伍汇合而成:蓝廷瑞、焉本恕起于川东,刘烈起于川北,曹甫、方四起于川南。正德四年(1509年),眉州人刘烈在汉中聚集流民2000人发动起义,活动于汉中、巩昌间,声势日大,后遭失败。刘烈逃逸。营山县人鄢本恕、蓝廷瑞、廖惠率领大宁灶丁、流民聚集刘烈余部继续坚持斗争,拥众10万,活动于川鄂边区。蓝廷瑞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下设48总管。1510年,蓝、鄢率义军攻入夔州、重庆、何宁诸府境内,“两川大震”。明朝统治者调集四省官军会剿,起义军遭致失败,蓝、鄢被杀害。1511年,川南爆发曹甫、方四领导的农民起义,坚持在川、黔边区坚持斗争。廖惠在蓝、鄢牺牲后,率余部突围,后与方四所部会合,转战于川东、川中之间。1512年,廖惠牺牲,余部继续转战川陕边区,起义终告失败。正德川中农民大起义持续6年之久,给明王朝统治政权以沉重打击,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蔡伯贯起义。蔡伯贯,大足人,与富顺黄一元等传习白莲教。嘉靖四十四年底(1566年初),借传播白莲教组织群众,发动起义,建号“大唐”,改元

“大宝”。一月内即攻破合州、大足、铜梁、荣昌、安居、定远、璧山等地,影响极大。很快遭到四川巡抚刘自强的镇压,蔡伯贯被俘遇害,起义历时36日终告失败。蔡伯贯失败,四川各地仍有白莲教领导的零星起义发生。

3 晚期 明朝晚期,四川地区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四川人民在重重压迫下,过着痛苦的生活。从而导致民变、兵变和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其中,主要的事件有:

“除五蠹”斗争。“五蠹”是指明朝晚期危害四川百姓的五种地方势力;一曰衙蠹(指州县吏胥);二曰府蠹(指投献王府,武断乡曲者);三曰豪蠹(指土豪劣绅);四曰宦蠹(指缙绅义男,借主子权势作威作福者);五曰学蠹(指生员中好事生非者)。崇祯十四年(1641年),彭县百姓“集众入县”,发动民变,反抗官府。接着成都府属和上川南各州闻风而动,仅雅安一地百姓,即聚众进城,拆毁衙役房屋,打死蠹役数十人。于是,民变迅速扩展为以除“五蠹”为内容的群众性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打击对象非常广泛,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士兵哗变。1576年,泸州府建武所发生兵变,“哗起汹汹”。1600年,前往綦江的官军哗变。1642年,松潘边兵数万人以索饷哗变。农民起义不断。天启二年(1622年),四川白莲教首领洪众、刘应选、白仙台等公开发动

起义。广安白莲教首领何朝敬率众于1627年“造反攻城”。1634年,摇天动、黄龙率领民众在川东、川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这支起义军被称为“摇黄军”,有众十万人,攻城劫寨,给四川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张献忠农民军入川作战。

张献忠入蜀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1606~1646年),字秉吾,号敬轩,人称之为“黄虎”。陕西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人。家庭贫苦,从小受地主的迫害,后来当过捕快、边兵。因不堪官长压迫,于崇祯三年(1630年)率领米脂十八寨农民发动起义,绰号“八大王”。改营曰“西”,号“西营八大王”。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的斗争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1)从1630~1635年的十三家七十二营的荥阳大会,是大西农民军兴起时期;(2)从荥阳大会到1638年张献忠谷城假降,是大西农民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发展时期;(3)从1639年的谷城起义到1643年武昌大西政权的建立,是大西军的成熟时期;(4)从武昌政权建立到入川作战,建立大西政权,直至1646年张献忠牺牲,是张献忠农民起义的由盛而衰时期。

张献忠曾先后五次入川作战,在四川有相当的群众基础。1639年张献忠再起谷城后,率部由鄂西和陕东南第四次入川,先后转战于达州、泸州、剑州、广元等地。1644年初,张献

忠由湖广第五次进入四川,号称60万人,溯江而上,于六月攻克重庆,八月攻克成都。明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结束了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接着,张献忠于十一月在成都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建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自称西王(亦说称秦王)。大西政权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央机构,设有左、右丞相、六部和京畿道御史、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等官职。大西政权严厉镇压朱室宗藩及反抗大西政权的僧道,对降官分授以职,开科取士,鼓铸“大顺通宝”,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颁布禁约,不准军队扰害地方。但由于打击面过宽,镇压过头,树敌太多,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为其后的失败留下隐患。1646年,清军逼进四川,张献忠集中部队前往川北抗清。四川的一些官僚、地主武装暗地勾结清军,企图夹击大西军。正值抗清紧要关头,大西军驻守川北朝天关的将领刘进忠叛降,使清军得以直入西充张献忠的驻地。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突遭清军袭击,中箭逝世,时年仅41岁。张献忠建立的大西农民政权,在四川存在了两年。

(三)清代四川的政局

1 前期 清王朝是以满族上层为主体的,继蒙古族的元王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由于清王朝是从农民起义军手中夺取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来的,所

以它的初期就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矛盾。在清代前期,四川就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混乱时期。发生在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有:

清朝平定四川。清军虽于顺治三年(1646年)进入四川,打败张献忠大西农民军,但四川仍由坚持抗清的大西军余部和据地自雄的残明武装所控制。因此,清朝的四川政权机构只能以保宁(今阆中)为据点,并逐渐向全川发展。清军平定四川的过程,首先是控制川西北,然后才深入到川东南。清军在与大西军和残明武装的争夺中,于1652年派吴三桂部进驻成都,1657年破嘉定,次年攻占重庆、开州。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巡抚高明瞻率军占领成都。这一年,大西军孙可望部降清,残明武装相继被歼,全蜀大部被清军所控制。1664年(康熙三年)继续坚持抗清斗争的夔东十三家也最后失败。到这个时期,四川的社会政治局势才全面转入正常状态。康熙四年(1665年),设在保宁的四川军政机构全部迁入成都,这才开始清王朝对四川的正常统治。

平定吴三桂叛乱。吴三桂(1611~1678年),字长伯,江南高邮人。曾任明锦州总兵。1644年在山海关降清,导引清军追歼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从陕西入川以来,一直受到清王朝的信任,晋封为“平西亲王”。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进入云

南,受到清王朝的“殊恩礼遇”,羽翼丰满,势力及于川、滇、黔三省。康熙十二年(1637年)冬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分兵进攻湖南和四川。在四川战场上,吴军三万由建昌、越西北犯,经荥经、雅州进围成都,一时“全川悉陷”。清军被迫退守陕西西安一线,形势十分严重。从1676年开始,康熙命图海率军在西线开展反击,大败吴军于平凉。吴三桂被迫转入湖南作战。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改元昭武,不久即病死于衡州。从1679年开始,清军两路出师,从陕南攻四川。1680年,陕西提督赵良栋率军抵达成都,吴军巡抚张文德率文武官员200余迎降。与此同时,湖广提督徐治都率水师直取夔、巫、万县等地,一时四川尽复。不久,吴军倾全力逼犯四川。1681年,吴军攻占叙州,西线清军全面溃败,四川重落吴军之手。康熙迅即改变方略,组建川陕总督统一领导两省清军进行反攻,相继在荥经、黎州一线大败吴军主力,并乘胜追击,进至昆明。吴军势穷,城中食尽援绝,吴军投降,吴三桂孙吴世璠自杀。在四川的吴军残余很快被消灭。吴三桂叛乱,波及四川全省,持续8年之久。这次叛乱的平定,使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并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条件。

2 中期 清代中期,四川地区土地

兼并日烈,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乾隆、嘉庆之交,四川地方官员贪污勒索成风,压迫剥削十分严重。发生在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就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

白莲教是一种民间秘密宗教,始于南宋,在元、明时期即已在四川活跃。曾多次号召和发动过武装起义,因遭受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多采取隐秘方式活动。内部支派很多,互不统属。四川白莲教活动的特点,主要是秘密性,反清性,分散性,迷信性和广泛性。主要成分为棚民、贫苦农民、失业流民,以及游民组织嚙嚙子等等。嘉庆元年(1796年),以徐添德为首的白莲教发动武装起义,同时起义的还有东乡(今宣汉)白莲教首领王三槐、冷天禄等。这两支队伍“楚、陕籍居三之二”,他们素习战斗,令进剿的官军穷于应付。1796年首战东乡告捷,杀清军总兵袁国璜等。1797年攻占东乡县城,声势浩大,拥众达数万,实现川楚白莲教在东乡大会师。此后,义军分兵转战于四川东、西、南、北各地,令官军围剿三年无功。至嘉庆三年(1798年)夏至1799年春,义军接连遭受重大挫折,王三槐、冷天禄等领袖不幸被捕和战死,斗争暂时转入低潮。义军只得进入老林地区,分散作战,避免同清军主力正面接触。嘉庆五年(1800年)义军实行战略转移,抢渡嘉陵江西进,在苍溪和江油马蹄岗

与清军发生激战,双方损失严重。义军首领冉天元受伤遇害,失去指挥,结果转胜为败。此后清朝采取“坚壁清野”、步步为营策略,迫使义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嘉庆六年(1801年),达州义军首领徐添德在作战中牺牲,损失很大。各支义军余部集中于川楚交界的夔巫老林隐蔽休整。嘉庆七年(1802年)整个局势十分不利,义军中首领人物相继战死或被俘。到年底,只剩下一些零星余部在坚持抵抗。至嘉庆十年(1805年)夏,义军首领王世贵战死,白莲教在四川的起义才告结束。白莲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和虚弱的本质。从此,清朝的国运开始急剧衰落。

(四)元明清时期四川的经济

元明清时期,我国的大一统局面得以形成和巩固。在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统一格局之下,四川盆地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其在全国的政治地位明显地下降了。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经历了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社会经济遭受很大的破坏。由于四川盆地经济系统受群山环锁的制约和“地狭人伙”的限制,经贸交流有限。所以,在经历这两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之后,总的说来,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不仅再也未达到过去时代的繁盛局面,与当时稳定状态的东南沿海地区比较也相差甚远。

在农业方面,元明清三代王朝在统治四川之初,都面临田土严重荒芜,亟待开垦的局面。元朝统治者不得不把过去仅在战争中实行的屯田办法,普遍加以推广。元代四川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其户数在全国的地位是:民屯列第3位;军屯户占全国总屯田户数的38.15%,居第8位。民户屯田大多集中在交通要道而又有荒地沃土可供开垦之处。军屯则集中在川西平原,沿嘉陵江中下游和长江沿岸及岷江下游一带。相比之下,沱江一线则未设屯开垦,表明元代土地开垦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明初四川荒地甚多,多发配犯人进行开垦。在经过50年的垦殖活动后,由于大量的外省移民和土著人户的辛勤开垦,四川的耕地状况才得以迅速改善。据《明会典》、正德《四川志》统计,四川在正德年间的耕地总数大约在11万顷,至万历又骤增额田数近3万顷。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政府为了迅速恢复发展生产,一方面大力鼓励湖广等省人民入川开垦,一方面又在四川推行军屯、民屯,以扩耕地面积。康熙朝四川耕地面积在1万~2万顷之间。耕地面积大幅度上升,发生在雍正朝,雍正二年(1724年)四川耕地21万顷,雍正六年(1728年)跃增至43万顷。自此以后,直至嘉庆末(1820年),四川耕地即转入缓慢的增长过程。

土地的开垦与人口的增长密不可分。元代是继南北朝之后四川人口又一次呈大幅度下降趋势的时期。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平定四川后公布的在籍人口统计数字是:“四川民仅十二万户”。元代中后期,全国出现短暂的安定局面,户口开始呈增长趋势。据至元四年(1338年)监察御史报告,襄、汉一带流民入川“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较之于元初,这时四川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是十分惊人的。明初四川户口显著下降。洪武五年(1372年),户部奏四川民只有84万户。较之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的12万户,又下降了30%。从明初开始,由于外省移民,特别是来自湖广的移民的迁入,四川户口数有了较大的增长。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有户214900,口1464515,较之洪武五年(1372年)猛增了19倍。整个明代,四川地区除正德时有所下降外,其余时间均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至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有户262694,口3102073。明末清初是继宋末元初之后四川遭受长期战乱,因而人口再度锐减的时期。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四川第一次清理户籍,全省仅有丁16096人。如按一丁五口计,总人口才80480人。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万历六年(1578年)的6.1%。面对四

川人口的大量锐减,为了恢复经济,增加赋税收入,清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旨在增加人口的应急措施。在从顺治末年(1661年)到雍正五年(1727年),在清统治者的特许下,四川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大移民活动。这次移民活动,即四川地区广泛流传的“湖广填四川”。由于这次移民活动自始至终得到政权的支持鼓励和组织提倡,所以延续时间长、规模大。在经过前后延续60多年的大移民后,四川人口增长持续不断,至雍正二年(1724年),四川人口数为2,046,555,占全国人口的8%。其后,经过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大增长,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川人口达2100多万,道光二十年(1840年)突破38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9.3%。这一增长趋势,使四川人口总量跃居前列。自此之后,直到今天四川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的比例。经过这次大移民活动,来自外省的人数超过了四川本土的居民人数。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了。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间,四川人均占有耕地约18亩。到嘉庆时期(1796~1810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只有2亩。至道光年间(1821~1850年)更下降到人均1亩多。

元明清三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

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元顺帝至元元年(1336年),命四川廉访司事吉当普,领导修筑都江堰工程,使6州12县之民受益,是都江堰水利史上的一次重大举措。其中,在渠首鱼嘴修筑利民台,在水流最湍急处铸铁龟1个,重8000公斤,贯以铁柱,以杀减水势,均属首创。元人揭傒斯为之撰写的《大元敕赐修堰碑》,保存了这一工程修建的详尽资料,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明代对于都江堰的跨县水利工程,设立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由添设的四川按察司僉事一员,总理堰务,制定管理办法,协调各县用水矛盾。乾隆朝四川总督阿尔泰对都江堰采取了深淘堰底,另开支河,上游蓄水三项治理措施。道光成都水利同知强望泰,根据自己的治水经验,创造性地解释了“深淘滩,低作堰”的治理原则。都江堰水利资源的分配,岁修工程的进行,在清代已形成制度,纳入地方官员的日常管理之中。在清代四川水利建设中,出现了许多值得称道的水利专家。如康熙四川巡抚抗爱撰写的《复浚离堆碑》,雍正四川巡抚宪德撰写的《都江堰酌派夫价疏》,乾隆德阳知县阙昌言所著的《作堰蓄水说》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治水著作,是当时四川水利建设经验的总结,对推动四川水利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明清时期,四川地区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增多,播种面扩大,产量有所提高。据元人郭翼《雪履斋笔记》记载,四川峨眉县在元代“谷品甚繁,他处罕闻其名”。经他偶录下的名称,多达25种。明代水稻播种面积进一步扩大,已开始丘陵和山区播种水稻。到了清代,水稻已遍及四川平原,丘陵和山区,品种可分为粳稻、籼稻、糯稻三种。明代四川地区的小麦生产有所发展,至清代已普遍种植小春作物,以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一般作法是在当年水稻收获后,即接种豆麦。元明清时期,一些新的粮食作物传入四川,并成为农家的主要食粮。玉米自明代传入我国,至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才开始传入四川。红薯是在清乾隆初年传入四川的,当时主要产区在川西成都、双流等地。马铃薯在嘉、道时期四川周围的丘陵和高山已较普遍种植。以上三种作物“古书不载”,自清代始渐有此物,“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在经济作物方面,传统的茶叶衰落,但自元代起,棉花已传至四川长江沿线州县,到了明代,全川各地已普遍种植棉花。洪武十六年,明王朝赏赐四川等卫军士的棉花多达18万斤,棉布多达94万匹,显示了当时四川棉花生产的水平。到乾隆中期,植棉业

已遍及四川各州、县。据统计,清代四川种棉州县达 103 个,占全省州、县总数的 80%。从清初开始,四川种植烟草,以川西地区为主。至乾隆时,什邡的晒烟已成为全国的名烟,并有相当数量外销。甘蔗的种植在经历元代的衰落阶段后,明代开始兴盛起来。明末清初四川蔗糖生产破坏殆尽。至康熙十年(1671 年),由于福建汀州商人的引种,甘蔗生产推广至沱江流域各县,进而代替了明以前的涪江流域产区。到了道光时期,四川的种蔗范围已及 21 个州县。其中尤以内江、资中、资阳等地发展最快,产量最多;其次为犍为、南溪等县。

在手工业方面,元明清时期四川的纺织业,由于受战争和动乱的破坏,以及官营工匠制度的束缚,已不可能恢复到宋代的繁荣地位。传统的蜀锦生产,工艺性很强,不可能大量生产,主要供皇室和贵族享受。在元朝皇宫和赠送高丽国王的礼品中,蜀锦仍是上品。在元朝染工所制作的丝织品中,最有名的就是“蜀缬”,即四川的扎染。重庆明玉珍墓中,出土了一大批纺织品,反映了当时丝织技术仍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这一时期四川纺织业的发展趋势是,棉、麻制品大幅度发展,并迅速进入商品市场。在明代,四川民间已产生专门从事棉织的机匠,开始摆脱“男耕女织”的传统生产方式。到了清代乾隆中、后期,四川农村

纺纱织布之风日渐兴盛。四川的棉布织品,不仅自给有余,而且还由商贩远销至滇、黔等地。清代四川织棉技术不断改进提高,各地已普遍使用由湖北传入的 16 寸轧机;弹花也由明代的坐姿改为立姿。此外,专门的《种桑法》、《种蚕法》等技术资料的推广,也促进了四川纺织业的进步。盐业在元代普遍衰落,全省仅有盐场 12 处,盐井 95 眼。加之统治者实行官府直接经营,不许民间插手,以致经营不善,灶户逃亡,盐井废坏,弄得“四川军民多食解盐”(山西解州盐)。明代盐业产销,仍然掌握在官府手中。明初四川共有盐井 1456 眼。随着户口的增加,盐井数目也不断扩大,但必须经中央主管部门审批。明嘉靖间(1539 ~ 1554 年)已出现自流井的名称,到了清代,这一地区便逐渐发展成为四川盐业的中心。在明代盐业中,已开始出现众人集资,以营利为目的而开凿的私井。私人井灶的数量在当时虽不会很大,但它却标志着四川井盐业在突破封建国家和封建自然经济的双重桎梏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四川钻井技术和井盐生产技术又有了显著提高。使四川的井盐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清代四川盐业在恢复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蓬溪、射洪;南部、阆中;嘉定、犍为;富顺、荣县和云阳等 5 个大盐产区。由于盐井开凿的难易程度不同、燃料的

供给情况的差异,射蓬、犍嘉、富荣盐场先后成为川盐生产的三个主产区。盐的运销制度集历代运销制度大成,实行严格的“专商引岸制度”。从这时开始,计岸、边岸、楚岸和水引、陆引的运销区域和运销形式逐渐推行开来。这一时期又是四川名酒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据专家考察认定,泸州老窖建成的时间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由此奠定了1915年荣获巴拿马金奖这一“三百年老窖”名酒的基础。在宜宾,明代出现了酿酒的专业作坊——“糟坊”,当时比较有名气的糟坊是“温德丰”、“德盛福”。至清代,四川名酒及酿造工艺进一步走向成熟阶段。有历史传统的名酒在清代得以继承下来,扩大了生产,一些新酒亦相继产生。清代四川的名酒,主要有绵竹大曲、泸州大曲、全兴大曲。此外,如杂粮酒、渝酒、咂酒等,在清代均较有名。四川造纸业在清代较为发达。夹江、绵竹和巴山老林是主要的造纸产区。其中,绵竹纸,由于绵竹年画印刷的需求量较大,故生产规模和数量都较有名。除满足本省所需外,绵竹纸还销往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湖广等省。雕刻印刷业在清代较为繁荣。乾嘉时期,刻印书籍的书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外省的刻书技术和经验,随着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省人的大量徙入,也传到了四川,更促进了刻书业的兴旺发达。在四川刻书业发展的

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成都帮、岳池帮、重庆帮、绵竹帮四大帮口;按刻书性质,又产生了官刻、学刻、寺刻、私刻和商刻等分工,在实践中还形成了包括备料、写版、画版、校对、清版、贴样、刻版、打样、校对、付印十项复杂的工艺流程。除雕版印刷外,清代四川也广泛使用活字印刷。在清代四川印刷的书籍中,李调元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刻印的《函海》,全书共582卷,收采遗书300余种,是难得的大部头丛书。另外,从清初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全省共刻地方志306种,这些都是四川雕刻印刷和刻字技术进步的见证。在清代前期四川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出现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清代四川手工业大体上可以分为家庭手工业、作坊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种类型。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在工场手工业中表现较为明显。资本主义因素在棉纺织业、制糖业、制烟业、矿业和井盐业中都有所萌芽,而其中尤以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表现得非常鲜明。

在商业方面,元代四川商业总体说水平很低,四川全省商税不仅与江浙相去甚远,即与江西、湖广相较亦不能及,甚至还不如晋宁一路的税额。明初四川商业很不景气,宣德年间开始有了显著变化。当时明朝对全国33个府州县的“市镇店肆门摊税课”

按旧额提高五倍,其中四川便包括成都、重庆、泸州三处。此后,从总体看,四川商业的发展状况一直比较平稳。四川物产丰富,投入市场交换的商品,除蚕丝、木材外,还有药材、蔗糖、粮食、盐、茶等等。这些都是对外地客商很有吸引力的有名的商品。在清代,随着四川人口的剧增,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在乾隆年间连年丰收。除自给有余外,也大量调运出川,成为商品交易的品种。据统计,从雍正四年(1726年)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川粮外运包括今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直隶、河南、山东、陕西、甘肃、青海、西藏、云南、贵州在内的16个省区,年输米高达30万石。此外,成为商品交易的经济作物还有:蚕丝、棉花、麻、烟、茶、甘蔗、染料、桐油、水果、花卉、木材、药材等。随着以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农业在四川很多地方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四川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为区域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清代前期,四川农村场镇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商品交换之活跃,都是前所未有的。大部分场镇皆形成市期,定期交易,三日一场。还有被称为“川流不息”的“香会”,这种香会活动领域往往还要跨越更多的县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场镇逐渐形

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如綦江的扶欢坝以蚕丝贸易为主,江油中坝以药材为大宗,中坝由此成为四川著名的场镇之一,客商云集,远近闻名,人皆呼为“小成都”。而原来经济比较发达的州县,这时则自然成为地方市场的活动中心。如云阳、巫山形成为省内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经济交往的前哨,而江津、綦江又因地处重庆外围,所以它们皆以集散商品的功能而显得非常繁荣。重庆是清代四川最大的商业城市。乾隆时巴县有场镇120个,城关大小街巷240余道,市廛店铺鳞次栉比,地方文献称其为“三江总汇,水陆通衢,商贾云屯,百物萃聚”。可供交易的商品:昭文则有丹漆旄羽,制器则有皮革骨角,取材则有楠梓竹箭,利用则有鱼盐旃裘、漆丝絺纻,若铜、若锡、若铁、若怪石、若金玉器玩,佳果香茗。或贩自剑南、西川、番藏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区域市场的活动中心。此外,重庆又是川盐济楚的必经之地,也是西南最大的粮食集散市场。尽管四川地区市场的发展程度比不上江浙一带,但是城乡市场的结合,同样为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创造了最基本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

在交通方面,元明清时期四川基

本沿袭前代交通的布局,但因时代的不同,在线路上又有了新的变化。元代四川全省共有陆站 48 处,水站 84 处,水上交通范围更加广泛。水上交通线路大致分为川江、岷江、汉江、清江、乌江、横江六条水上路线。随着元代云南政治、经济中心由大理东移中庆(今昆明市),这一时期四川通往云南的线路不是象以往那样走清溪道,而是向南经黎溪,姜驿,从今江边渡口,经元谋县入云南。在陆上交通上,元朝向少数民族地区延伸,相继整修了成都经乌蒙至云南和湖广的驿路,以及发兵“开土蕃道”等等。明代四川全省有水马驿 141 处,递运所 14 处,各重要府州县以及边地马湖、龙安、永宁、松潘、建昌、播州等地皆有驿路可通。永宁宣慰司辖地,水道有百九十滩,其中江门大滩等 82 处,皆石塞其流,故航行多险阻。洪武二十四年(1392 年),明朝廷派遣曹震专程入川进行治理。这是明代四川规模最大的交通建设工程。清代四川驿站,沿袭明制,雍正、乾隆朝四川驿站进一步得到加强。随着四川经济的发展,驿递的频繁,道路的整修亦受到地方官员的重视。在川陕驿道上,清廷曾于乾隆年间两次拨款进行维修栈道。另外还组织川滇两省力量,对金沙江通川河道进行大规模整修。从此,四川商船可直达金沙江上游的滥田坝等处,在沟通四川益地与川西同少数民族地

区的经济、文化交往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五)元明清时期四川的少数民族
元明清时期,四川少数民族的分布地区变动不大,一直沿袭至近代,在此期间,只有几个少数民族迁入川境,人数较少。这一时期,元明清王朝改变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土司制作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的一种政策形式,发端于元代,而首先在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民族地区推行。明朝“踵元故事”继续推行土司制度,并使之“大为恢拓”。清朝从雍正初开始,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从此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归由中央王朝任命的州县流官进行统治。随着统治政策的改变,由此激发了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引起了一系列的民族冲突和斗争。

岷江上游的羌族,在元朝土司制下,归宣政院所隶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设松潘、宕、叠、威、茂等处军民安抚司以治之。明朝承袭这一制度,设军民指挥使司、安抚司,下辖千户所、长官司以治之。清朝在这一地区继续设安抚司、长官司、巡检司加以统治。在元明清羌人土司区内,聚居着以羌人为主的各种民族。岷江上游羌人的社会风俗习惯,与前代相差不多,经济生活与前代无异。适宜农耕的地方,以耕稼为主,兼营牧业;“春耕秋获,一如内地”。而在有些“不产五

谷不养蚕桑”的地方,则以耕种卫所屯田为主。这一时期羌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羌区交通道路通畅,与内地的盐茶贸易得以正常进行。汶川、茂州、保县(今理县)等,已由纯粹的军事政治要镇,进而成为各族物资交流集散的经济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羌区的文化教育得以开展,汉羌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明初以来,茂州等地开始设立州学,羌区各地相继建文庙,设学校,改变了过去“不习《诗》《书》”的风尚,出现了“渐染声教,习尚衣冠”的局面,以至“彬彬有齐鲁之风”。大量佛教、道教寺院的兴建,对羌人原有的宗教信仰、甚至传统节日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羌汉民间进一步友好相处,为共同开发羌区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羌区基本上是封建领主制。羌族内部阶级斗争此起彼伏,羌民的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土司制。到雍正年间(1723~1735年),废除世袭的土司制,代之以封建王朝的州县流官直接统治的“改土归流”,已成必然的历史趋势。

四川西北部的藏族,在元代主要聚居在两个区域:一是松潘地区,约当今阿坝藏区;另一是朵甘地区,约当今甘孜藏区。这两个区域的藏族,在元朝归吐蕃宣慰司管辖。明朝分设松潘

都司、朵甘都司,以及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董卜韩胡宣慰司进行统治。清朝前期沿用明制,先后在这两区内加封了许多藏族土司,其主要的有:明正宣抚司、瞻对安抚司、绰司甲安抚司、巴里两塘正副宣抚司、德格宣抚司、梭磨宣抚司、金川安抚司等。四川西北部的藏族部落,聚居在水草丰茂的“草地”的,以畜牧为主。聚居在山坡河谷地带的,则主要从事农耕,兼营少数牧畜。作物以青稞为主,小麦次之。位于大渡河畔的番民,则“专务贸易,碛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贍其地”。四川西北部藏区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元明清王朝充分利用他们的宗教信仰,尊崇喇嘛教,用喇嘛教笼络民心。在清朝统治者加封的藏族喇嘛教中黄教的最高首领——达赖喇嘛中,有四个出生在甘孜藏区。在统一的中央王朝的管辖下,元明清时期四川藏区同汉族的联系更加密切了,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统的茶马互市,在这一时期更为发展。特别是川、藏交界的朵甘思一带,汉族与藏族人民的贸易自相往来,不受限制。碛门、黎州等传统番汉互市交易兴旺发达。除民间贸易和官方组织的茶马交易外,藏区土司头人和上层喇嘛还以朝贡的方式至内地贸易。元明清时期朝贡人员络绎不绝,沿途出售

藏区土特产品,换取汉地的各种农副产品、手工艺品。在汉藏交流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一批又一批的汉民进入康区,他们带来了汉区的生产技术与藏族人民一道,为共同开发四川藏区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四川藏区在文化上有很大进步,汉族的学术思想进一步传入藏区并产生很大影响。在明朝,松州开始设立儒学,龙安府(今平武)出现“送子读收,习学汉语”的现象,天全六番招讨司派子弟入国学读书。随着木刻印刷术和纸张的传入藏区,大大便利了多种藏文佛经及其文学艺术作品的流传。雍正年间德格印经院刻成《甘珠尔》、《丹珠尔》等佛学丛书,奠定了作为近代康区文化重心之一的印经院的基础。在清王朝推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发生在大小金川的叛乱事件,不仅是四川藏区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清代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大、小金川,位于四川西北部,是藏族定居地区。明隶杂谷安抚司,康熙时土司嘉勒巴内附,雍正元年(1723年)其孙莎罗奔授为金川安抚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从乾隆元年(1736年)开始,莎罗奔自恃势力强大,一再侵掠邻近土司,扩大地盘,先后夺取小金川印信,并攻占明正土司;“意欲并吞诸番”。莎罗奔甚至公开进行武装挑衅,杀伤清朝官兵。乾隆不得不调兵征讨,方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初告平

息。不久,接替莎罗奔为土司的郎卡,又自恃金川地广人众,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发动武装叛乱。清军出兵征讨,累遭挫败。在1772年进攻小金川的战斗中,清军3000人入墨龚沟,全军陷殁。清军改变方略再次集中兵力进剿,最后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攻下大金川土司的中心之一——勒乌围。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出寨投降,历时五年,费帑银7000万两的平定大小金川叛乱的战争,至此终告平息。接着清朝在该地设美诺厅(后改懋功县)、阿尔古厅,直接由四川省统辖。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雍正以来四川地区改土归流的成果,推动了改土归流的继续进行。

凉山地区的彝族,在元朝统称之为罗罗斯。元朝在这一地区推行土官制度,建置罗罗斯宣慰司进行统治。明朝在这里设有5卫、8所、5长官司。清朝继续任用土酋,设置土司。彝族的族源十分复杂,分布的范围很广。元明清时期彝族遍布云、贵、川三省,在四川则集中在大凉山一带。元代彝族是凉山地区的多数居民,他们居住在安宁河一线的城镇和坝区。明初大量汉、回卫军进入凉山后,平坝沃土被卫军占领,彝族迫于政治、军事压力,不得不搬上山坡,分散耕种贫瘠的土地,以致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元明清时期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元朝除了在罗

罗斯地区驻军、修筑道路外,还于会通、建昌、会川、德昌建立军民屯田,使封建生产关系随着屯田租种而得以推行。明代在建昌地区普遍建立卫所,开设军民屯,安置卫军 59000 多户。随着大量卫军迁入凉山,不断扩大土地耕种面积,输入内地的生产技术,这一地区的农业、制盐、冶矿、伐木等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建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变,在城镇和设屯地区已出现封建租佃关系。尽管如此,但是凉山彝族的腹心地区,直至近代都还保存着奴隶制的社会形态。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融合的趋势日渐加快。汉族儒学文化在凉山地区的影响日渐增加,至明初已有彝族子弟在南京的国子监读书,彝族地区也创设学校供贵族子弟受业。在元朝统治时期罗罗斯地区曾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至元十五年(1278年)定昌路总管纳谷起兵反抗元朝政府“毁桥梁,取仓粟,夺驿马及屯田牛”,声势十分浩大,一度与千户阿夷谋率众渡不思鲁河(金沙江),影响反抗的各土酋也多凭险拒守,立寨自保。由于建都地多产金,元朝置冶,令旁近民炼之以输官。不堪忍受元朝剥削压迫的产金户,也多举兵响应。元朝调集各路军兵加以镇压,至 1279 年才把纳谷擒杀。

蒙古人、回人和满人,随着蒙古、女真的崛起并统治全国,也随其兵力

遍及全国各地,四川也不例外。元朝在进兵四川,及其在四川统治崩溃后,相传有部分蒙古人留居四川。明代,也留下一些境外蒙古人入居四川的踪迹。明末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南下青海,率兵攻入康区,由于这一次历史进军,在今阿坝、甘孜州境内,留下了不少称为“霍尔”的部落后裔。现今在四川内地居住的蒙古人,则主要是清代八旗军中的蒙古后裔。清兵入关后,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设满州驻防成都八旗,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蒙古官兵,随满族官兵集中驻在一起。满人移居四川,始于清初。在康熙六十二年(1722年)所设 1600 名驻防成都八旗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满族官兵,与蒙古人集中成都的少城之内。此后,陆续送入旗兵眷属,共有 3000 余满族人在成都居住。回族的先民大批进入四川始于元明两代,兴盛于清代。在元代,回人是通过西北路进入四川的。随着蒙古的大举进兵四川,以及到各地去征战,屯田和守戍,军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官兵相继来到四川,并在各地居住下来。明朝灭元时,又有一批来自甘陕和江南的回人随明军来川,定居于用兵较多的川北和凉山等地。其后,又陆续有外省回民进入成都、重庆等地居住。明末张献忠带领农民起义军入川作战,其中有不少回族士兵。后来大西军抗清失败,也有一部分回民留在四川长期定居。清

初,特别是康、乾之际,更有较多的回民进入四川,除随军士兵外,还有入川开垦或经商的,他们大多分布在成都、重庆、宜宾等通都大邑及多州、县城乡。

此外,这一时期四川境内还分布着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土家族居住于四川东南,与湖北、湖南、贵州三省交界。苗族大约在唐末宋初已开始由黔西北进入川南地区,宋、元以来,先后散居于僚、彝、汉等民族之间,直到明代万历年间都掌蛮反抗和天启初年奢崇明叛乱被平定后,由于僚族和彝族的影响削弱,它才在明末逐渐成为川南地区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明清以来,苗族地区多在土司统治之下,直到改土归流后,这一地区才逐渐由封建领主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转变。金沙江上游的四川纳西族,原为明代云南丽江府通安州的百姓,属木氏土司管理,后因随木土司用兵,离开丽江而迁居四川,时间大约在明万历后期至清康熙之际。僰僰族,即唐代的两姓蛮,属乌蛮、白蛮之种。明清之际分散从云南迁居四川渡口、米易、德昌一带居住。布依族分布在四川宁南、会东、木里、普格等县,他们多是在清嘉庆初年由贵州迁来凉山的。四川壮族历史较短,他们是在嘉庆初年由贵州经云南迁来凉山,与布依族一起聚居。傣族原居于云南,其中一部分是明代被征入川作战,另一部分是清代从云南景

东等地逃荒来到四川垦荒定居。四川傣族主要分布于会理、盐边和渡口市郊区。

这一时期四川少数民族史上发生了两件影响较大的事件,一是万历年间的都掌蛮反抗和万历天启年间的杨应龙与奢安之乱。

都掌蛮是古代活动于今川中南部兴文、珙县一带的少数民族部落,本僚人后裔。明代居住于高、珙、筠、戎、马湖等地。明王朝较早对这一地区改土归流,并加强军事控制。成化元年(1465年),都御史汪浩等人以授官为名,诱杀都掌各寨首领270余人,激起都掌蛮的大规模反抗。明王朝调集四川、贵州军队进行镇压,遭到都掌蛮的顽强抵抗。成化三年(1467年)明军从三路进攻,纵火烧毁村寨和粮仓数千处,屠杀数千人,暂时将都掌蛮反抗镇压下去。隆庆末,都掌蛮首领阿大、阿二、方三等在建武所以东的九丝山再次发动起义。明朝调集14万大军镇压,众寡不敌,阿大、阿二、方三等首领被俘遇害,先后被明军屠杀的都掌蛮达7000人。万历以后,都掌蛮便不复见于记载了。

杨应龙叛乱是明代四川土司反明叛乱之一。万历十九年(1519年),四川播州(今贵州遵义)土司杨应龙,因改土归流威胁他的统治,趁明王朝与后金(清)战争之机,举兵叛乱。历时10年,流劫川、黔、湖广等地。明王朝

初期以抚为主,多次妥协。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杨又趁明王朝因抗倭而放松对其控制之机,先后洗劫四川江津、南川、綦江和湖广四十八屯等地。明王朝调集三省官军和部分土司的士兵共25万人,由总督李化龙率领,分8路围剿,杨势穷自焚,叛乱告平。

奢安之乱是明代四川、贵州土司反明叛乱之一。天启元年(1621年),明王朝命永宁(今叙永县)彝族宣抚使奢崇明出兵辽东抵抗后金(清)。奢以未增给粮饷为借口,举兵反明,占领重庆,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江安、遵义等地,直逼成都。贵州水西(今毕节地区)宣慰司土司安邦彦举兵响应,围攻贵阳、赤水等地。四川总督朱燮元督川、黔、滇和湖广四省军队反复围剿。崇祯二年(1629年),明军将领刘可训、侯良柱率部在永宁五峰山与叛军激战,歼敌15万,大获全胜,奢、安被诛,叛乱始平。

(六)元明清时期四川的文化

这一时期四川由于经历宋末元初和元末明初两次社会大变动的影 响,在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自两汉以至唐宋堪称繁盛的四川文化明显地衰微了。过去时代尚属先进的一些传统学科,如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这时的总体水平下降了,虽不排除在某些

方面有所作为,但却缺乏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和成就。另一方面,随着元明清统一王朝下全国经济文化交往的频繁,一批蜀籍士人在外地取得的文化成就比过去时代大为增多。相应地四川也大量吸收融汇外地文化,进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的文化品种和门类,最突出的如川戏、川酒、川菜文化等等。

在哲学方面,元代堪称哲学大家并以著作传世的蜀籍学者,几乎都流寓在长江中下游地带。其中著名的如黄泽,字楚望,资州内江人,因蜀乱寓居于九江。大德中任江州景星书院和洪州东湖书院山长,闭门授徒,著述甚丰。哲学代表作有《易学滥觞》、《春秋三传义例考》。元代南方理学大师吴澄“以为平生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王申子,字巽卿,邛州人,寓居慈利州天门山,垂30年,为南阳书院山长,著《大易缉说》10卷。任士林,字叔实,绵竹人,寓居奉化,任安定书院山长,作《中易》等等。明代四川哲学家著名的有邹智(1466~1491年),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1486年)乡试第一,深恨当时小人在位,朝政腐败。次年登进士,改庶吉士。孝宗时因上疏,被谪戍广东。从思想渊源上讲,邹智属白沙学派(因广东新会白沙人陈献章而得名),主张“静”,强调“以涵养本源为先”。时人称其“才

识亚于贾谊,志气类乎陈亮。”来知德(1525~1604年),字矣鲜,梁平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于乡,因双亲相继歿,在万县山中隐居30年。万历中,明朝特授翰林待诏,力辞不就。著有《周易集注》16卷,以探求象数的错综变化为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在明末清初反宋明理学的思潮中,四川思想界出现了被称为“急先锋”的费密和杰出思想家唐甄。费密(1623~1699年),字此度,号燕峰,新繁人。他亲自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大动乱,并从思想上探讨这一大动乱的前因后果。著有《毛诗广义》、《宏道书》、《圣门旧章》、《荒书》等书,不下30余种。唐甄(1630~1704年),原名大陶,字铸万,别号圃亭,达州人,顺治十四年(1657年)举人,任山西长子县知县,未几被革职,晚年流寓江南。积坎坷经历,历30年作《潜书》97篇,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平等和富民思想。他不仅是明末清初四川进步的思想家,也是我国早期的启蒙学者。

在教育方面,由于经历这一时期的两次社会大变动,在元明清三朝四川的教育事业都经历了恢复重建的阶段,然后才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其水平远不及两宋时代。在元代由于较长时

间停废科举,故学校与科举并非基本合一。明朝并不专门提供学校的建设资金和教育经费,办学多是依靠本地士绅赞助支撑。清代四川教育层次较多,分府学、州学、厅学、县学、卫学和满营官学,以及义学、义塾、社学、乡学和私塾等。最突出的是书院的举办。明代书院崇尚自由讨论,清初不许别创书院。直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四川才创办成都锦江书院。此后,随着书院体制、办学目的、方法、经费的逐渐完善,书院这一文化教育机构便在四川各地普及开来。仅在成都府及府属州县,便有潜溪书院、芙蓉书院、元音书院、墨池书院、八旗少城书院、尊经书院,以及万春书院、繁江书院、繡川书院、龙门书院、岷阳书院、唐昌书院、岷江书院、九峰书院、凤山书院、崇阳书院、通津书院、南轩书院、方亭书院等一大批书院相继问世。

在文学方面,在元代文坛上以诗文最负盛名,多是流寓东南的蜀籍士人。著名的有虞集(1272~1348年),字伯生,号邵庵,祖籍四川隆州(今仁寿)人。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幼年随父避兵岭外。少承家学,内则“受业家庭”,外则就学于元代南方理学大师吴澄。1298年前后,入京为大都路儒学教授、国学助教。文宗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受命与中书平章赵世延等

候《经世大典》,任总裁。“平生为文万篇”。除编修《经世大典》880卷外,另有《道国学古录》、《道源类稿》等传世。虞集最擅长典册之作;“一时大典咸出其手。”其为文“著作法度谨严,辞指精核”;“粹然自成一家言”。当时人得其赠言;“如获拱璧”。《元史》盛誉其文笔有两宋之遗风。此外,虞集在诗词界也颇有地位。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其诗作见称一时,并被列为元代五大诗人的首位。他的词作30多阙,辑为《道源乐府》。风格“豪婉兼苏秦,高旷若陶谢”。是“诗人之词”;“一洗铅华”。他的《风入松》词;“天然风韵,传遍当时”。特别是其中的末句“杏花春雨江南”,更是脍炙人口,争相传诵,由是“此曲遂遍海内矣”。蒲道源(1260~1366年),字得之,号顺斋,眉州青神人,后寓居兴元,著有《顺斋闲居丛稿》26卷,留有词34阙,辑为《顺斋词》一卷,也是元代有名的词作家之一。元时蜀中以诗闻名的,还有邓文原(1259~1328年),字善之,一字匪石,绵州人。寓居钱塘。入元为杭州路学正,历任江浙儒学提举,拜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有《巴西文集》一卷。他的诗“全篇整丽,着尾匀和”,“句格庄严,词藻瑰丽”。在明代文坛上最负盛名的作家有: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著名政治家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受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投荒三十余年,卒于戍所。一生著述甚丰,现存150多种。作为杰出的思想家,他反对宋明理学,不侈谈性理而注重实证,具有务实的精神和开拓的勇气,重视实践经验,主张用发展变化观点看待事物。作为文学家,他在自己的散文、诗、词作品中,深刻揭露明王朝的腐朽与黑暗,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时代性。在诗歌创作上,以宏富的才情和多方面的特长为后世所推重,诗风“有少陵、谪仙格调,亦间入东坡、涪翁一派。”杨慎在词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其艺术风貌被王骥德的《曲律》概括为“杨俊而葩”。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词的典雅形式和通俗文艺结合起来,写成长篇《廿一史弹词》,文字浅近,易于传播。在明代文坛上,初期有“吴中四杰”比较活跃,其中的杨基、徐贲二人,其先原籍四川,后寓居吴中,均以诗名于世。中期有嘉靖“八才子”,其中的熊过、任翰俱蜀人。明清易代之际,不少四川作家又纷纷流寓江南,其中最著名者,如余杰,字生生,青神人,于郫县七子结社,入清后隐居不出,卖文为生。吕潜,字孔昭,遂宁人,吕大器之子,寓居吴兴,诗调新颖,又善画花草,他们均为后世所称道。清代四川散文家首推彭端淑(约1699~1779年),字仪一,号乐斋,丹棱人。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授吏部主事,历

任员外郎、郎中。晚年归蜀,主讲于成都锦江书院。学识广博,尤精于诗文,诗学汉魏,文承左、史,著有《白鹤堂今古文集》等。他的《为学一首示子侄》,成为士子们必读的名篇。清代诗歌创作成就最著名的有:张问陶(1764~1814年),字船山,遂宁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进士,曾先后任检讨、御史、知府等官。一生诗作内容丰富,数量众多,有4000多首传世,载入《张船山诗草》中,被称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是当时全国各大诗派中继袁枚而起的性灵派的代表,与李调元、彭端叔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李调元(1734~约1802年),字羹堂,赞庵、鹤洲,号雨村,又号童山、蠹翁,罗江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考工司主事、员外郎等职。后被捕下狱,流放新疆。乾隆五十年(1785年)回乡,不再出任。积平生心力,编刻《函海》丛书,收录有关巴蜀著作150种以上。一生著述50余种,诗作有《童山诗集》等。袁枚称其诗作“才豪力猛”。此外,还有费密,也以诗闻名,有《燕峰诗钞》行世。清代四川诗著不少,规模最大者首推孙桐生编的《国朝全蜀诗钞》,该书选刊从清初至道光二十年的诗篇很多,堪称四川诗歌总汇。清代蜀中词人在百人以上,著名的有费密、先著、李调元等人。竹枝词在清代四川广泛流行,嘉庆八年(1803年)院试

《竹枝词》正式成为科场的考试题目,表明其在文人学士中的影响之大。钱学宪的《锦城竹枝词》,长达百首,对清代成都市坊民情风俗时尚作了细致入微、生动形象的描绘,是一幅绚丽多彩的清代前期成都的市井风俗图。

在绘画书法方面,从元代开始,江南绘画在全国跃居首位,四川绘画地位一落千丈。元明两代能自成一派,且在全国有影响的四川画家,数量不多。在清代,随着外省人的大量入川,年画制作工匠带来绘画艺术,在绵竹纸业生产基地,形成为全国四大年画生产中心之一。乾隆后,绵竹年画生产达到高潮。年画种类多,内容广,生活气息浓,色彩艳丽,深受民间喜欢,题材多为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元代书法家中,能与当时号称盖世书家的赵孟頫地位相当的,只有寓居东南的邓文原和虞集。邓文原不仅善诗文,且“工于笔札”。其诗文淳雅,莹洁如玉,字法道媚,与赵孟頫相伯仲。《书史会要》称其书风“和雅”。虞集亦善书,《书史会要》评论其书法“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明代四川书法家,初期以杨茎、王璘最著名,中期以苏致中、张嘉谟、杨慎、黄辉成就最大。黄辉擅长楷书,尤精行、草,其书法作品传世很少,今四川省博物馆收藏三件,弥足珍贵。清代四川书法人才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有:吕潜,其行草书纵逸挥洒,气魄雄伟;费

密,书法古劲,人得片纸皆珍之;费锡璜,书法狂纵飘逸,不可一世;破山海明,书法放纵不拘,上下连绵,自成一格等等。

在建筑方面,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走向成熟的阶段,官式建筑趋于标准化和定型化。封建等级差别不仅表现在官式中,而且也严重地影响到民居上。体现这一建筑风格和特点的建筑,在四川境内比比皆是。例如梓潼县七曲山大庙盘陀殿、阆中县永安寺土殿、峨眉山东岳庙飞来殿、平武县报恩寺大殿等,柱子排列灵活,与屋架不作对称联系,造型比例匀称,梁架结构简炼,显得古朴、明朗、实用。这一时期寺庙建筑中轴线和对称布局,贯穿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在宗教建筑中的北碚温泉寺、七曲山大庙群、丰都名山古庙群、屏山禹王宫,以及各地的文庙建筑,均可发现大同小异之处。明清建筑在各个建筑部位的装饰上采用彩画、雕塑工艺,显得更加华丽多彩,如平武报恩寺、宜宾旋螺殿、成都文殊院、自贡西秦会馆等建筑,堪称这一时代四川建筑艺术珍品。

在戏剧艺术方面,作为我国四大剧种之一的川剧,正是在明、清时期诞生,形成和兴盛起来的。从明代散曲家陈铎的《朝天子·川戏》和《北耍孩儿·嘲川戏》可以透露出,明代川戏上演的是丑角戏、玩笑戏一类的喜剧,民间生活气息很浓。由韩五儿和靳广儿率

领的两个川戏戏班,不仅在四川各地上演,而且还到江苏南京一带进行演出。著名文学家和戏曲家杨慎也深受影响,由他撰著的《洞天元记》、《太和记》等杂剧,盛行一时,曾被时人攻击为词曲多“川调”。他对明代川戏的传播是有贡献的。到了清初,随着“湖广填四川”掀起的移民运动,各地的戏剧进入四川,使川戏呈现诸腔杂陈的局面。康、乾年间,来自外省的苏昆、秦腔、徽调、弋阳腔等相继进入四川,经过长期用四川方言与四川的“土戏”——灯戏同台演出,相互影响而形成了较多的共同风格,统称为川剧。但要构成“昆、高、胡、弹、灯”五种不同声腔的联合体制的川剧,则是在晚清时才完成的。四川的皮影戏俗称为“灯影戏”、“灯影儿”、“皮灯影儿”,是一种借灯取影在影幕上表演戏剧故事的民间戏曲艺术。这种艺术形式,至迟是在明末清初至乾隆、嘉庆时期,由四川原有的皮影同外来的皮影经过长期交流融合而逐渐形成的。在川剧和皮影戏形成的过程中,四川涌现的著名艺人有魏长生,字婉卿,金堂人。少因家贫,随舅去陕西学戏,成为秦腔名伶。1774年,随双庆班入京,演《滚楼》一剧,名声轰动京城。后多次进京演出,皆引起轰动。他的表演“声容真切,令人欲泪”;“观者日至千余,六大班顿为之减色”。灯影艺人赵镜海(?~1826年),1714年迁居绵州,建立苏灯影

班 后又名天顺班。所演灯影古戏曲本至今还有不少保存下来。在戏剧理论和编剧方面,李调元的《雨村剧话》和《雨村曲话》,是两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他卓有创见地提出了“古今一戏场”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戏剧艺术功能“可兴、可观、可群、可怨”的作用,以及“吾以曲之以弋阳,梆子,即曲中之变曲、霸曲”等理论,为后世戏曲史家们所重视,并不断加以发挥。

在科技方面,清代四川境内共产生了四部总结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著作。一是雍正新都知县张文梵的《农书》,分九个方面对农业生产加以论述,对选种、育种、播种、疏耙、锄耘、粪琅、兴修水利,乃至喂养耕牛,都作了精辟的总结。二是乾隆德阳知县阙昌言的《农事说》,对在农业生产中如何注意因天时、尽地利和发挥人力的作用作了很好的说明。三是乾隆什邡人张宗法的《三农纪》,详述天时地利、备荒救荒、农作物栽培、畜牧兽医、农村习俗杂事、农产品加工,共30余万字,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具有较强的科学价值。四是乾隆罗江知县沈潜的《蚕桑说》,对种桑养蚕中的技术问题作了详细论述。清代四川钻井技术得到很大提高,钻井深度大为提高。1835年钻出了井深1001.42米的燊海井,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标志清代四川钻井技术所达到的水平。此外,清代四川在蜀锦织机、运输工具

和兵器制造、雕版刻印技术方面也有一些改进和提高。

在史志方面,借助这一时期统一中央王朝的强盛国力,四川掀起了大量纂修地方志的高潮。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四川的史学著作则显得逊色了。在元代,在外地做官或寓居的蜀籍士人,在纂修志书方面有所作为的,有虞应龙,字柏心,仁寿人,入元,寓居湖广行省。以杰出的地方志之才,被征入朝,授秘书少监,参与纂修了《大一统志》。郭应木,字居仁,资州人,摄官宝安(今广东东莞),主持纂修了《宝安志》。冯福京,潼川人,迁官昌国州(今浙江安海)判官,编成《昌国州图志》。元代四川方志史上,费著有时名,贡献较大。费著,广都人,进士,授国子助教,历汉中廉访使,调重庆府总管。明玉珍攻城,遁居犍为而卒。曾参与编修《成都府志》,对“郡邑沿革与夫人物、风俗”搜访颇备。撰写的《岁华纪丽谱》等九篇文献,虽为整理宋人的作品,但对保存唐宋四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料,价值是十分宝贵的。明代四川史学著作,以杨学可的《明氏实录》最有特色。杨学可,名敏,以字行,新都人。元末,去云南昆明讲经。返川后,明玉珍授以国子助教,“辞不就职”。其所撰《实录》,记明玉珍及大夏政权兴亡始末,记述完整,态度比较客观,均可存史,以供参证。有明一代,凡四修四川“总志”,其书皆

存,计有正德《四川志》37卷、嘉靖《四川总志》16卷、万历《四川总志》34卷、万历《四川总志》27卷。明代四川府州县志,目前可考者,仅存22种。这些地方志,无论通观全局,撮其大要的总志,还是具体入微的府州县志,对保存有明一代四川地方的政治经济情况和社会风土人情资料,都是十分宝贵的。清初出现了一些当时人记当时当地史事的史书,如费密的《著书》、欧阳直的《蜀乱》、沈荀蔚的《蜀难叙略》等,具体详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但自乾嘉文字狱盛行以来,有卓识的史学著作已少见。而在地方志的纂修上,清代四川则掀起了高潮。在中央方志体例统一从同的原则下,清代四川曾三修省志,即康熙《四川总志》36卷,雍正《四川通志》47卷,(乾隆利行)嘉庆《四川通志》226卷。其中,嘉庆《四川通志》的篇幅最大,内容丰富,体例也较完善,实为后出转精之作。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清代,四川方志共有416部。这些志书,虽然保存了一些历史文献参考资料,但笔削窃取过甚,持义寄兴,却远逊于宋人,故后世有人评论曰:“虽有志,若无

志,可胜慨哉。”

这一时期四川的宗教,仍然普遍流行佛教和道教。佛教分为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在元代四川藏区喇嘛教各教派势力此消彼长,主要的教派有萨迦(俗称花教)、噶举(俗称白教)、宁玛(俗称红教)、觉囊等派。明代以后,格鲁派(俗称黄教)日渐流行,成为四川藏区中势力最大的教派,汉地佛教仍以禅宗为主。四川是正一天师张道陵传道的地方,元代四川仍以正一天师道为主,出了不少正一法师。明清两代,道教两大宗派即正一道和全真道都已逐渐走向衰落,在四川佛道之争中,道教日居下风。到了清嘉庆时,被称为十大洞天之一的青城山道观上清宫,仅存小室三楹。而峨眉山更形成了佛教一统天下的局面,道士趋于绝迹。除佛道二教外,这一时期在明玉珍大夏政权控制的地区,还奉行白莲教,宣传“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以争取群众,故设弥勒堂,奉弥勒法。这一时期四川也开始传入境内流行的伊斯兰教、天主教,不过这些宗教的影响都不及佛道二教。
